

学术研究

XUESHU YANJIU



3

一九六五年

貧下中农談建設社会主义新农村

- 新和巨变.....利均和 (1)
搞好集体生产, 壮大集体經濟, 是我們貧下中农分內的事.....陈树存 (4)
任何困难都不能阻挡我們前进.....唐汉生 (6)
我們改变了石头山的面貌.....梁天福 (9)
貧农是能夠向科学实验进軍的.....陈乃康 (11)
立志建設社会主义新农村.....王美桂 (14)

把广大农民引上社会主义大道的指路明灯严克柔 (17)

——《关于农业合作化問題》的学习筆記

- 談談原有工业的技术改造問題.....王冕农 (23)
論工业生产建設高潮中的若干問題刘少力 (27)

战争勝負的决定因素是人不是物.....鍾 夏 (32)

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

- 为当好革命接班人而学.....江孝連 (37)
发扬愚公移山精神, 苦練杀敌本领.....蔡嬋丹 (42)
一切为了革命.....李淑逯 (43)
克服困难, 不断前进.....郑添群 (46)
学习毛主席著作, 促进生产新高潮.....梁 陈 (49)
大种紫云英的哲学.....陈錦源 (54)
学习《矛盾論》, 改造落后队.....陈俊林 (58)
运用辯証法, 消灭三类禾.....新 农 (61)

新会劳动大学情况調查林紹祥 (63)

老瓦匠的一家.....欧 海 郑广南 黄汉綱 郑成軒 (69)

——建筑工人吳心家史

資产階級罪恶的有力見証佛山公記隆絲織厂工会委员会 广州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以經济史組 (73)

——絲織女工梁凤生活史

秦权使用及辨伪.....商承祚 (77)

派克美学思想批判李泽厚 (87)

贫下中农谈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新 和 巨 变

花县花山公社新和大队贫协主席 利均和

我們队里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現在快要結束了。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我們新和大队改变面貌是很明显的。我們队今年早造的生产形势很好，很多六、七十岁的老人說，从来沒见过象今年这样好的禾。从現在禾势看来，一千七百八十亩早稻平均亩产可达五百六十斤，比去年早造亩产四百九十四斤可以增产六十六斤，比历史上单产最高的一九六三年早造五百零七斤，也可以增产五十三斤。其他各种作物，目前生长一般还好。特别是去年冬季以来，在我們队范围内的一片荒山上，大搞造林綠化。这片荒山約有二百五十亩面积，很多石头，以前认为石山种下东西是沒有办法生的，前几年搞过造林綠化，种过树，都沒有生起来。这次发动了群众，大搞营养坭杯育苗，又組織了专业队，发扬“愚公移山”精神，种了台湾相思八万多棵，現在生长不錯。还种了竹子以及荔枝、沙梨、三华李、烏欖、青梅等果树，也生得不錯。这—个冬春，总算起来，专业队和各生产队在可以利用的荒山、河圳道路两旁及屋前屋后等五边地，植树造林共約三百多亩，共种了果树二千一百多株，竹子二千三百多棵，各种杂树九万多棵；另外还播种了一些山毛豆、木豆和田菁等綠肥。今年我們的植树造林，历史上多少年加起来也沒有这么多。在这次运动中，还得到上級大力支持，建設了电动提水站，不但可以引水上山，对进一步开发荒山更加有利，而且通电进村，可以安装打浆机，对发展集体养猪創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現在我們已經安装了四个飼料打浆机，十五个生产队和专业队都学习和参考了清远洲心公社和南海平洲公社的养猪經驗，积极发展集体养猪，有些队已經养起来了，有些队正在盖猪栏和积极筹备。由于今年水稻增产和其他生产的发展，集体的收入和分配也可以增加。

現在，我們貧下中農和幹部的積極性比以往什麼時候都高。不久之前，我們發動貧下中農和社員群眾討論建設規劃，通過群眾討論確定了今年、明年、後年的奮鬥目標和一九七〇年的初步設想。主要的幾項是：水稻，今年晚造要搞到畝產六百斤，全年合計畝產一千一百六十斤；一九六六年全年畝產一千二百五十斤，一九六七年一千三百斤以上，這樣，三年畝產就可增加三成多；到一九七〇年，設想畝產搞到一千六百斤以上。養豬，目前全大隊共存欄豬一千一百三十二頭，計劃今年底存欄數發展到一千五百頭，平均每畝水稻零點八頭；一九六六年底存欄數二千頭，平均每畝水稻一點零八頭，按人口算達到一人一頭；一九七〇年底存欄數，設想搞到二千六百頭，平均每畝水稻一點五六頭，或每畝耕地一點零八頭。集體分配，到一九七〇年，將比一九六四年增加一倍。

要實現以上的奮鬥目標和規劃，根本的措施就是：堅決貫徹執行陶鑄同志提出的“平整土地，提高排灌，發展畜牧，多種綠肥，大搞多種經營，大搞造林綠化”二十個字的方針；改進經營管理制度；搞勞動積累，進行農田基本建設；在耕作方法上，積極學習和推廣先進技術和先進經驗。要抓緊抓狠，因地制宜地具體落實到生產隊。我們相信以上的奮鬥目標和設想規劃是可以實現的。

為什麼我們新和大隊今年早稻能夠大增產，集體經濟大發展，幹群積極性高，理想和干劲大了呢？這是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結果，是黨的英明、正確領導的結果。在運動中，我們貧下中農用回憶對比、訴苦挖根的方法進行階級教育，在提高階級覺悟的基礎上，成立了自己的階級組織；有了自己的階級組織以後，就敢於當家作主了，精神面貌就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比過去什麼時候都更加熱愛集體，比過去什麼時候都更加有信心搞好集體生產。

在運動中，我們貧下中農充分發動起來，發揚了當家作主精神，積極批評教育幹部，幫助幹部提高階級覺悟，改正缺點錯誤，改進思想作風；當着幹部能夠改正錯誤，改進作風的時候，我們就支持他們搞好工作和生產，解決困難問題。我們的幹部大多數是好的，是能夠接受教育、改正錯誤、改進作風的，所以大多數幹部仍然得到貧下中農和黨的信任。經過運動，幹群關係大大改善了，出現了新的團結局面，大家一心搞好集體，搞好生產。

我們貧下中農，不單只想到改變本隊的面貌，而且想到改變全公社、全縣的面貌，還想到改變全省、全國的農村面貌。我們知道，如果國家和大集體搞不好，小集體也就搞不好。在春節後突擊九灣潭水庫的工程中，我們一共去了一百四十多名民工，約占全大隊勞動力的五分之一，其中大部分是貧下中農青壯年。他們在工地上合理組織勞動，使用手推車，提前上班，多拉快跑，每輛車天天都超額完成任務。全隊只用了二十四天時間（因下雨，實做二十天）便搞了三千九百六十五個土方，超額完成了三百九十多個土方，奪得工地的流動紅旗，一直保持到勝利回來。

我們貧下中農熱愛黨。我們深深知道，沒有黨就沒有貧下中農的翻身，就沒有貧下中農的當家作主。這次運動中進行整黨建黨，貧下中農的優秀分子積極要求入黨。我們

大隊貧協副主席，五隊的主席利開杭，年紀已經五十六了，他談入黨動機的時候，說自己一生認定了共產黨是最好的革命黨，決心把自己的晚年貢獻給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偉大事業。

我們大隊的貧下中農青年，在運動中充分發揮了突擊隊作用。經過運動，青年們大大提高了覺悟，湧現了一大批積極分子，要求進步，要求組織起來，要求學習，要求搞科學實驗，要求參加共青團。青年們發動和組織起來以後，不但在生產勞動中成為突擊手，而且充實和加強了民兵隊伍。現在青年們經常在晚上讀報，學習毛主席著作或大唱革命歌曲。他們越來越熱愛集體，過去那種參加勞動只是为了多賺工分的思想大大改變了。向南隊幾個女青年，春耕以來常常利用晚上及其他休息時間積集土雜肥共六千多斤，一個工分也不要。五隊的青年在蒔田中，寧愿進度慢一點，少得些工分，也要嚴格堅持規格質量，他們說得好：工分賺得再多，糧食不增產還是假的。向東隊的青年組織起來以後，第一項活動就是修好大路上的小石橋。最近擴大專業隊，有十多個貧下中農男女青年參加了專業隊，他們立志把荒山變成果山、肥山，為集體創業獻出力量。

我們大隊的四百二十五名少年兒童，通過共青團的帶動，也組織起來了，建立了少年兒童團。小孩子自己組織起來，自己管自己，管得很好。他們常常手執紅纓槍，頭戴偽裝帽，進行操練，大唱歌曲，真似小民兵。六月一日國際兒童節那天，我們大隊的少年兒童到坪山壩大遊行，宣傳援越抗美，整隊帶去，整隊回來。少年兒童組織起來以後，和從前大不相同了。大人們可以從小孩子們那里明顯感覺到，我們新和大隊人們的精神面貌起了多大的變化。

經過運動，我們大隊的文教衛生工作，也有了改進。高小五年級班，已經在五月份就改為半耕半讀。我們貧下中農很贊成這種教育制度。文化室和共產主義夜校正在籌備。移風易俗正在進行。我們要大力破除迷信，反對買賣婚姻，提倡晚婚、計劃生育，提倡講衛生。反對一切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的壞風氣，壞習俗。環境衛生也在逐步改善，公共廁所已經增加了十間。

我們新和大隊的面貌改變得還是很不夠的。我們貧下中農階級隊伍的作用發揮得也還很不充分。我們生產水平和耕作技術還是很落後的。要徹底改變面貌，還要作長期的努力和艱苦的鬥爭。我們貧下中農，要更好地聽黨的話，更好地當家作主，在各方面起帶頭作用，發揚真干、苦干、實干精神，進一步學習其他兄弟大隊的先進經驗，把集體經濟搞得更好，把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成果鞏固下來，把我們新和大隊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的先進大隊。

搞好集体生产,壮大集体经济, 是我们贫下中农分内的事

万宁县牛漏公社上坡生产队贫农组长 陈树存

我是万宁县牛漏公社七甲大队上坡生产队的社员。我在旧社会是个受尽折磨的穷苦人,幼年时父亲因被地主恶霸迫债而外逃丧命,祖母被国民党反动派活活打死,祖父也被大地主韩焕涛迫债殴打成疾,无钱医理而死。家中剩下体弱的母亲、年小的弟弟和我,我九岁时因生活所迫,出卖劳动力与地主家放牛,一家三口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解放后,我和广大的贫下中农一齐翻了身,当家做主人。现在,我一家六口人,生活一天比一天好,我的三个儿女都上学念书了,弟弟光荣地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社会给我们带来幸福,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恩情使我永记不忘。每当我想起了过去的悲惨日子,对比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更加热爱共产党,热爱毛主席,热爱集体,热爱社会主义,一定要为集体,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自己全部力量。多年来,在党的领导和支持下,我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一些工作。一九六四年十一月,我们生产队组织了贫下中农小组,大家选我当贫下中农小组组长,我得到了党和阶级兄弟的信任,更有决心把集体的家当好。

我是在旧社会受尽折磨的穷苦人,永远忘记不了阶级仇恨,对阶级敌人从不放松警惕,经常注意监督改造他们。在一九六二年备战期间,我就找队里的四类分子训话,交代党的政策,不许他们乱说乱动。今年三月间,反革命分子陈会儒,不服从派工犁坡地种克香苗,我知道后,便狠狠的整了他一顿,并限定他一天把地犁耙好,结果他便服服贴贴地完成了。

我时刻都在想,党依靠我们贫下中农,我们就要处处走在前头,为集体多出点力量。几年前,我们生产队的水稻产量很低,原因之一是品种未过关,我曾经下过决心要在瘦瘠的山场田里,培育出高产又不易倒伏的良种,把我们多年戴着的低产帽子摘掉。可是找了好几年,良种还是找不到,直到去年晚造备耕开始,公社林尤良书记给我们送来四斤“珍珠矮”高产品种。我从林书记手里接过那四斤“珍珠矮”时,比接到珍珠宝贝还要高兴,于是立即在晚造进行翻秋试验。谁料这四斤“珍珠矮”一播下土,就有不少社员怀疑我是“瞎子摸虾”,妄想丰收,到插秧时,他们都不愿去插试验田。但是,我并没有灰心丧气,因为我有党支部和公社党委的大力支持,我记得公社林书记在交种子给我时说:“这四斤珍珠矮种子是新生事物,一定会有人反对它,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软了,它就长不起来,如果你硬起来,它就会很快成长……。”我还回忆起旧社会,那时穷人种

田，地主建谷仓，地主吃饱吃好，穷人受饿的悲惨情景；想起了我的祖父和大地主韓煥涛种田，有一年晚造，祖父正在播种，大地主派来一群狗腿追租迫债，連祖父将要播下的种子也都搶光了。解放后，穷人翻了身，为了粮食大增产，为了改善我们的生活，共产党把优良的种子給我們搞試驗，这真是两个世界啊！我想到这里，觉得什么困难都不怕，沒有人愿意插試驗田，我就在貧下中农社員中，挨家挨戶地串連发动，終于把貧农陈秀娥、胡南蓉等发动起来，加上我的爱人高西連，我們用两天時間把秧苗插完，共插了二亩八分地。插秧后，我每天細心观察禾苗的生长情况，和技术員一起加强中耕田間管理，終于取得了胜利。这二亩八分田，共收获干谷一千六百斤，平均亩产五百三十斤。这四斤“珍珠矮”試驗成功后，今年早造，我們便将翻秋的种子拿出七百多斤支援了其他生产队，我們生产队扩大“珍珠矮”种植面积四十五亩，并且还試驗“二九矮”、“选三”、“广矮”等五十五亩，良种的种植面积占总面积的百分之九十，因而取得了大丰收。全队一百零八亩稻田，实收稻谷总产量六万六千二百零四斤，平均亩产六百一十三斤，比去年同期总产量增加二万一千二百零四斤，单产提高一百九十八斤，超过了历史最高产量水平。

早造良种問題解决了，我又繼續試驗晚造高产品种。今年早造，我和一部分貧下中农搞了“馬豹”、“五百矮”、“广二矮”、“广秋矮”等倒播試驗，經過培育，品种表証很好，产量都是五百斤以上。今年晚造，我們准备将倒播成功的“馬豹”、“五百矮”进行大面积插植，繼續为晚造高产开辟道路。

生产队解决了种子問題后，又突出了一个肥料問題。我們这个地区历来都沒有使用人粪尿的习惯，我觉得这是最大的浪费，便下决心带头积聚人粪尿，使用人粪尿。有一次，我发动了十多个社員到粪池去挑粪，开始时，有一些人不愿意下粪池掏粪，我便带头下去，替他們一桶一桶提上来，他們說：“树存能下粪池，我們为什么不能下去呢？”大家便被带动起来了。施用粪肥的結果，禾苗生势确实很好，以后，社員对使用人粪尿再沒有抵触思想了。

我觉得，我們貧下中农应该有貧下中农的思想和风格，就是要把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为了集体而忘我劳动，不要斤斤計較个人得失。今年早稻正打苞抽穗时，上坡洋八十多亩生势很好的稻苗，因严重干旱缺水，禾苗开始枯黄退化。当时，我心里十分焦急，为了消除旱患，我一連坚持了四个昼夜放水引水入田，使八十多亩田全部灌上水。原队委决定，凡开夜工放夜水的都給記补助工分，我坚决不要。我认为，夜間放田水不算很辛苦，我們貧农为集体带好头是應該的。去年晚造，我包干整地三十亩，实行多犁多耙，其中試驗田四犁四耙，社員們又提議給我記回补助工分，我也不要。我认为，干活质量要高标准，是我們每个社員都应该自觉做到的，如果质量做得好要加工分，就会降低质量要求，对集体生产是不利的。

今年早造插秧大忙时，生产队要办农忙托儿所，沒有房子，我便借出自己的新瓦房給生产队办托儿所，还和爱人亲自上社員家，动员妇女将小孩送来我家。

我还觉得，我們貧下中农应该支持和监督干部把集体办好。我們队里的干部，多数都听貧下中农的話，按貧下中农的意見办事，只是有个别干部思想作风不够好。如去年生产队留花生种子一百五十多斤，仓库保管員放任不管，我多次催促他检查翻晒，但他仍不負責任，結果，花生种子全部发霉变坏了，我在队委会和社員会上，对保管員提出了严肃的批評。

以上是我近几年来，在党的领导下，在群众的支持下所做的一些工作，拿党对我們貧下中农当家作主的要求來說，还差得很远。以后还要繼續提高思想觉悟，听党的話，为集体，为社会主义建設多貢獻自己的力量。

任何困难都不能阻挡我們前进

連县大岭脚生产队队长 唐汉生

当革命的闯将 做大自然的主人

連县清江公社大岭脚生产队，地处粵湘交界的高山丛岭中，周围都是石头山，是个四十七户，九十六个劳动力的小山村。全队二百三十亩水田，六十亩坡地，过去都没有水利設施。解放前，村里有九成人家穷得靠打柴烧炭度日。解放后，大岭脚人在政治上翻了身，但干旱仍然沒有解决，一遭到旱年，就顆粒无收。

大岭脚附近沒有水源，只在离村六华里半远的地方有一个叫大水滂的岩洞，有一股涓涓不絕的清泉，这股清泉流出后，却被一座大石山挡住，又由地下渗透走了，根本无法利用它来灌溉。如果要引用大水滂的水，就一定要在泉水流出的地方筑一道坝，打开那座石山，开挖一条六里多长的渠道，才能把水引到田。不过，要做到这样，困难很大，因为环山圳通过的山腰，大多是坚固的岩石。一九五六年农业合作化以后，广大貧下中农在党的领导下，依靠集体力量，大胆地提出了开山造河，改变苦旱面貌的意見。于是我們根据这些意見，制訂了兴建大水滂工程的計劃，这个計劃很快就得到上級党、政領導部門的支持。接着，我們就开展了一场长期艰苦的改造大自然的斗争。

大水滂工程于一九五七年三月动工，一九六四年七月完工，連續坚持八年，劈山引水，终于劈开了一座一百六十米长，十五米高的唐冲垌坳的石山和建成一条三千四百多米的水圳，把大水滂山岩的泉水引出来灌田，共完成石方二万五千多立方米，其中干砌石四千多立方米，土方三千九百立方米，花去七万多个工作日，每个劳力平均支付八百多个工作日。从根本上解除了旱患。我們经过八年艰苦奋斗，从来没有叫过苦，依靠自己的双手年年苦干实干，终于实现了前人所不敢想不敢做的事业。

越穷越要革命

我們大岭脚人虽然很穷，但越穷越有志气。我們相信“愚公”可移山，石山可以凿穿，相信经过艰苦奋斗，理想可以变为现实，精神可以变为物质，贫穷可以变为富裕。我們也知道，开凿大水滂工程不是一、二年的事情，即使十年八年，甚至二十年，也一定能够把它修好。大伙下了“年年抗旱受灾，不如大修水利，造福万代”的决心。

在同大自然作斗争中，我們既打政治仗又打思想仗。我們經常地教育广大貧下中农不忘过去阶级苦，深知今日社会的甜。向年青人进行阶级教育，讲村史。当年领导大家搞水利的老貧农唐理木就經常地对青年人說：“解放前全村二十二戶貧农的土地只有一亩五分。一九四六年大旱，租了地主六亩田全部失收，全家四口靠挖野粮度日，有一个儿子就因为吃得野粮太多中毒死去了。貧农唐玉香那一年有一个七、八岁的小孩，也因吃野粮毒死。另外一年，他的妻子生下小孩才几天，因貧病交困，母子两人无法养活。全村三十八戶人家除地主、富农外，大部分人患了水肿病，鳩形鵠脸，慘不忍睹，有的人卖光吃光，有的人向外逃荒。”沉痛的回忆，激发了人們改变干旱面貌的热情，坚定修水利的信心，从而树立“愚公移山”大志，革老天爷的命。

但是，我們劈山引水的斗争，却又受到一些“愚公移山”中智叟式的人的嘲笑。寨背村有个名叫唐油林的人笑我們：“你們这样干未免太愚蠢了，要想劈开唐冲脛坳，真是太不量力。”来往的人也冷言冷語說：“大岭脚，响咚咚(爆石声)，年年修水利，月月米缸空。”大岭脚的貧下中农便回答說：“天大的困难也不怕，唐冲脛坳的岩石坚硬也硬不过我們的志气。”根本不理睬那一套。按照我們自己的計劃，吃着紅薯也坚持修水利。一九六〇年、一九六一年由于連續遭受自然灾害，当时，大岭脚队的粮食比較紧，在貧下中农的带头下，仍然日夜战斗。青年人积极带头，老年人也不甘示弱。年近六十的老貧农唐冬仓，負責看牛，便把牛放到工地附近，利用空隙和年青人一起挑土抬大石，他說：“为了下一代的幸福，我應該出一分力。”

妇女們，在劈山引水工程中是一支主力部队，她們創造了惊人的奇迹。一九五八年，为了支援本县譚岭水庫。全村男劳力大部分都上大工地去了。在家的只剩下四十多个妇女，当时正需要打石工。但我們这里都沒有听說妇女会打石爆破的，这次她們大显身手，为加快水利进度，毅然把打石的任务担当起来。她們边学边做，使工程能繼續施工。最后全村有十二个青年妇女成为爆破能手。特別突出的是，有两个十五、六岁的姑娘，知道工地缺乏爆破人材会影响工程进度，內心非常焦急，决心和大人們一起学打石。別人收工了，她俩便偷偷地回到工地，一个扶鋼钎，一个掄大錘，叮叮噹噹地凿起炮眼来，两个人的手被震得又紅又肿也不顾歇息，大家都夸奖她們有志气。几年来轉战在悬崖峭壁上，那里沒有留下她們的汗水呢！

冬寒早，春暖迟，“立冬”飞霜，“小雪”飘雪，在此寒冬之下，也沒有动摇貧下中农修水利的决心。八个冬春，我們风刮不散，雨打不倒，一刻也沒有停止过。一九五九年

春初，唐冲坳上游山洪暴发，已修好的一段渠道被山洪冲垮了。当时有些人动摇了，但在贫下中农的带动下，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又上阵了，大家吃着稀稀的三角麦羹，冒着寒风雨雪抢修工程。年老体弱的何亚巧被风刮倒了，她爬起来，又继续干。这位饱受风霜的老妇人说：“为了子孙的幸福，自己现在多吃点苦又何妨！”我们贫下中农，始终没有泄气，一直坚持到最后胜利。

大岭脚人就是这样树立“愚公”志，坚持连续八年艰苦奋斗攻克水利关。

自力更生 战胜困难

改变自然面貌的斗争，需要战胜许多困难。搞水利需用大批石灰，自己不会烧制，炸药供应不上，资金缺乏，劳动力不足，天气寒冷，生活困难等等，困难一大堆。但是，所有困难都一个一个被我们战胜了。战胜困难的根本办法，就是依靠贫下中农，用自力更生的办法解决。不懂技术我们就自己学，以贫下中农领先，以一带二，以老带少，边学边做。没有资金我们就自己筹集，没有伸手向国家要钱，只要求有关部门查勘测量后就马上动工了。全部工程费七万元都由自己解决。施工紧张时，炸药供应不上，我们便仿制代替，听说肥田的硝酸铵可以制硝，立即进行试制，第一次试不成功，就第二次继续试验，经过多次失败和试制，终于成功了。这样，我们用自己制成的土炸药达五千多斤，爆炸威力相当大，还供应其他工地使用。开石用的钢钎坏了没有人修理，就建起炉子，拿起铁锤，自己加工修理，这也是反复实践，掌握火色，才学到这门技术的。现在打成的钢钎，比市面修理的质量还高一倍。此外，我们还从不懂到懂的自己烧制石灰五百多担，编织竹箕二千多对。现在，全村拥有一批爆破能手，还有七个人学会了打铁，八个人学会了编织箕，男社员都学会烧石灰了。

大水滂工程傍山开渠时，没有水利技术人员在场指导，我们就依靠贫下中农的智慧和创造性的劳动，采用挖槽爆破、半挖半填的办法，侧墙加高部分用块石加黄粘土夯实，工程质量良好，没有发现严重漏水和崩塌现象。经省、专水利技术人员检查后也认为工程质量良好。

就这样，我们依靠自己的双手和两条腿，穿破了二万多双草鞋，八年如一日的坚持苦战，胜利地完成一宗十分艰巨的引水工程。而且一直没有发生过伤亡事故。

苦旱消除 山区变样

八年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闯过水利关，带来了生产、思想双丰收，改变了大岭脚苦旱贫穷的面貌。

大岭脚过去粮食不能自给，群众生活贫困。十多年来，都要国家统销粮食。一九六三年，大水滂工程部分受益后，全年粮食总产量比一九六二年增加百分之三十三点六，大旱之年大丰收。一九六四年水利全部发挥效益，全年粮食总产量比一九六三年又增加百分之二十一点二。不仅摘掉了“统销队”的帽子，并且还有余粮卖给国家。农、林、牧、

副业也有很大发展。

劈山引水，不但改变了自然条件，同时，也在改变着大岭脚人的思想面貌。从一九五七年动工修水利以后，更进一步显示了集体化的优越性，坚定了社员走合作化道路的信心，现在建成大水滂水利，我们大岭脚的贫下中农的心更加团结在一起，因此，我们的生产队越来越巩固，集体经济一年比一年壮大。去年冬，当我们的水利工程完成后，又支援了一些兄弟队过好水利关，派出了四十二个劳动力支援破塘水库，连续干了四十多天。清江公社修建公路时，大岭脚人也主动承担了爆破石方的艰巨任务，七天的工作量四天就完成了。

在解决水利问题之后，我们又找到了继续前进的方向，决心在农业生产技术上来个大革命。今年比较突出地抓了旱地变水田，单造改双造，学习潮汕地区的先进耕作技术。可以预料，大岭脚一九六五年的农业生产将有一个更大的飞跃。几年来，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我们绝不满足，戒骄戒躁，继续努力，满怀信心地建设富饶美丽的社会主义山区。

我們改变了石头山的面貌

阳山县杜步公社石井大队欧塋生产队队长 梁天福

欧塋，是一个顽石累累、没有水田、缺乏水源、没有林木的穷困荒凉的“死地方”。全队二十九户，一百四十三人。仅有八十九亩山地，分布在六个小山谷和二十四片石山顶上，大小共一万二千五百多块，平均每亩一百三十多块。除了三十六亩是山谷小平地外，其余都是石缝、石窟，大的可种三几十棵玉米，小的仅能下把锄头。由于水土流失严重，土无三寸深，“湿时一团糟，干时一把刀”，根本不长庄稼。解放前每亩年产玉米只有百把斤，番薯三几百斤，除了交租还债，农民生活苦不堪言。成年累月闹饥荒，几十岁的人也没吃过一餐干饭。

欧塋方圆十多里地，没有河流溪涧，也找不到一个小泉眼，“五天无雨庄稼死，十天无雨人畜干”。秋冬季节还得爬山越岭到十多里外的地方挑水吃。滴水贵如油，一瓢水顶三用：洗了脸，再洗衣，还要用来喂牲口。这里虽说是山区，但到处是石头一片，烧柴也很困难。

解放了，党和毛主席给欧塋的人们带来了幸福。在三面红旗指引下，欧塋的贫下中农依靠集体的力量，用“愚公移山”的精神，艰苦奋斗坚持了十个年头，终于改变了穷山恶水面貌。十年来在岩石上开凿了六口山塘（一口尚未完工）和五个储水池，蓄水量三万六千多担，在百年大旱的一九六三年，除满足人畜用水外，还有水浇地。粮食生产量比

解放前增加了二倍多。到今年为止，綠化了十多个山头，已种上山棕五万一千多株，每户平均一千七百多株；板栗一千七百多株和果树、杂树一批。其中有一部分已开始收获。

随着生产的不断发展，社員的生活改善了，集体經濟也不断壮大发展。現在社員的口粮水平比解放初期提高一倍多；人畜共居的茅房已經全部換上了瓦房；昔日文化絕迹，今天不仅适龄儿童能上学，而且还有初中毕业生两人，高中毕业生一人。几年来兴建了一批猪牛舍、厕所、仓库、晒地等基本建設。

欧壘村面貌的改变，首先是經過激烈的思想斗争的結果。

一九五五年冬，欧壘村刚成立农业社时，有人主张：欧壘这个“死地方”变不了，不如搬到别处去，找寻出路。有人认为“現在解放了，有党和人民政府领导，沒有粮食、沒有錢，有政府統銷和救济，还怕什么？”而老貧农梁綢代表了許多貧下中农說出心里話，他說：“解放前，欧壘人世代受苦受难，受尽官僚、地主的盘剝，現在解放了，自己做了主人，應該努力改变家乡的面貌，使我們的子子孙孙不再受穷困。过去不是有十六人搬到英德去以后又回来欧壘？搬家是不能解决穷困，依賴国家救济也不是办法。挑一担粮也得花两个工。”广大貧下中农都贊成他的意見。认为有了农业社，只要大家团結一致，不怕辛苦，欧壘是一定可以改变面貌的。大家研究了改变欧壘面貌的办法：首先，解决水的問題。其次，扩大耕地面积。第三，利用石头山种棕树，种板栗，綠化荒山。并响亮地提出：“向石山要粮，向石山要水，向石山要錢”以及“把石头山变成棕山”的战斗口号。

欧壘广大貧下中农向石山进军，向大自然作斗争，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每迈进一步，都要付出十分艰巨的劳动。

首先是开凿儲水塘。要闢过食水关，要把石块打成大水塘。一九五五年开凿第一个水塘时，由于沒有經驗，筑了二丈多深的坝基，接連两次被山洪冲塌了。但是，社員并不灰心气馁，每次都得找原因，接受經驗教訓，一次又一次地重新把石头堆砌起来。足足用了三个冬春，才把第一口儲水塘建造成功。現在已建好五个，正在建第六个。

开凿儲水塘，走的是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道路。資金，由社員筹集；技术，自己学习，队委会六、七个干部，个个都变成了爆破能手，不少社員也成了砌石能手。这里开垦一块石头荒，就得搬动几百个石方和土方。花費几百上千个工，才能湊合一亩面积，欧壘七十五个劳动力，就得用半个月的时间。折算起来，开辟石山种一棵玉米的面积就要花半个工，而且沒有一个人不被石头砸伤过手脚的。有的社員手起了血泡、手指甲脫了都坚持干下去，誰也不叫苦，輕伤不下火綫。砌石能手梁汝，十个手指都被石头砸伤过，換了三次指甲，現在右手的拇指还积着当年被砸伤的烏血，食指已被大石压曲了，豎立不直，左腿也还留着一个伤疤，但从来沒有灰心过。貧农社員梁珍，手掌起了血泡，就用針刺穿放出血水后又繼續干，手指被压坏，咬紧牙根，照例出工。就这样苦干了几个年头，开出了九亩石头梯地。

这里流传着“家有千棵棕，子孙不愁穷”的佳話。但没有种子怎么办，依靠貧下中农，解决了种籽問題。老貧农梁綢，还在合作化以前，打算自己种棕，到外地找了几十斤棕树种籽，育成了幼苗，听说生产队需要就主动交给了集体。种苗解决了，我們就年年辟山凿石，在星星点点的石縫石窟里，一箕坭一株棕地种着，年复一年共种下了五万多株，近处的十多个山头，只要有一点点的坭土，都扎下了棕苗，还种上了一千多株板栗和一批果树杂木。

但是，在欧盟人改天换地的斗争过程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始終貫穿着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的斗争。当提出开食水塘时，就有人鬧起封建迷信来反对，說：“穷就穷，不要挖断村背龙，挖断了村背龙，欧盟就会更穷。”这一叫的确迷惑了一些群众，一个时期上工地的人减少，給生产队带来了不少的麻煩。在发展山棕时，又由于粮林爭地的矛盾曾一度解决得不够好，一些上中农便借机发作，說什么“棕生人死”、“种棕种棕，大家該食西北风”等等。一九五九年曾掀起了一股砍棕的风波，一下子就被毀坏了八百株山棕和上千株油茶。但是，經過不断地进行思想教育后，終于破除迷信，扫除了各种思想障碍，而且更坚定了欧盟人改变穷山面貌的决心。我們在上級党委的领导下，依靠了广大貧下中农，扫清了种种錯誤論調，用自己的双手和肩膀，一凿一凿的干，一担一担的挑，十年如一日地坚持干，終于革掉了石头山的穷命，健康地沿着社会主义建設的大道迈进。

最近，我們通过总结十年来的工作经验，又提出了第二个战斗计划：要在几年內把石縫石窟进行平整并块，全部整成梯級地，并进一步扩大耕地面积，开展技术革新，提高产量，爭取在最短時間內粮食彻底过关，逐步做到有盈余；还计划再开凿五口儲水池，儲蓄更多的水量，保证农作物的灌溉；到一九七〇年计划把棕树发展到十三万株，把二十多个石山全部綠化起来，逐步把欧盟建設成为一个富饒美丽的社会主义新山区。

貧农是能够向科学实验进軍的

順德县沙滘公社北村生产队科学实验小組长 陈乃康

北村科学实验小組共十八个人，是貧下中农坚持科学实验的陣地。

九年来，我們科学实验小組坚持对甘蔗栽培技术不断革新，使全队八十八亩瘦瘠的“黄沙丁”土质的甘蔗田，由一九五五年亩产六千七百斤，到一九六三年提高到一万六千九百六十斤，并創造亩产三万二千五百一十七斤的高产纪录。

九年来，我們通过科学实验，改变落后的耕作制度，先后革新和推广了新植蔗一密（合理密植）、四早（早植、早間苗、早施肥、早除虫），下种一条龙（包括选种、浸种、消毒、下种）及宿根蔗两保（保持蔗头水份，保护蔗头不斬坏）的新技术；研究和解决了宿

根蔗株間松土，施壯尾肥防止倒伏的高產栽培技術關鍵；創造和推廣了間苗鋤、兩齒鋤、蔗鋤等幾種先進的甘蔗小工具；以及利用赤眼蜂消滅甘蔗螟蟲的生物防治新技術，並通過多年的試驗比較，鑑定推廣了粵糖 56/268、57/423、54/143、華南 56/12 等四個甘蔗優良品種，還初步選育出沙灣 60/2、60/5、60/9 等六個甘蔗新品種；克服了品種單一化，實現早、中、遲熟品種按比例合理種植。

九年來，我們小組在黨支部組織下通過吸收進來，跟班學習，輸送出去，實踐提高的方法，為全大隊培養了五十二名群眾科學實驗的骨幹。曾駐在我們北村隊的前任大隊黨支部書記已成為甘蔗“專家”，幫助兄弟國家建設去了。現在科學實驗小組的成員也從原來九人增至十八人，占全隊勞動力的三成多，掀起了一个生氣勃勃的群眾性科學實驗運動。

科學實驗並不神秘

我們從實踐中得到體會：科學實驗並不神秘，貧下中農能夠學科學。這裡初期不少人存在着懷疑思想，感到科學高不可攀，難以捉摸，說：“農民只有一雙手，土里土氣怎能搞科學實驗。”這時大隊黨支部及時給予支持，組織了幹部、群眾進行了多次的爭論，一致認為對本地農業的增產關鍵和技術問題，進行科學實驗，如種植期、放種方法、施肥量、防治害蟲等實驗項目，進行細心的觀察、研究，開展科學實驗活動，是十分重要的。使科學實驗小組在群眾中站住了腳。我們科學實驗小組觀察了在甘蔗田邊的蔗頭，由於陽光好，水份足，出苗特別多，而又長得特別壯，受到了啟發，於是，進行株間松土的試驗，把蔗頭周圍的泥土鋤開，露出基部，又鋤斷了一部分老根，同時進行了對比試驗，經過株間松土的蔗不僅出苗多，長得壯，且大部分長出的都是過底筭，比對照區還增加出苗三分之一。結果年終產量提高了百分之十。到第二年春天，還根據進行株間松土的特點，又研究創造了“兩齒鋤”的小工具，避免了因使用鋤頭而傷害蔗芽的缺點。

在實驗中，發現同一塊蔗田的新植蔗苗生長高矮不一、壯弱不一，什麼原因呢？科學實驗小組進行了仔細分析研究，發現由於同一種苗上芽數過多，而不同部位的種芽生活力有強有弱，造成萌芽不一，出苗不齊一，給田間管理帶來困難，導致減產。這一現象，啟發了大家進行種苗分上、中、下三段歸類種植試驗，結果發芽齊一，長出的苗既均勻又粗壯，年終又獲得增產。

這些活生生的科學實驗活動，在生產上顯示了增產作用，有力地破除了認為農民不能搞科學實驗的迷信思想，同時說明了科學並不神秘，貧下中農是可以學科學，辦科學，而且可以辦得好！

從實際出發，科學實驗為當地當前生產服務

北村科學實驗小組，九年來堅持為當地、當前生產服務的方針，並在不斷地同脫離實際、好高騖遠的傾向作鬥爭中逐步鞏固和發展起來。在活動初期，我們曾經片面追求

高产，便选择了三亩最好的土地，只利用四周边沿种植一亩，施上土杂肥三百担，下种三千多斤，购买了大批的竹、杉来搭架防倒伏。这样的结果，产量是高了一些，可是贫农说：“这些‘富农田’，我们办不到！”这个项目辛辛苦苦搞了一年，在群众中，在大田生产上收不到什么良好效果。

走过这么一段弯路之后，使我们觉醒过来，回头冷静地总结了实践经验教训，才真正领会到：开展科学实验活动，必须服从当地群众要求，必须服从当地生产需要，脱离实际，好高骛远是不行的。试验项目，必须是增产关键问题。

往后，我们就认真注意实验活动与生产紧密结合，抓住大田生产的薄弱环节，摸索增产技术途径来开展科学实验活动。

甘蔗防倒伏是一项迫切需要解决的增产关键，我们便试验高培土填实株间的研究方法。结果抗御了十二级的台风，亩产达一万六千七百零八斤。这个经验，符合实际，效果显著，因而一下子在公社范围内就推广了一万五千多亩。

一九六三年春，出现了六十年罕见的大旱，眼看甘蔗快要下种，但“老天”仍未下过一场透雨，可把我们实验小组的组员急坏了，怎么办呢？我们访问了老农，总结了过去抗旱的经验，具体地试验了“一条龙”的抗旱下种方法：先淋湿坑底，然后放种，淋泥浆，盖土杂肥，再复土。这样由于保持了蔗坑的湿润，不到几天蔗芽就出土，而且生长齐一。抗旱下种方法的试验成功了，公社党委组织现场参观，把经验推广到全公社去。

我们九年来的实践证明：科学实验活动，能为当地当前生产服务的，就收到良好的效果，取得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反之，就走了弯路，而遭到失败。

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勤俭办科学

我们的科学实验活动，自始至终都坚持了自力更生，勤俭办科学的精神；运用穷办法、土办法闢开了科学实验的大门。

为了解决甘蔗品种单一化的问题，我们经历了长期的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过程。起初，引进了台糖一〇八、爪哇三〇一六等品种，进行三年的表证试验不好，又重新引进二十多个新品种，经过两年多的试验表证，结果试验成功粤糖57/423等四个良种。接着，用秋植春采的办法，加速良种繁殖，提高繁殖系数。结果，两年内有三个良种就分别从二百斤繁殖出二万多斤。此外，还繁殖了大批粤糖54/143早熟良种。全队实现了甘蔗良种化，还支援外地二十五万多斤种苗。

为缩短由引进——品比——表证鉴定和推广的过程，更快、更准确地培育出新品种，我们还开展了培育甘蔗品种的试验研究。按照科研部门的做法，要利用高温消毒器、玻璃温室分别进行土壤消毒和培育，但没有消毒设备怎么办？就利用土办法，用铁锅把泥土一斤一斤地炒；没有玻璃温室，就用玻璃纸盖面。经过四年的反复试验，细致的观察和分析，结果从一万多粒的甘蔗种子中，培育出一千一百多株的实生苗，在实生苗中从中再选出二十八个新品种，经过群众鉴定，比台糖一三四较好的，有沙湾60/2、

60/9等六个新品种。

科学实验小组亲手培育出的良种碰到洪水冲缺了堤，眼看良种有被洪水吞没的危险，为了抢救良种，小组的成员一个个钻进水底，与洪水搏斗，把一株株亲手培育出来的甘蔗优良品种抢救出来。洪水过后，又立即把良种种下地去。现在正大量地加速良种繁殖，争取再创造出新的成绩来。

立志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电白县小夏公社白沙大队回乡知识青年 王美桂

我是一个贫农的女儿。在中学读书的时候，学校的党、团组织经常对我们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和劳动教育，批判轻视劳动的资产阶级思想，教育我们立志做一个有政治觉悟，有文化水平，有生产技能的新型农民，经常组织我们参加各种体力劳动，经常组织我们学习毛主席著作。毛主席著作对我的教育最大。毛主席说：“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结合的，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毛主席说：“要使全体青年们懂得，我们的国家现在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并且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根本改变这种状态，全靠青年和全体人民在几十年时间内，团结奋斗，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一个富强的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给我们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而理想境界的实现还要靠我们的辛勤劳动。”这些话深深印在我的脑里。在党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时，我想：自己的家乡灾害频繁，面貌还没有充分改变，仍然很穷，这正是需要我回去的时候。因此，在一九六一年春，我下定了决心离开学校，坚决回乡务农，为彻底改变家乡面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而贡献自己的青春。

我的家乡是个黄土丘陵地区，全大队有一万一千多亩荒山，解放以前，都是光秃秃的，草木不长，水土流失严重，解放后，特别是大跃进以来，人们进行治山治水，大筑土谷坊，大搞拦沙坝，大开环山沟，大搞造林绿化。为了改变家乡的面貌，我回乡后就积极参加了这些工作。由于年年坚持造林，全大队已在荒山上造林八千多亩，绿化了八成荒山面积。塘美村三千多亩荒山，也大部分种上树了。但是，全大队还未彻底绿化，单是最难啃的石山岗就有四百多亩。这些石山岗中塘美村占了一百六十多亩。过去几年，人们也曾经在这些石头山种过树，因为种不活，就放了下来。看到这种情景，我心里想：造林绿化是改变家乡面貌的根本措施，要改变家乡面貌，就不能留下一寸荒山。但是石头

山上种树，困难是很多的，我就想起了毛主席的教导：“我們是为着解决困难去工作、去斗争的。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这才是好同志。”于是，我串连了几个敢打敢冲的青年人，学习了毛主席《愚公移山》的文章，我说：“石头山上种树，困难当然很多，可是对待困难，要是害怕它，那能战胜它？不能做懦夫庸人，要当革命闯将。石头比不上我們的意志硬，就看我們敢不敢搬它！”大家都說：“愚公敢移山，我們敢搬石！”为了把树种活，我們还向老农請教，在老农的帮助下，找出了过去在石山上种树失败的原因：一是穴挖得太浅，二是从山脚一直往山頂种，遇到大雨，树苗就容易被水冲倒。又和老农一起研究，把“直山种树”改为田螺式的“环山种树”，减少雨水冲刷。当我們五个姑娘、两个小伙子，出征石头山的时候，生产队长也参加了我們的战斗，更增强了我們的信心。但也有一些怕困难的人，站在另一边說：“石头山种树神仙也种不活。真是沒事找事干，枉費心机。”青年們都笑着說：“我們要胜过神仙，你們等着瞧吧！”这些石头山，經长年累月的雨水冲刷，泥沙全被冲走了，山崗上露出片的石砾，鋤头一掘，火星四射。沒多久，手就起了血泡。有的吐些口水揉一揉，有的把手往头发上擦一擦，又繼續干下去。就是这样，我們一层又一层地把石砾挖出，搬走，挖成了一个又一个的大穴。再从別处挑来泥土填在穴里，施些肥料，才把树苗种下去。一天一天地挖，一个一个山坡地种，挖呀，种呀，石头山终于低头了，全村一百六十多亩石山崗都种上了松树，成活率达百分之八十五。別的生产队学习了我們的經驗，也干了起来，全大队的所有石山崗，便全部种上了松树。那些曾經說“石头山种树是枉費心机”的人，也夸贊我們是本地的“活神仙”。

一九六三年春天，家乡的松林发生了严重的虫灾。单是我們塘美村就有一千多亩受害。这些可恶的松毛虫，日夜不停地把葱綠的松叶吃个精光，使漫山遍野的綠林一片一片地枯黃，松树一天一天地枯萎、死亡。这使我痛心极了。我想：除虫是关系到能不能使家乡由穷变富的大事。不管松林有多么寬，松毛虫多么毒，也要消灭它！当时，正值春耕大忙，队里劳动力很紧张，又抽不出現金来购买杀虫葯物。我便发动团員和青年，組織青年突击組，全村共有六个团員和青年参加突击組，我又带头借出十二元給队购买农葯，全队社員也紛紛借出二百五十元，购买了七百多斤农葯。灭虫战斗开始了，我們背着噴霧器上山，一噴射，松毛虫紛紛掉下，把人弄得渾身发痒发痛，有的人受不起农葯的刺激，发呕了，但也沒有叫苦，仍然坚持战斗。第三天，灭虫工作更加艰苦。我們的噴霧器，一般射程只有二至三公尺高，遇到六、七公尺高的松树就噴射不上去。这时，我便放下噴霧器，爬上陡坡，攀上松树，用手抓了六六六粉，一把一把地往树頂上撒。可是风一吹，六六六粉随风扬起，把我呛得发呕，眼睛发痛，眼水直淌。別的青年借来了一副眼鏡让我戴上，可是沒有干多久，口罩的蒸汽把眼鏡蒙得模糊不清，我索性除下眼鏡。正当我撒出一把六六六粉时，风向突然轉变，六六六粉迎面扑来，我感到眼前发黑，眼睛发痛，无法睜开眼了。几个青年見我被六六六粉迷住了眼，便硬把我送回家。家里的母亲見我这个样子，坐在我身边直哭，說：“孩子，如果你的眼睛瞎了，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呀！”我安慰母亲說：“媽，你別哭，我这双眼睛很快就会医好的，就算医

不好，有党，我什么都不怕。”

夜里，我的眼睛痛得难以入睡。我的思想象海涛一样不平静。我想起了解放前家里穷困的生活：一家七口，单靠父亲一个人维持，旧社会的压迫和贫瘠的乡土，迫得父亲到外面颠沛流离，替资本家做工，一个哥哥、一个弟弟和一个姐姐，在艰苦的日子里被折磨死了。解放后，土改分了地，父亲才回家过着安定的日子。合作化后，生活更好了，自己才有机会读书。党的恩情真是比海还深啊！我又想起，当我在学校读书的时候，老师们曾经对我讲述过的英雄黄继光、董存瑞和向秀丽的光辉事迹，他们为了革命战争的胜利，为了人民的利益，用自己的身躯堵住敌人的枪眼，轰毁敌人的碉堡；为了救护国家财产，用自己的生命去扑灭熊熊的烈火。我的眼睛只受了一点点伤，算得什么呢？就是万一不幸，真的瞎了，也绝不后悔！第二天，县林业局李局长请来了医生，替我治疗。经过医治，我的眼睛很快恢复了视觉，我又立即跑到松林，和青年们一起继续进行灭虫战斗。队里也组织了更多的劳动力参加灭虫，终于把全村的松毛虫扑灭。我们村除虫打了胜仗，大队便在这里召开除虫现场会，在全大队范围内掀起除虫群众运动，结果全大队虫害被消灭了。受松毛虫为害的四千多亩松林又恢复了青春，重新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色。

除虫战役胜利了，人们无不欢欣鼓舞，但是，我暗暗算了一下账，塘美村打这一仗，用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开支了一千二百多元农药费，动员了全村一百二十多人，花费的人力、财力、物力太大了。如果能够掌握松毛虫的生长规律，防范未然，在它还未成灾之前，及时消灭它，多么好啊。于是我参加了县林业局开展的虫害业余测报工作。在林业部门的指导下，选择了历年来松毛虫发生较多的四个山岭为固定标准山，在每个山的不同位置选出标准树，进行科学研究，坚持定期观察。有一天，来到松林进行观察，突然乌云四起，暴风雨就要来临。我立即蹲在松树下，了解暴风雨对松毛虫的影响。结果，看到老熟幼虫仍然爬出来取食，次日同样结茧化蛹。就这样，得出了老熟幼虫是不怕暴风雨的结论。有些资料说，松毛虫在越冬期是不会觅食，但经过我们细心观察，又发现在气温高的中午，这里越冬的松毛虫也出来取食，一样能危害松树。由于坚持不懈地认真观察，细心调查的结果，现在已基本摸清了本地区松毛虫的活动规律，采取了在卵期和幼虫期进行灭虫的措施，还学会利用螳螂、蚂蚁、寄生蜂等天敌消灭松毛虫的科学办法。这样，既省人力物力，又能主动制止虫害，有效地保卫了全大队八千多亩松林。

为了进一步改变家乡面貌，在我积极参加造林、护林的同时，还努力进行农业生产的技术改革。几年来，我在和大自然的斗争中，在党团组织的教育下，在干部、社员帮助下，经过艰苦的努力，我已经闯过了劳动关，学会了一般性的农业技术。现在，一般农民能干的农活，我也能干了。除了驯牛和播种我还不熟练以外，其他的农活我都已掌握。

在过去的四年中，我为人民做的工作不多，贡献也很微小。我今后坚决听党的话，朝着党和毛主席所指引的方向前进，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而奋斗！

把广大农民引上社会主义 大道的指路明灯

——《关于农业合作化問題》的学习筆記

严 克 柔

毛泽东同志的《关于农业合作化問題》已經发表十周年了。这是一部在农民問題上发展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著作。十年来，毛泽东同志关于农业合作化問題的理論，已經掌握广大群众，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它把我国五亿农民动员和组织起来，迅速地实现了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在农村中消灭了富农經濟制度和个体經濟制度，使全体农民走上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的道路；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了巨大的农田水利建設，逐步实行农业的技术改造，从而大大地发展了生产力，促进了农业生产一个飞跃接着一个飞跃的发展；同时，农业的合作化又为国家工业化提供了条件，使我国在很短的期間内建立了社会主义工业体系的强大基础，从而为在政治上、經濟上、国防上和科学文化上进行社会主义建設打下了巩固的基础。

农民問題是中国革命的根本問題。不論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还是社会主义革命，农民問題解决得好与不好，都是革命成败的决定性关键。《关于农业合作化問題》正是毛泽东同志解决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农民問題的一部最重要的著作。

对待农民問題，从来就有两条截然相反的路綫，一条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綫，一条是机会主义的路綫。不論是民主革命，还是社会主义革命，都是如此。毛泽东同志坚决地、不断地和一切机会主义路綫作斗争，从而在中国的农民問題上发展了馬克思列宁主义。从毛泽东同志在民主革命时期的許多著作中，都可以看到他在农民問題上是如何的和右的以及“左”的机会主义路綫作斗争。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的《关于农业合作化問題》这部著作，也是同当时的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的。这部著作一开头就說：“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我們的某些同志却象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說：走快了，走快了。过多的評头品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尽的清規和戒律，以为这是指导农村中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正确方針。否，这不是正确的方針，这是錯誤的方針。”毛泽东同志在这部著作中，坚持和发展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論，严厉地批判了当时的右倾机会主义，辨明是非，指明方向，給了领导这个新的历史时期的农民革命运动以最犀利的精神武器。

真理是在同謬誤作斗争中发展起来的，馬克思列宁主义是在同各种机会主义、各种

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思想作鬥爭中發展起來的。毛澤東同志的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思想，是不斷地和各種機會主義的思想作鬥爭，是不斷地總結了群眾革命鬥爭的經驗，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馬克思、恩格斯曾提出過“不能剝奪小農”和“把小農組織到協作社去”以及“農民具有兩重性”的著名論點，列寧根據俄國革命的實踐，發展了馬克思、恩格斯的論點，寫了《論合作制》的著名的文章，提出把農民逐步組織到合作社中來。毛澤東同志根據中國革命（包括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長期積累的經驗，又吸收了蘇聯農業合作化的經驗，從而進一步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理論。現在，我僅從以下幾個方面，談談個人學習的體會：

第一、毛澤東同志給農業合作化找到了符合客觀發展規律的、非常完整的組織形式，給廣大農民指出了一條具體的社會主義的康莊大道。毛澤東同志根據中國革命的實踐經驗，在《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著作中，提出“我們在農業社會主義改造方面採取了逐步前進的辦法。第一步，在农村中，按照自願和互利的原則，號召農民組織僅僅帶有某些社會主義萌芽的、幾戶為一起或者十幾戶為一起的農業生產互助組。然後，第二步，在這些互助組的基礎上，仍然按照自願和互利的原則，號召農民組織以土地入股和統一經營為特點的小型帶有半社會主義性質的農業生產合作社。然後，第三步，才在這些小型的半社會主義的合作社的基礎上，按照同樣的自願和互利的原則，號召農民進一步地聯合起來，組織大型的完全社會主義性質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同樣根據這個逐步前進的原則，在農民群眾的覺悟進一步提高，農業生產進一步發展的基礎上，就必然向更高的組織形式發展。一九五八年，毛澤東同志根據當時形勢的發展和廣大農民的要求，創造性地提出了人民公社的組織形式，從而把我國農業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推上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人民公社這個組織形式也是逐步發展逐步前進的，現階段是以生產隊為基礎的三級所有制，將來，隨著精神條件和物質條件的成熟，就會發展到以大隊為基本所有制，再發展到以公社為基本所有制。這樣，毛澤東同志就非常具體、非常明確地指出了整個的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前進的道路。他不僅找到了從個體所有制過渡到集體所有制的最好的組織形式，而且找到了從集體所有制過渡到全民所有制的最好的組織形式。

毛澤東同志提出的這一系列的從低到高、逐步前進的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組織形式，是完全符合唯物辯證法的。它體現了農業合作化的矛盾運動從量變到局部質變、到完全質變的發展規律，它體現了不斷革命論和革命發展階段論相結合的原則。對農業實行社會主義改造是一個複雜的、長期的過程。把作為資本主義溫床的汪洋大海般的個體小農經濟，改造成為社會主義的大農業經濟，需要經過許多階段的鬥爭，才能最終地解決。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是不斷發展的，生產關係在這個時期適合生產力，過一個時期就不適合了。因此，需要不斷革命。個體小農經濟必須進行社會主義改造，需要一級比一級高地實現農業合作化，同樣，在完成合作化以後，仍然必須實現人民公社化，並且還要經過幾個階段過渡到全民所有制。如果停滯下來，不再革命，那就是右傾

机会主义。但是，要想毕其功于一役，一下子就从个体经济变为全民所有制，那也是不行的，这就实质上剥夺小农，要犯“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事物的发展总是一个阶段接着一个阶段进行的，而每一个阶段也还有其相对稳定时期，没有生产力的一定发展和群众觉悟程度的一定的提高，就不可能促使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向新的阶段发展。这就是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结合的原则。根据这个客观辩证法而提出的农业合作化的逐步前进的组织形式，是一条实现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多快好省的道路。毛泽东同志指出：“这些步骤，可以使农民从自己的经验中逐步地提高社会主义的觉悟程度，逐步地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因而可以使他们较少地感到他们的生活方式的改变好像是突然地到来的。这些步骤，可以基本上避免在一个时间内（例如在一年到两年内）农作物的减产，相反，它必须保证每年的增产，而这是可以做到的。”我们十年来的伟大实践，完全证明了毛泽东同志的话的正确。

第二，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一条非常科学的和非常完整的实现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阶级路线。无论在革命中，或者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都必须解决依靠谁、争取谁的问题。无产阶级和它的先锋队必须依靠真正可靠的力量，才有可能争取可能的同盟者，才有可能孤立无产阶级和人民的敌人。毛泽东同志对农业合作化时期新的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作了具体的深刻的分析，确定了党在农村的阶级路线，就是依靠贫农和下中农，团结中农，消灭富农经济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毛泽东同志说：“贫农、新中农中间的下中农和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因为他们的经济地位困难（贫农），或者他们的经济地位虽然比较解放以前有所改善，但是仍然不富裕（下中农），因此，他们是有一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的，他们是积极地响应党的合作化号召的，特别是他们中间的觉悟较高的分子，这种积极性更大。”把农民中积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贫农、下中农划出来，把中农中并不富裕的下中农划出来，这样，就为我们党在农村中找到了一个占农村人口百分之六、七十的坚强的阶级依靠，保证了农业合作化的顺利发展。

毛泽东同志不仅强调了贫农（包括土改前的雇农）的积极作用，而且对中农又作了具体的分析，把中农分别为上中农、下中农，其中又有新上中农、老上中农和新下中农、老下中农的区别，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阶级学说的创造性发展。大家知道，农民是具有两重性的，一方面是劳动者，另一方面是私有者。贫农、下中农、上中农都是劳动者，但是作为私有者来说，他们的私有观念是各不相同的，贫农和下中农可以说是半私有者，他们的私有观念比较容易改变，上中农的私有观念则比较浓厚，因此，贫农和下中农与无产阶级比较接近，是一切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的死对头，是社会主义道路、集体经济的最积极拥护者，因此，他们成为农业合作化的依靠力量。而上中农则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有的还很严重，他们对合作化的动摇性比较大，有的甚至反对合作化。因此，他们不能成为农业合作化的依靠力量。只有依靠贫农和下中农，对上中农进行教育和斗争，才能团结他们，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这条农业合作化的阶级路线，和他过去提出的民主革命的阶级路

綫，是一脉相承的。毛泽东同志有一句名言：“沒有貧农，便沒有革命。若否认他們，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們，便是打击革命。他們的革命大方向始終沒有錯。”不論是民主革命、土地改革时期，还是农业合作化时期，以至农业合作化以后，党在农村的階級路綫，都是依靠貧农下中农。这是党要长期实行的階級路綫。貧农下中农是农村中革命和建設的主力軍。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一直到进入共产主义以前，貧农和下中农是我們建設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在农村中的社会基础。不論鬧革命或者搞建設，党和无产階級都必須依靠貧农和下中农。离开了貧农和下中农，就等于失去左右手，就会成为光杆司令，講話沒人听，做事沒有人帮，寸步难行。我們要通过階級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大革命运动，来建設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农村中，非依靠貧农下中农这支階級队伍不可。先就階級斗争这方面來說，无产階級同資产階級之間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資本主义道路之間的斗争，是貫穿于整个过渡时期的始終的，必須加强无产階級专政，以确保社会主义革命能够胜利地进行到底。而在农村中，无产階級专政只有依靠貧农、下中农才能实现，也才能在整个国家的范围内形成巩固的工农联盟，才能很好地管理国家，才能有效地鎮压和改造一切敌对分子，才能击破資本主义自发势力的包围。要搞好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两大革命运动，也非依靠貧农下中农这支階級队伍不可，因为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总是在一定的階級关系条件下进行的，階級斗争往往就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中体现出来。我們要的是革命的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它們必須为社会主义服务。只有依靠农村中走社会主义道路最坚决的貧农下中农，树立他們的优势，才能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同时，貧农下中农最勤劳，他們从长期的生产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經驗。他們对改变农村生产落后面貌的要求最迫切，社会主义积极性最高，敢想敢說敢干。只有依靠他們，才能够真正把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搞好，实现生产的不断跃进和生产技术的不断革新。因此，任何以为搞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不一定要依靠貧农下中农的想法，都是非常錯誤的。

作为党和无产階級在农村中依靠力量的貧农下中农，是革命和建設的主力軍。这支階級队伍，一定要組織起来才能發揮最大的力量，因为只有組織起来了，才更有利于爭取党的加强領導，也才更有利于党对貧农下中农的依靠。最近我們广东省召开的貧农下中农代表會議，其重大任务之一，就是成立全省貧农下中农协会委员会，并推动在全省成立各級貧农下中农协会，把这支革命的階級队伍組織起来。这样就能使党在农村中的階級路綫得到更好的貫徹，更有效地推动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設事业迅速发展。

第三，毛泽东同志正确地解决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辯証关系，正确地解决了农业合作化和农业机械化的辯証关系，正确地解决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合作化的辯証关系，从而制定了一套完整的实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針。这个方針就是：第一步，实现农业合作化，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第二步，实现农业机械化。毛泽东同志說：“我們現在不但正在进行关于社会制度方面的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而且正在进行技术方面的由手工业生产到大規模现代化机器生产的革命，而这两种革命是結合在一起的。在农

业方面,在我国的条件下(在资本主义国家内是使农业资本主义化),则必须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机器。由此可见,我们对于工业和农业、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的农业改造这样两件事,决不可以分割起来和互相孤立起来去看,决不可以只强调一方面,减弱另一方面。”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论断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

“先有拖拉机,才能合作化”这个观点是不对的。事实上实现合作化的决定因素,不是机器,而是人的觉悟。我国实现合作化,并不是靠什么拖拉机,而是依靠群众,只要充分发动了群众,特别是调动了贫农下中农的积极性,造成一个革命的群众运动,就能够迅速地实现农业合作化。当然,生产关系的变革不能离开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但是,只有先改变了生产关系,才有可能大大地发展生产力,这是一条普遍的规律。资本主义国家,也是首先变革了农业的生产关系,实现资本主义化,才使农业生产力大大地发展起来;社会主义国家,也要首先变革农业的生产关系,实现农业合作化,才能大大地发展生产力。我国十年来的实践,完全证明了这一点。我国实现了农业合作化,就使农业生产来了一个飞跃;后来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又使农业生产来了一个更大的飞跃。当然,合作化和机械化、社会改革和技术改革,决不可以分割开来,而是结合地进行的。它们是互为条件,互相促进的关系。毛泽东同志指出:“在第一第二两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农村中的改革将还是以社会改革为主,技术改革为辅;大型的农业机器必定有所增加,但还是不很多。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农村的改革将是社会改革和技术改革同时并进。……由于我国的经济条件,技术改革的时间,比较社会改革的时间,会要长一些。估计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农业方面的技术改革,大概需要四个至五个五年计划,即二十年至二十五年的时间。”到了那个时候,中国的社会经济面貌就会完全改观。

“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是实现农业合作化的前提”这个观点也是不对的。恰恰相反,实现农业合作化则是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前提。毛泽东同志举出三点来论证这个道理:第一,“如果我们不能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基本上解决农业合作化的问题,……我们就不能解决年年增长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需要同现时主要农作物一般产量很低之间的矛盾,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就会遇到极大的困难,我们就不可能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第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一个最重要的部门——重工业,它的拖拉机的生产,它的其他农业机械的生产,它的化学肥料的生产,它的供农业使用的现代运输工具的生产,它的供农业使用的煤油和电力的生产等等,所有这些,只有在农业已经形成了合作化的大规模经营的基础上才有使用的可能,或者才能大量地使用”;第三,“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农业技术改造所需要的大量资金,其中有一个相当大的部分是要从农业方面积累起来的”,而这又需要发展轻工业生产,但是,“大规模的轻工业的发展,不是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所能实现的,它有待于大规模的农业,而在我国就是社会主义的合作化的农业”。总之,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如果农业不发展,重工业、轻工业,甚至其他的一切科学、文化的发展,都谈不上。而在我国要发展农业,就只有实现合作化才行。当然,工业和农业,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的农业改造这样两件

事，是决不可以分割起来和互相孤立起来的。它們存在着互相联系、互相促进的关系。但是，把农业放在首要的地位，加速农业合作化，加速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加速农业经济的发展，作为发展工业和其他一切经济事业的基础，这也是一条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规律。毛泽东同志阐明了这条规律，不仅对于实现农业合作化，而且对于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前进，都具有伟大的指导作用。十年来的实践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毛泽东同志说：“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我们党领导农民走革命的道路，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最主要的是做好思想工作。在实现合作化的时期，固然要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就是实现合作化以后，也仍然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由于农民具有两重性，只有在农民的头脑里，不断地消除资本主义思想的影响，不断地灌输社会主义的思想，才能使他们坚定地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十年来，我们曾经进行过多次的社会主义教育，每进行一次社会主义教育，广大农民的社会主义觉悟就进一步提高，他们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就进一步发挥，社会主义的生产建设就进一步发展。现在，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正在进行，经过这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必定大大地促进农村精神面貌和生产面貌的新的飞跃。毛泽东思想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最犀利的武器。毛泽东同志《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著作，曾经在农业合作化时期发挥了巨大的思想指导作用，在十年后的今天，在进行重新教育人、重新组织阶级队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也将继续放出灿烂的光芒。《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仍然是广大农民在社会主义大道上阔步前进的指路明灯。

談談原有工業的技術改造問題

王 冕 农

一、加強對原有企業的技術改造的必要性

廣州市是一個老城市。解放以來，在黨的正確領導下，勝利地進行了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工業生產有了很快的发展。特別是第二個五年計劃以來，進一步貫徹執行黨的鼓足干劲、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綫和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的發展國民經濟總方針，充分利用原有基礎，有計劃地進行工業建設和技術改造，使廣州市的生產面貌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不論生產規模、產品品種、技術水平，都有了很大的發展和提高。十五年來，全市工業生產增長了八倍多，輕工業有了迅速的發展，並建立起一定的重工業基礎。現在，全市人民正在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以自力更生、奮發圖強、難苦奮鬥、勤儉建國的革命精神，迎頭追趕先進水平，多快好省地發展工業生產。解放十五年來，特別是近几年廣州市工業生產發展的經驗證明，充分利用原有工業的物質技術基礎，加強技術改造，是多快好省地進行工業建設的重要方法。這是因為：

第一，廣州市工業雖然有了很大發展，有了一定的物質技術基礎，但是事物總是不斷發展變化的，而且廣州市的工業生產技術在許多方面還和先進水平有差距。為了適應社會主義建設的迅速發展和促進生產技術的提高，把廣州市工業生產提高到新的水平，必須積極採用新工藝、新技術、新材料、新設備，這就要對原有企業進行技術改造。

第二，原有企業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通過階級鬥爭、生產鬥爭和科學實驗，已培養起一批政治覺悟高，技術經驗豐富的老工人和技術人員。依靠和發揮他們的革命干劲和技術經驗，能夠對提高生產技術水平、提高產品質量、發展新產品作出很大的貢獻，促進生產的迅速發展。

第三，原有工業的產品、行業較多，生產門路較廣，有一定物質技術基礎，只要適當充實，平衡設備，開展技術革命和技術革新，組織專業化和協作，就能發揮出很大的生產潛力，負擔發展新產品生產的任務。

隨着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迅速發展，廣州市工業生產任務日益繁重，不僅要大幅度地提高生產水平，而且要求迅速提高產品質量，增加產品品種，降低生產成本，提高勞動生產率。而廣州市的工業老企業多，許多工廠的現有的設備、廠房等條件不能適應形勢發展的要求。這是一個矛盾。怎樣解決這個矛盾呢？從廣州市的實

际情况出发，我们认为解决矛盾的办法，应该是贯彻总路线的精神，自力更生，充分利用原有工业基础，进行技术改造，而不是另外搞许多新厂。对原有工业企业改造，主要是依靠发动群众，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但也需要适当投资，进行设备、厂房的更新配套和改造。

二、安排专项投资，对原有企业系统地进行固定资产更新和改造，是当前加速老工业城市技术改造的有效投资方式

党和政府向来都很重视原有企业的巩固、提高，采取了各种方法和各种形式的投资，对改变企业的生产面貌，取得很大的效果。近几年来，在进一步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过程中，又考虑到广州市老企业多的实际情况，集中安排了专项投资，有计划地系统地对原有企业进行固定资产更新和改造，使这些企业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设备更新，改造落后工艺，充实薄弱环节，加强技术后方，平衡设备和厂房。在广州市来说，这种专项投资的技术改造，已成为现阶段工业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对原有企业进行投资的一种方式。这里所说的对原有企业的技术改造，正是就这种形式来说的。

对原有企业的投资，可以通过各种投资方式，例如：通过基本建设投资，进行改建扩建；通过四项费用和大修理费用，进行设备厂房的改造和修复；通过群众性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使用少量资金改革工艺设备；这两年又采用了专项投资、系统改造的方式。广州这个老工业城市，原有工业企业多，而且原有企业的设备、工艺、厂房存在问题又较多，现在，在实践过程中摸索出来的技术改造专项投资的办法，是从实际出发，行之有效的进行技术改造的好经验。一九六四年，广州市集中了一笔专项资金，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地对一批企业进行比较系统的技术改造，经过改造的企业，在提高产品质量、增加品种、提高劳动生产率和降低成本等方面，都取得显著的效果，提高了技术水平，发挥了生产潜力。

采用技术改造专项投资形式，不仅因为要迅速改进大量的原有企业的技术装备条件，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同时也因为对原有企业的技术改造有其特定的范围和内容。

第一，它不同于基本建设。基本建设以扩大生产为主，技术改造则着重改善生产技术条件，因而在投资和项目的管理上，也应有所区别。基本建设需要列入国家计划进行平衡，技术改造却可以在较小的范围内进行平衡，需要有一定的灵活性。

第二，它不同于四项费用（技术组织措施费、新产品试制费、劳动安全保护费、零星固定资产购置和零星土建工程费）和大修理费用。四项费用及大修理费用的使用范围均有一定的限制，如技术组织措施费只能在原有设计能力和原有工艺过程的基础上，对工艺过程的薄弱环节进行改造，而技术改造却要进行比较系统的改造，包括更新设备，进行工艺改革和设备厂房平衡配套。因而四项费用和大修理费用，无论使用范围或投资规模，都不能适应技术改造的需要。技术改造需要安排专项投资。

第三，它不同于群众性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企业在組織生产中进行技术革新活动，虽然也是改革生产技术，但它是經常性的、解决技术关键的活动，而且一般不需要較多的費用。而技术改造却是按照比較系統地有計劃地进行改革生产技术的要求，从上而下安排改造任务和安排投資的。应当指出，这种区别只是从技术改造活动的方式和投資的特点而言的，在实践上，技术改造当然要与群众性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活动密切結合起来。

三、对原有工业企业的技术改造，必須贯彻执行勤俭建国的方針，充分利用原有基础，发展专业化和协作，提高企业的生产技术水平

对原有工业企业的技术改造，在广州市來說，是一个关系到許多企业今后发展的問題，也是今后一定时期内整个工业建設中的一个重要問題。由于对原有企业的技术改造有其特定的內容、任务和投資管理方法，如何正确地进行技术改造，合理安排投資，达到把生产提高到新的水平的目的，需要在实践过程中不断总结經驗。广州市的初步經驗說明，技术改造必須贯彻勤俭建国的方針，充分利用原有工业基础，发展专业化和协作，积极提高原有企业的生产技术水平，以适应国民經济发展的需要。这是一个总的原則。而在具体工作中，則有如下几个問題值得注意：

（一）技术改造应以产品为中心，按照专业化和协作的原則，在可能的范围内，从原料到加工，从配件到主机，进行“一条龙”的配套改造。

技术改造的最終目的是要提高工业产品的生产技术水平。怎样改呢？是一个企业、一个工序孤立地改呢，还是按照专业化协作原則进行配套改造。显然，后者才是符合客观事物的发展規律的改法，因为专业化和协作是工业发展的規律。要进一步发展广州市的工业生产，有計劃地有組織地实行专业化协作，是必經的发展道路。而以产品为中心进行技术改造，可以更便于在实现技术改造过程中，促进专业化和协作。因此，对原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必須按照专业化协作的原則，以产品为中心，集中力量对产品的整个生产过程的有关工序、有关企业进行“一条龙”的配套改造，配合和促进工业生产組織的合理改組，带动一系列企业的技术改造。

（二）技术改造要以提高产品质量为中心，以維持原有生产規模为主。

由于技术改造不同于一般的基本建設，是为了提高生产技术水平，而不是为了扩大产品的生产能力。所以技术改造应掌握以提高产品质量为中心的原則，使产品的质量、品种、成本、原材料消耗和劳动生产率等技术經济指标，能达到先进水平。当然，經過设备更新和改进生产工艺之后，生产能力一般都会有所提高，但这不是技术改造的主要目的。至于那些利用原有企业的设备潜力和技术条件，通过适当改造和平衡配套，增加短綫产品的生产和发展新产品，也是必要和合理的。

（三）技术改造的设备更新和改革，要同采用新技术、新工艺相結合，以改造原有设备为主，进行平衡配套。

所謂技术改造，就是要改旧立新，但不是原有的旧設備都要全部淘汰，都要換上新設備，都要搞新厂房。應該根据勤儉建国的精神，利用原有設備加以改革，使之适应提高技術水平的要求，有重点地更新那些确实不能再用的設備，增加一些必要的關鍵設備，以积极采用新技术、新工艺。如織布行业的旧式織布机，不仅残旧，而且生产效率低，产品质量不好，不能織市场需要的品种，就应逐步淘汰，換上新型的自动織布机，但原来的一些旧式絡緯机等配套設備，还可加以改造，和新型織布机配套生产，就不宜盲目淘汰。

(四)技术改造要同調整生产布局相結合，以就地改造为主，一般不搞迁厂并厂。

对于那些严重影响安全卫生或布点过于分散、重复的企业，应結合技术改造，适当迁厂、并厂。迁厂并厂也要尽量利用原有企业的厂房进行調整。能够不迁不并的，就坚决不迁不并，利用原有企业就地改造。这样，才不失技术改造的原意，也才能多快好省地对原有企业进行技术改造。

(五)技术改造一定要同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相結合，以专用设备为主，通用設備为輔，以自制改装設備为主，以国家分配設備为輔。

这是在技术改造中依靠群众的积极性和創造性，走群众路綫的办法，又是貫徹自力更生，勤儉建国，多快好省的方針。无数事实証明，发动群众討論技术改造规划，組織工人、领导干部、技術人員三結合解决技术改造所需要設備，群众能够通过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解决許多關鍵問題。群众利用原有設備进行改革，能創造出比一般通用設備更合乎具体产品、具体工艺要求的专用设备来。依靠自己动手制造設備，不但投資少，而且能迅速建成投产。反之，如果不发动群众，只依靠投資购置設備，往往增加了不必要的投資，拖延了改造時間。

(六)技术改造必須加强計劃性，长短結合，有計劃、有重点、分步分批地进行。

这就是要在技术改造中貫徹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方針。只有这样，才能合理利用資金、材料和施工力量，搞完一批再搞下一批，使領導部門能集中力量抓重点；使企业能在迅速完成技术改造任务后集中力量搞好生产，避免長時間处于边基建边生产的状态或年年改不完的状态。

总之，对原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設的各項工作一样，必須高举毛泽东思想紅旗，貫徹执行党的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才能保証实现技术改造的任务，达到把生产技术提高到新的水平的目的。

論工業生產建設高潮中的若干問題

刘 少 力

当前，我国工业和交通战线上的生产建设新高潮，正在以波澜壮阔、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的形式向前发展。如何把当前工业生产战线上高涨着的群众运动向前推进，使工业生产高潮健康地发展，我认为必须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运用唯物辩证法，正确地对待和处理下列一些关系和问题：政治思想和经济、技术工作的关系；产品的质量、品种和数量的关系；增加生产和厉行节约的关系；关于技术革命和管理工作的革命的问题；正确认识苦干和巧干的关系和正确对待生产和生活的问题。

（一）正确处理政治思想和经济技术工作的关系

毛主席一向教导我们，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搞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必须突出政治，坚持四个第一，发扬三八作风，把政治思想工作放在一切工作的首要地位。过去有一些企业没有办好，有的甚至迷失方向，其原因虽然很多，但根本一条是一些企业政治没有挂帅，犯了形而上学的错误；注意了经济、技术，忽视了思想政治工作；注意了物的作用，忽视了人的作用，见物不见人。实践告诉我们，办好社会主义企业，必须学会正确处理政治思想和经济技术工作的关系，在处理两者的关系上，只能是政治统帅经济、技术，而不能是经济、技术统帅政治。当然政治思想工作也必须落实到经济上、技术上，必须与经济、技术密切地结合起来。设备、原材料和技术力量等等，是搞好生产建设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人的思想过得硬，才能使经济、技术工作做出巨大的成绩来。在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如果我们突出政治，做好了人的思想工作，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就能够产生巨大的物质力量，如佛山灯泡厂，过去只能生产十五瓦的灯泡，质量还不过关。经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职工的阶级觉悟提高了，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工厂的生产面貌随之也起了巨大的变化，今年不仅普通灯泡的生产成倍地增长，而且试制成了钨丝灯、水银灯等比较高级的产品。因此，在生产建设中，首先要考虑政治的因素，人的因素，经常抓活的思想教育，在一切工作中突出政治，以虚带实，生产建设高潮将会不断向前迈进。

毛泽东思想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针。在一切工作中，千条万条，毛泽东思想挂帅是第一条。学习毛主席著作是我们做好经济、技术工作根本的根本。用毛泽东思想来武装广大职工的头脑，是我们政治思想工作长期的根本任务。学习

毛主席著作，必須从当前階級斗争和生产高潮的实际出发，针对干部和工人的活思想，用毛主席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回答和解决階級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中的实际问题。当前階級斗争和生产高潮的形势，迫切要求我們更好地学习毛主席著作，提高职工的政治思想觉悟，加强自觉革命，树立当革命闯将的思想，高度发挥生产积极性，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做好各项经济和技术工作，促进生产建设的新发展。

組織工业生产高潮的主要形式是比学赶帮运动。以五好为目标的比学赶帮增产节约运动，既是生产运动，又是政治运动；是政治、经济、技术三结合的最好形式。真正做到政治工作好、计划完成好、企业管理好、生活管理好、三八作风好，并且在执行中能够坚持“一好(政治工作好)带四好”，“四好为一好”，(就是说要首先政治好，以政治统帅经济，来带动其他四好。通过政治工作好、企业管理好、生活管理好和三八作风好，达到完成计划好的目的。)这样，才是正确地把政治思想工作和经济、技术工作结合起来。只有两者正确的结合，才能使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不断的提高，生产高潮不断发展，也才能全面地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各项经济、技术计划指标，才能使社会主义企业成为革命化和现代化的先进企业。

(二)正确处理产品的质量、品种和数量的关系

今年的生产高潮，不是一般的增加产量，而是在保证提高产品质量、扩大产品品种、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的前提下增加产量。这就具体体现了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精神，也解决了多快好省之间的关系。既要提高质量、增加品种，又要提高数量，这是矛盾的統一。没有品种就谈不上质量和数量；没有一定的质量，数量是虚假的，质量提高了，一定的数量又等于质量提高前的更多的数量；质量不好的数量还会给社会主义建设造成巨大的浪费。因此，只有在提高质量的条件下提高产量，才符合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精神。

在当前工业生产高潮中，有些人对产品的质量、品种和数量的辩证关系认识不足，他们往往强调了增产，而放松了质量，这就会造成一部分产品质量的下降。当然，质量下降的原因很多，但最主要的是思想认识问题。有些人片面地认为，搞生产高潮就是增加产量，因此，只追求产量，不考虑质量。产品质量是工业生产的生命綫。产品质量的好坏，不仅关系到企业能不能存在和发展，而且还关系到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是不是在企业中得到正确的贯彻和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既要多快，又要好省，只顾追求数量，不讲质量，是违反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这是一个值得引起注意的大问题。充分认识提高质量、增加品种的重要意义，真正把质量品种放在工业生产的第一位去抓，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要改变那种把生产高潮单纯理解为只是增加产量的片面观点，认真改变片面追求产量，不顾产品品种和质量的做法，以防止质量下降，首先要加强职工质量第一的思想教育工作。越是生产任务重，越应该坚

持质量第一的方针。要“好”字当头，认真对待，克服各种忽视质量的现象，牢固地树立质量第一的思想。在工业生产活动中，要正确的处理质量、品种和产量的关系，把质量放在工业生产的首要地位，在保证质量的基础上增加数量，当数量与质量发生矛盾时，坚持保证质量。必须确立以质量为中心多快好省地完成国家计划的观念，务求做到好中求多，好中求快、好中求省。其次，要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地组织增产。增产必须根据国计民生的需要，根据原材料供应以及设备能力的可能，在保证产品质量的前提下，努力增加生产。在制订计划时要符合客观实际，不搞高指标，不搞附加，不闹“瞎指挥”。要求做到生产资料的质量和品种，必须符合建设和生产的需要；生活资料的质量和品种，必须符合市场和人民生活的需要。第三，要广泛地开展群众性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活动，及时组织和推广先进经验，采取“派出去，请进来”的办法，学习和传播外地的先进操作、先进工艺和先进经验，也要发动群众总结自己能够“摸得着、看得见、过得硬、用得上”的经验，及时总结，用于生产。同时要开展学习技术的活动，不断的提高职工的技术水平。大搞专用设备，提高机械化、半机械化、自动化、半自动化的生产能力，既能提高产品质量，又可达到增产的目的。第四，要加强管理工作。提倡一丝不苟的精神，健全各级技术责任制，严格按照产品标准进行生产；严格执行产品质量的检验制度，不合格的和不合技术指标的产品不许出厂。千方百计地努力为农业生产、国防建设、社会市场、外贸出口以及国民经济各方面制造出性能好、效率高、成本低、寿命长、品种全、数量多，同时又是符合实用、耐用、经济、美观的产品，把社会主义建设办得又快又好。第五，要依靠和发动群众，通过比先进，找差距，找落后环节，制订攻关措施，根据“做什么、练什么、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结合生产，围绕提高产品质量这个中心环节，采取“三结合”的办法，开展大练基本功的群众比学赶帮运动；采取专业组织和业余组织相结合办法，广泛地开展群众性的技术协作活动，参观、表演、展览、评比，互相促进，共同提高。

（三）正确处理增加生产和厉行节约的关系

增加生产和厉行节约，在生产和建设活动中，前者指的是增加产量和提高速度，后者求的是经济效益。这两者是不可分割的，有着彼此促进的关系。增加产量、提高速度是为了争取好的经济效益，而厉行节约又给增加产量、提高速度提供了物质基础。可是，在实际工作中却往往出现增产与节约脱节的现象，特别是在经济情况全面好转，生产和建设需要的物资供应愈来愈充分的情况下，容易忽视节约，因此，在组织生产建设高潮的时候，每一个企业都把厉行节约的工作认真地抓起来，是很必要的。

在生产建设中，节约的方面是很多的，如节约人力、降低原材料消耗定额、组织代用、回收利用废旧物资、充分使用多余库存物资、压缩非生产开支等等。在节约物力方面，最大的节约是如何节约原材料和燃料，包括金属、木材、煤、电、水泥等基本物

資。因为原材料和燃料，是企业經濟活动中的主要部分，如果能通过降低消耗、組織代用、清仓調剂等工作，節約出大批物資，不仅可以降低生产成本和建設資金，更重要的能給生产建設大幅度的增长提供新的物质条件。就是說，用同样数量的物資，可以生产比过去更多的产品，建設更多的工程项目，从而加快社会主义建設的速度。从这个意义上讲，这种節約本身就是增产。

有些人往往把節約原材料同提高产品和工程质量对立起来，一提到产品和工程质量，他們总是想多要材料，要好材料，特别是在強調质量、品种第一的时候，很容易忽視原料、材料的節約，总认为两者不可兼得。

要想产品、工程质量好，必須有质量好的材料；要想扩大品种，也必須有制造新产品的材料。人們重視了质量和扩大品种的工作，从这方面想的多一些，是无可非議的。但是，在保証质量的前提下，是不是一定用那么多好材料呢？是不是就不能節約代用呢？是不是不能扩大使用新材料的領域呢？是不是可以不断提高原材料的利用率呢？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生产技术是不断发展的，人們認識客观事物的水平是随着实践活动不断提高的。把一項事物看成是死的、无法变革的，把人对事物的作用看成是无能为力的，这都不是科学的态度。有許多企业節約原材料的經驗說明，在生产建設中節約与质量之間並沒有不可克服的矛盾，相反的却有着通过節約发展生产的广闊的天地。所以，为節約而忽視质量是錯誤的，为质量而不節約也是不对的。正确的态度是，在保証质量、品种的前提下，千方百計厉行節約，两者必須兼得。这才是革命的精神。

節約原材料、燃料，是生产部門和建設部門的工作。从干部、技術人員到工人，从設計人員到生产人員和建設人員都动手做这件事，才能奏效。要使全体人員重新学习，認識節約的意义，使它与企业的革命化联系起来，看成是继承、发扬革命传统的問題，在思想革命化基础上发动群众采用先进技术、进行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从技术上保証節約工作的进行，向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要人、要物、要設備。要把增加生产厉行節約作为开展比学赶帮的重要内容之一，使增产節約变成經常性的活动。这样，我們就可以節約出大量的原材料，促进工业生产高潮的不断发展。

(四)关于工业技术革命和管理工作的問題

管理革命和技术革命，两者是互相促进、相互制約的。技术革命搞起来了，一定要推动管理革命；管理革命又会反过来推动技术革命。管理革命是属于生产关系的范畴，調整好生产关系，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为了促进工业生产的全面高涨，爭取今年生产建設在质量、品种、提高劳动生产率和降低成本的基础上有一个較大幅度的增长，必須坚决地、有步驟地进行經濟管理工作革命和技术革命。

在經濟管理工作方面，当前主要是存在两方面的問題，一个問題是在企业管理体制上存在着上层建筑和經濟基础不完全相适应。机构庞大，层次重迭，劳动組織不合理，非

生产人員过多，产生了官僚主义的弊病。为了更有效地克服官僚主义，使领导机关更好地接近群众和指挥生产，应该学习齐齐哈尔车辆厂的经验，发动群众，三查四摆，进行机构改革，精简机构，减少层次，简化手续；改革不合理的劳动组织，精简多余人员，整顿规章制度。另一个问题是在工业的生产组织上，特别是机械工业的生产组织上，存在着全能厂多，专业厂少，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工艺和技术后方都各搞一套，缺乏统筹安排、合理分工和密切协作。这种互相重复、分散力量的现象，造成很大的浪费。它同现代化科学技术和工业生产的发展不相适应，束缚了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因此改革“大而全”、“小而全”企业的生产组织，按照专业化和协作的原则，对加工工业，特别是机械工业的工业生产组织进行一次革命性的改组，就成为工业部门当前的一个迫切任务。

技术落后严重障碍工业的进步和发展，仍然是我们工业交通部门存在的突出矛盾之一。因此有必要把技术革命摆在一个新的重要位置上来。必须认识到：技术革命是由调整时期进入新的发展时期，迎头赶上先进，消灭落后的一个主要措施；是全面抓好三大革命——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我们工业交通部门能不能更好地支援农业，提高产品质量，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加速工业交通发展的一个带革命性转变的问题。我们必须对技术革命予以足够的重视。要以革命的精神，要有敢当革命闯将、敢于迎头赶上六十年代、七十年代技术水平的雄心壮志，反对那些因循守旧、无所作为的庸人哲学，解放思想，“敢打敢拼”，使技术革命全面开花结果。

（五）正确认识苦干和巧干的关系，正确对待生产和生活问题

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各项任务，的确不是轻而易举的，要有艰苦奋斗，奋发图强的革命精神和毅力，要提倡实干、苦干、巧干、坚持地干的革命精神，但重要的是要组织群众巧干。广州义隆锅炉厂，在一无材料，二无设备，三无经验的情况下，坚持了自力更生、敢于革命的精神，采取领导、技术人员和工人三结合的办法，自己设计和制造一台三百吨水压机，解决了该厂多年来生产上存在的“老、大、难”问题。汕头无线电厂，经过三年的奋战，闯过了超声波尖端技术关，连续试制成功了人体内脏超声波诊断仪、脑诊断仪、金属探伤仪和探测气压焊缝缺陷的钢轨探伤仪。这些都是实干、苦干、巧干和坚持地干的实例。因此，在组织生产高潮中，要实干和巧干相结合，提倡巧干，反对蛮干。要善于把群众组织起来，发挥集体的智慧。“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就是要集思广益，把事情办好。当前职工群众的生产建设热忱和革命干劲十分高涨。要注意保护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才能均衡地完成生产任务。因此，在生产高潮中不能单靠突击，要有张有弛，生产时间好好干，休息时间保证休息好。群众的生产干劲越大，领导越要关心群众的生活。必须十分注意生产安全，在职工群众中经常进行安全教育，注意劳逸结合，把群众干劲引导到大力进行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上，不随意加班加点，保证职工有八小时的睡眠，保持职工持久的、旺盛的革命干劲，使生产建设高潮得以均衡持续、正常健康的发展。

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是人不是物

鍾 夏

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美帝国主义，为了挽救它在越南南方的败局，大有把侵略越南的战争逐步升级为朝鲜式局部战争之势。约翰逊政府一面急急忙忙地不断增兵越南南方，一面疯狂地轰炸越南民主共和国的领土并逐步深入腹地，并公然对我国进行直接的战争挑衅。由美帝国主义挑起来的正在发展中的这一场斗争，是关系到整个越南民族的生死存亡的斗争，关系到我国的和平和安全的斗争，也关系到世界革命运动前途问题的斗争。全世界的革命人民都严重地关注着斗争形势的发展。在这样的情况下，怎样用毛主席关于人民革命战争的学说，把我们的思想武装起来，坚定地树立起仇视美帝国主义、鄙视美帝国主义、蔑视美帝国主义和打倒美帝国主义的思想，充分地发扬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革命精神，坚决和美帝国主义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

(一)

战争是敌对的双方力量的竞赛，这是比较容易理解的简单的道理。但是，对于特定的战争、如对于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革命战争，作为战争的一方的帝国主义侵略者和作为战争的另一方的被压迫被侵略国家的力量，怎样估计才是正确的、科学的这样的问题，可就不能说是人人都已经解决了。而且，往往由于这个问题没有得到正确的科学的答案，又必然会导致一系列的認識上和理論上的錯誤。其中最常見的錯誤，是形而上学者的“唯武器論”。“唯武器論”者把战争中的人的因素与物的因素绝对对立起来，然后又把物当作战争胜负的决定的因素，他们只看到帝国主义手里掌握着强大的战争手段，却看不到一切帝国主义给自己准备的灭亡的条件。这样，在当代最凶恶的美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面前，他们总是要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夸大帝国主义的力量，长敌人的威风，灭自己的志气，不敢同敌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学习毛主席的关于人民革命战争的学说，用毛泽东思想来武装我们的头脑，就能够有效地清除这些錯誤观点的影响。

二十多年前，当日本帝国主义挥其优势兵力，长驱直下武汉，认为中国武器不如日本，在战争中中国一定失败的論調甚囂尘上的时候，毛主席就在著名的《論持久战》的讲话中闡明了对待这个问题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

“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

军力和经济力是要人去掌握的。”

战争力量是由物和人两个因素构成的。物的因素和人的因素是矛盾着的两个对立方面，它们共处在一个矛盾的統一体之中，存在着互相联系、互相制约又是互相转化的辩证关系。不論是从战争的那一方，只有人的因素，赤手空拳是不可能战胜具备着现代化装备的敌人的，而只有物的因素，一切的装备都成了废物、死物，不能发挥作用。可見，在对战争力量的估計上，見物不見人，或者見人不見物，都是主观的片面的形而上学的观点。但是，只承认物的因素和人的因素构成战争力量的整体，还没有摆脱形而上学，还不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唯物辩证法指明，共处于一个矛盾統一体中的对立着的双方，其中必有一方是起着支配作用的主要的矛盾方面。在物的因素和人的因素的关系中，人的因素起着决定的作用。正如毛主席所明确指出的：“军力和经济力是要人去掌握的”。赤手空拳的人固然不能战胜具备着现代化装备的敌人，但是充分发挥革命精神的人，却能够使自己从赤手空拳轉化成为掌握武器的人，并最后战胜敌人。

关于“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是人不是物”这个著名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不但在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的实践中得到了检验，而且在后来的中国人民反对“美国出錢出枪蔣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以及中朝人民反对美国侵略朝鮮的战争的实践中得到了检验。战争的结果証明，拥有优势的军力和经济力的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了，用美帝国主义现代化武器装备起来的八百万蔣介石军队被消灭了，拥有优势军力和经济力的美国帝国主义也被中朝人民打败了。在当前越南人民的抗美援朝的战争实践中，也有着越来越多的事实証明了毛主席这个著名論点的正确。

在越南南方，美帝国主义强盜的所謂“速战速决”的全面进攻战略的“斯特利——泰勒计划”被粉碎了，所謂重点进攻战略的“麦克納馬拉——阮庆计划”也宣告破产了。为了实现这两項罪恶的侵略计划，美帝国主义从一九六一年派遣“特种部队”进入越南南方到一九六五年二月开始的所謂“有控制地逐步扩大战争”计划这段时间中，已經采用了“直升飞机战术”、“两栖战车战术”，使用了凝固汽油弹、火箭、燃烧弹、球型弹、磷燃烧弹以及化学毒药、毒气等等除了原子弹以外的一切现代化武器和战争手段；据合众国际社的估計，美国在越南南方每年的战費达到七亿七千五百万美元；美帝国主义在这场战争中已經投入了四十亿美元，运进了几十万吨軍火、二千多架飞机、八百多艘舰艇，修建了一百六十九个軍用机场，十一个軍港和一系列的战略公路……在土地面积不到十八万平方公里的小小越南南方投入这么庞大的军力和財力，即使在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史上也是罕見的。可是，結果怎样呢？美帝国主义不但沒有实现它的“平定”南越的迷梦，而且被原来是赤手空拳的南越人民打得焦头烂額；而南越人民武装則在斗争中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一九六一年到今年四月底，南越軍民共歼敌軍五十五万人，其中美国侵略者被歼四千八百九十人；击落、击伤敌机二千一百多架，击沉和击伤敌舰和船只

一千多艘，击毁敌军車二千三百多辆，缴获各种武器六万多件，解放了五分之四的地区和一千万人口，直把这个被有些人形容成“装着核牙齿”的头号帝国主义打得团团乱闖，走投无路。

在越南北方，美帝国主义强盗的所謂“空中优势”、“海上优势”已經成了全世界革命人民嘲笑的对象，它的所謂“逐步升級”的扩大战争的計劃也已經成为它的自掘的坟墓，它的为取得喘息时机而玩弄的“和談”騙局，一次又一次的被揭穿了。被打得走投无路的大劊子手約翰遜和五角大樓的將軍們，本来是企图用轰炸北方和“逐步升級”来逼使英勇的越南人民屈服的，可是，他們从十七度綫炸到二十度綫，从白天炸到黑夜，从使用“战术飞机”到使用“战略飞机”，却只落得个可耻的下场：从二月到六月，被越南北方軍民击落的各种飞机就有三百多架。不但始終沒有炸出个他們所策划的“和談局面”来，反而越炸越使自己陷于孤立，越炸越使自己損失惨重。

所有这些数字和事实，說明美帝国主义强盗虽然在侵略越南这场战争中拥有强大的战争手段，投入了它目前所能拿出来的、除了原子彈以外的一切武器，却还是不能挽救它的注定了的敗局。最近，即使它不得不从其武器庫中拿出第一次参战的“王牌”飞机——B—52型战略轰炸机，也仍然改变不了“战争勝負的决定因素是人不是物”这个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定律。这种被吹嘘成“不是瞄准某一群建筑物，甚至不是瞄准某一建筑物，而是瞄准某一座建筑物的一角，不論是雨天还是晴天，白天还是黑夜，这些炸弹都能命中目标，它們的誤差是以英尺来計算的”具有“毁灭性”的三十架“王牌”飞机，在越南南方的一个两平方英里的目标上，“象雨点般地‘投下了近三百吨具有高爆炸力的’致命的炸弹”，紧接着又派遣一中队B—57战斗轰炸机再去扔了大量炸弹和燃烧弹、发射了大量火箭和炮弹以后，向这个被狂炸的目标地区进犯的美国侵略者，还是被坚守在这个地区的南越解放軍打得喪魂落魄，溜进直升飞机逃命。

毛主席的关于“战争勝負的决定因素是人不是物”的这个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定律，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不但不能加以改变，而且，不断地用他們的实践加以証实。二十多年前的东条英机如此，十多年前的杜魯門、艾森豪威尔如此，現在的約翰遜也是如此。可見这个定律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轉移的。可以肯定，美国侵略者的什么“特种战争”計劃，什么“逐步升級”計劃，什么“局部战争”計劃，以至它的整个战争政策和战争計劃，其实都是建立在反动的“唯武器論”的观点基础之上的，因此，美帝国主义在侵略越南战争中的失敗，是“唯武器論”的破产的最有力的証明。

(二)

为什么在軍力和經濟力方面处于优势的日本帝国主义終于被中国人民所战敗，在軍力和經濟力方面处于优势的美国帝国主义終于被中朝人民所战敗，今天，同样在軍力和經濟力方面处于优势的美国帝国主义被越南人民打得落花流水？这正是因为“軍力和經濟力是要人去掌握的”。而人的問題，首先是精神条件的問題。毛主席在《丢掉幻想，准

备斗争》一文中指出：

“帝国主义给自己准备了灭亡的条件。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人民大众和帝国主义自己国家内的人民大众的觉悟，就是这样的条件。帝国主义驱使全世界的人民大众走上消灭帝国主义的伟大斗争的历史时代。”

“帝国主义替这些人民大众准备了物质条件，也准备了精神条件。”

毛主席在这里提出的这个精神条件，就是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侵略和压迫的产物：“所有这一切侵略战争，加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侵略和压迫，造成了中国人对于帝国主义的仇恨，……迫使中国人的革命精神发扬起来，从斗争中团结起来。……这就是精神条件，没有这个精神条件，革命是不能胜利的。”象资产阶级给自己准备了工人阶级这个掘墓人一样，帝国主义侵略者也给自己准备了殖民地半殖民地这个掘墓人，当美帝国主义的侵略魔爪伸向世界的各个角落，到处建立它的侵略的军事基地，特别是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加紧它的侵略活动的时候，它的掘墓人也就遍及全世界、特别是要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被最后埋葬。因为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已经造成了全世界人民、特别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对于美帝国主义这个最凶恶的敌人越来越深的仇恨，越来越激发起他们的革命精神。所以，在人力和人心的对比上，美帝国主义就处于完全的劣势。美帝国主义给自己准备了灭亡的条件，也就是为被压迫被侵略的国家准备了胜利的条件，这也是不以杜鲁门、艾森豪威尔、约翰逊的意志为转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定律。

在今天的越南战场上，由于美帝国主义对越南人民犯下了滔天大罪，进行了史无前例的掠夺烧杀，激起了三千万越南人民的不共戴天的仇恨，因此，在这一方面对比的优劣是十分明显的。

美帝国主义对越南的侵略战争，是一场不得人心的、非正义的罪恶战争，许多美国青年都不愿意为华尔街的老板卖命，不管约翰逊政府怎样给美军士兵加薪减税，怎样用尽欺骗的手段，还是无法解决兵力不足的困难。被骗到越南战场来的美军，则都是一些不知为谁而战的少爷兵，这些少爷兵的特点是贪生怕死、士气低落。驻扎在嘉裕、胡门和土黄三个山头上的美国少爷兵，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都胆战心惊，怕被打死。他们整天整夜地钻进老鼠洞似的战壕，连头也不敢伸出来。每天的食物和饮水，全部由直升飞机从西贡、岘港或军舰上运来供应，当他们从直升飞机抢到一天的口粮之后，便又慌张地钻进老鼠洞，等待两天一次的轮换。美国的驾驶员不仅随身带着印有十三种文字的投降求救书，而且还携带着种种预备在被击落后使用的东西。美国空军中尉飞行员哈敦·洛克哈特的强盗飞机被击中后被南越民兵捉住，他立即就按照久经训练的标准的美国投降方式，迅速地举起双手，并交出了随身携带的武器装备和证件，他战战兢兢地说：“我怕极了，累极了……”还用手指着自己的肚皮和张开嘴巴，比划着要求给他东西吃。这些胆小鬼真是丑态百出，活现出他们的纸老虎的原形。

同这些美国侵略军形成尖锐的对照的，是广大的越南军民的英雄主义气概。美帝国

主义的压迫和侵略激起了越南人民的同仇敌愾，迫使了南北两方的男女老幼万众一心，坚决起来保卫北方，解放南方，打败美国侵略者，实现一个和平、统一、独立、民主和富强的越南。所以，他们都具有勇敢、顽强、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敢打和敢于战胜美国强盗；他们为革命而不惜牺牲，在生产岗位上拼命劳动，在战斗岗位上英勇作战。越南南方的人民，在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领导下，用他们的勇气、智慧和斗争，给了美国侵略强盗以致命的打击，把越南南方变成美国强盗的坟场。越南北方的人民，在越南劳动党和胡志明主席的领导下，又狠又准地迎击入侵的美国飞机，创造了辉煌的战绩。在不到四平方公里面积的英雄的昏果岛上，拥有现代化武器的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从一九六四年八月八日以来，几乎天天用飞机和舰艇连续轰炸和炮击，结果遭到惨败的却是拥有现代化武器的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至今仍然屹立在越南社会主义北方前哨岗位上的英雄的昏果岛，就是越南人民必胜的精神条件的最形象化的说明。现在，越南北方正在进一步动员自己的全部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布下火阵，随时准备烧死胆敢闯入的美帝国主义这只野牛。

作为战争的一方的美帝国主义，他们的战争是不义的、侵略的、反动的战争，他们的军队不知道为什么而战，不管有什么现代化的武器掌握在这样的胆小鬼的少爷兵手里，他们都不能避免必然失败的命运；而作为战争的另一方的越南人民，他们的战争是正义的、反侵略的、革命的战争，他们是有高度的革命英雄主义，掌握在这样英勇善战的英雄军民手里，不管是什么武器都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原始的弓箭和简单的竹签在越南南方军民的手里，就能够使武装到牙齿的美国侵略军覆没，普通的迫击炮在他们的手里，就能够使停在机场上的战略空军飞机和弹药库里的火箭化为灰烬。简陋的轻武器在他们的手里，就能够制伏最新式的直升飞机，能够击落高速的喷气式战斗轰炸机。

“军力和经济力是要人去握掌的。”我们也承认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要看这些武器是掌握在什么人的手里，看掌握这些武器的人的精神条件。抗日战争的历史、朝鲜祖国解放战争的历史都对这个问题做了结论；今天的越南战争的实践，虽然还没有最后结束，但实际上也已对这个问题做了结论。

为当好革命接班人而学

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部队某部指导员 江孝连

我当指导员快两年了。我为党做了点工作，是自己份内的事，同时，这也是大家一起干的，是上级党培养教育的结果。我觉得从主观上来讲，谁都愿意把工作搞好，在工作中取得最大的成绩，达到预想的胜利，不犯错误或少犯错误，不走弯路或少走弯路。可是怎样做到这一点呢？我常想，我们这些新提升的义务兵干部，都是既无战斗经验，也无连队实际工作经验的，如果不学习毛主席著作，就会寸步难行。因此，我每当接受上级交给我的任务，就以毛主席思想为指针，边学边干，学一点用一点，使自己的思想一步步提高，工作一步步前进。

我为什么要学习，我是怎样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呢？

（一）不忘阶级苦，为革命而学

林彪同志说：“不知过去苦，就不知今日甜。不懂得剥削就不懂得革命。”这话一点也不假。在旧社会我是个逃荒要饭的穷孩子，现在党培养我成为一个革命干部，全靠毛主席思想的哺育。党给了我一切，我的一切都是属于党的。我在笔记本上这样写道：“党是我再生的母亲，毛主席思想哺育我成长，革命是我的终身职业，连队就是我的家。”

回忆在旧社会的悲惨遭遇，联想到今

日的幸福，我从心眼里热爱党和毛主席。在旧社会，我象千百万劳动人民一样，饱受痛苦。一九四三年我刚刚六岁，水、旱、蝗等大灾害一齐向我的家乡河南袭来，国民党反动派只顾疯狂的搜刮民膏，哪管人民的死活，成千上万的劳动人民吃光了树皮，挖完了草根，然后，携老扶幼四处逃荒。我村三百七十多人，死的死，逃的逃，荒后只剩一百多人。就在这时，父母把我三个姐姐卖掉之后，再无别路可走，就开始了流浪的逃荒生活，父亲挑着一副破烂筐子，一头是我的小三弟，一头是全家的破烂。人们成群结队的向东逃去，不知经过多少辛酸的白天黑夜，好不容易才逃到安徽。到了安徽，我的父亲得了重病，眼看着就要死去，母亲为了救父亲，就把我二弟卖给了人家，二弟说什么也拉着母亲的衣襟不走。父亲的病仍然没有好转，为了保住父亲的命，母亲又忍疼把刚出生几个月的小三弟，换了粮食。我父亲的病刚有好转，母亲就吞着眼泪去给地主当奶妈。从此养活父亲的担子就落在我身上了。十冬腊月，我披着破麻袋，光着脚，起早摸黑的讨饭，冻昏过去了，好心的穷妈妈们把我救过来，脚冻烂了，好心的穷妈妈们，又给我双破鞋子，就这样在安徽流浪了四年。旧社会天下乌鸦一般黑，到处都没有穷人的活路，在安徽流浪

了四年，又只得挑着破烂回到家乡河南。艰苦的生活，把我们折磨得不成样子。去时全家八口人，回来时只剩下我们父子两个了。

一九四九年，我的家乡解放了，斗倒了地主恶霸，分地分房，翻了身，父亲当了农会主席，我也参加了儿童团，日子天天向上。父亲对我说：“孩子，生活好了，我也要送你上学了”。我三姐和二弟也从外地回到了家。一九六〇年，在人民政府的帮助下，终于在青岛找到了失散十八年无音信的小三弟，全家幸福团圆。现在父亲是县里的劳动模范，生产队长，二弟是公安战士，三弟是人民海军，党把我培养成为干部，我的家成了光荣的革命家庭。

自从学习毛主席著作后，我明白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在旧社会，是谁使我们牛马不如？是谁压得我们连气都透不出来？是谁使我们受苦受难？是谁拆散了我们的亲骨肉？是吃人的旧社会，是万恶的三座大山，是祸国殃民的蒋介石匪帮，是霸占我国领土台湾的美帝国主义。在新社会，是谁使我们翻身作主？是谁把我抚养成人？是谁使我们亲骨肉团圆？是伟大的共产党，是敬爱的毛主席。我憎恨旧社会，憎恨祸国殃民的蒋介石匪帮和它的靠山美帝国主义，我热爱新社会，热爱共产党，热爱毛主席。想想过去，看看现在，望望将来，就知道应该怎样革命，怎样说，怎样做，才是自己的本份。否则，就是忘本。现在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受苦受难，台湾同胞还没有解放，蒋介石还叫嚣反攻大陆，国内外的阶级敌人还在兴风作浪。我要永远革命，为解放苦难的人民，握紧手中枪。

我的体会是，只有不忘阶级苦，才能为革命而学。学习毛主席著作，使我懂得了旧社会为什么苦，是谁给我们的苦；怎样消灭这些苦，只有革命。主席还教导我们怎样革命，革谁的命。有苦不忘苦，就得学毛主席著作，永远干革命，不会走弯路。“忘记过去，就等于背叛。”只有不忘过去的苦，不忘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受苦人民没解放，才能够永远革命。我认为，要经常“敲打”自己，牢记过去的阶级苦，如果不经常“敲打”自己，过去的苦再深，仇再大，时间长了，也会忘掉。

（二）不忘阶级斗争，为兴无灭资而学

这十年来，我思想中也一直进行着无产阶级思想与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人的头脑，是没有真空的，正确的思想不去占领，错误的思想就会占领。如何抵抗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呢？就是学习毛主席著作。毛主席说：“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是一个事实，有些人否认这种事实，否认阶级斗争的存在，这是错误的。”学习了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公报后，我更明白了过渡时期的阶级斗争是长期、曲折、复杂的，知道了阶级斗争的新形势新特点。我们一时不注意改造，就会受资产阶级思想侵蚀。因此，必须从生活的各个领域里，加强兴无灭资的思想斗争。比如，当干部后我能接受批评了，谁要是批评我，谁就是我的朋友。又比如当干部后，我仍然积极参加打扫卫生和副业生产。我常想，扫把锄头虽轻，不到两斤重，但时间长了不拿，就会弯不下腰，扫把锄头也会变成千斤重，这样长期下去，就会把官兵一致的光荣传统丢掉。于是，我看到地不干净，就经常

拿起扫把来扫，連里通信員见我經常扫地，把扫把从我手里夺回去，我說：“这是份內的事，这次不动，下次不动，時間长了，手就懈了。”我們不能让自己沾染这样的老爷作风。經常参加劳动，是鍛炼和改造的最好机会，也是带动部队的最好方法。去年預备期挖魚塘时，靠近廁所的地方是臭的，好多人怕臭，我就一人到最臭的地方去挖，大家见我上去了，也都跟来了，战士肖新美說：“指導員都不怕，我們怕什么。”我經常这样想，在平时工作中严格要求自己，不仅仅是为了起带头作用，更主要的是改造自己的思想，使思想更加革命化。去年出差开会回来，早上吃了飯，赶到車站正好是十二点过五分，超过了五分钟没搭上回駐地的車，要坐車必須等到下午五点。白白地等五个钟头嗎？不！走路。当时想，走路也得吃点东西再走吧，对面就是飯店了，但想来想去，还是不吃，扛着行李就走了。这不是我舍不得几角錢，也不是没粮票，我是这样想的，上飯店吃飯也是一个习惯，經常外出开会，这次吃了，下次还想吃，吃来吃去，就会把我們无产阶级的作风吃掉。一个人是越吃越馋的。我記住：懶、馋、貪是和平演变的开始。我們时刻要注意提高警惕，經常和资产阶级的思想作斗争，在生活上永远保持普通一兵的本色。去年到广州开会，战士们见我還是穿那套黄衬衣，就要我换上弟弟寄来的那件白衬衣，說我再不穿就要留坏啦！何况开会也好看点。我說，坏不了，这件黄衬衣最好看，因为这是当战士时，公家发给我的，黄衬衣穿起来更美。有时早上出操回来，通信員給我打好洗臉水，晚上又給我挂蚊帳。我对他

說：“你是来为人民服务的，不是来为我服务的，你們这样做，就会培养我們的特权思想。”我常想，在职务上我虽然是一个指導員，但在生活上我應該是普通一兵。因此，在我的日記本里就这样自我警惕地写道：“变！事物发展的规律，从参軍到当班长，从排长到当指導員，职务在变，責任在变，但是普通一兵的本色永远不能变。”我的体会是：时刻不忘阶级斗争，处处事事兴无灭資，牢牢記住自己是普通一兵。

(三)不忘党的事业，为工作而学

一九六三年三月，我接下了老指導員的班。党把一个連队交給我，是叫我把部队建設成为平时完成任务出色、战时打仗能过得硬的連队。但是我們連由于“四个第一”不够落实，事故不断，訓練成績老不及格，是連續两年“四好”不沾边的連队。我想，一定要把連队建設成为过得硬的“四好”連队。我牢記毛主席的教导：群众是真正的銅墙铁壁。我們只要依靠群众，就沒有办不到的事。这时团首长也鼓励我說：“路是人走出来的，干革命就要在不懂的情况下开出一条道来”。我想，要把一个落后的連变成一个先进的連队，就要作出很大的努力。大家选我当支部書記，我就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去做，要善于当好“班长”。我便給自己訂出三条要求：（一）要发扬民主作风，倾听大家意見；（二）积极向大家学习，特别是要向連长学习，要他帶好徒弟；（三）自己帶头实干，遇事走在前头。从此，我經常到班、排里去，哪个班缺人，我就把行李搬到哪个班去，又是炮手，又是指導員，与战士们“五同”，与他們同生活，共呼吸，他們有什么問

題，我就能很快了解，他們有什麼思想，也願意和我談。過去我們連的伙食搞得不好，影響訓練熱情，去年我搬着行李兩次下炊事班，住了一個多月。第一次下去，發現伙食搞得不好，原來問題出在班長身上，班長蘇登廣說：“我們當炊事員的，一天能做三頓飯就完成任务了”。其他人見班長不起勁，干工作也沒情緒，每天早上四點鐘就起來做飯，有時還不能按時開飯，一天工作達十二個小時，同志們都反映伙房工作累，不願意干。我和他們一塊起床，一起做飯，才發現原來他們分工不明確，叫干啥就干啥，廚具放得也很亂，有時起床沒水用，還得摸黑去打水，才能工作。我和他們開了几次會，明確了分工，安排好工作秩序，這樣，五點半鐘起床做飯，工作還是很松的。第二次又下去，專門和炊事員一起研究做飯做菜技術，經過一段時間的實驗，伙房變了樣，做的菜花樣多了，同志們吃了也很高興。

對打“翻身仗”，一開始，還有些人的勁頭不大。我想“氣不鼓不成”，但怎樣“鼓”法呢？還是從“認識論”上開刀，重學“失敗是成功之母”吧。這是第五次學了。想不到，這次一提出來，有的戰士就說：“你看哪！指導員又搬老古董了。”有的戰士問我：“指導員，咱們為什麼老失敗不成功呢？是不是這首詞，不合咱們的譜！”我發現戰士們對“失敗是成功之母”，還停留在口頭上，沒有變成實際的行動，不懂得矛盾的轉化必須有一定條件。於是，我給大家講了“雞蛋能變雞仔，而石頭就不能變成雞仔”的道理。告訴大家，從失敗到成功需要有個條件，這個條件就是：認真接受經驗教訓，鼓起勇氣，從頭干起。我問

大家，我們接受了教訓沒有？為成功創造了條件沒有？許多人被問得張口結舌，面紅耳赤。有人說：“我們拿着雞蛋等雞娃，沒按毛主席的指示辦事”；炮班戰士說：“有人鍊炮時，坐在甘蔗地裡吃西瓜，沒有下苦功”；司機班檢討執行規章制度不嚴，牽引火炮上陣地，沒放架就倒車，差一點又出事故。這一談，大家認識提高了，勁頭也上來了，紛紛找教訓，擺條件，訂措施，決心創造四好。我最後又綜合了大家提出的有利條件和積極措施，大家受到了鼓舞，看到了希望，增強了信心，有的說：“干革命就要天不怕，地不怕，敢把一切妖魔鬼怪踩在腳底下！”有的說：“一座山，兩座山，不管什麼大山，我們都要用精神原子彈把它炸掉！”頓時，全連的鍊兵熱情振作起來了，第一次實彈射擊打了個優秀，把兩年不及格的帽子摘掉了。

（四）不忘黨的培養教育，為當好接班 人而學

在我接指導員的班的時候，我曾激動得在日記本上寫道：“黨培養我教育我，現在又把一個連隊交給我，這是對我的極大的信賴，親愛的黨，請你放心，我要用我全部的力量，回答你的信賴，用最誠實的語言把毛澤東思想傳給戰友。”

十年來，黨費盡了心血，把我培養教育成人，我怎能忘記。我經常對戰士們說：“我們接班要接無產階級的班，接毛澤東思想的班。”有一次吃餃子，一個廣西的新同志，不愛吃面，他把餃子心吃光了，將餃子皮丟到喂豬桶裡去。當時我想，在舊社會討飯時，我母親對我說：“孩子！什麼時候能吃一頓窩窩頭就心滿意足了。”這

在旧社会是幻想，而在新社会不但吃飽子还吃餃子。接着我就用手將那个新战士丟了的餃子皮撈出来給大家看，我說：“我們丟一个餃子皮，就等于丟掉无产阶级的本色，劳动人民不知費了多少心血，流了多少汗，才把一点粮食生产出来，又經過多少劳动人民的手，才把它做成餃子，到我們的手里就把它丟掉，我們怎样对得起劳动人民呢？”后来，同志們在吃飯时都很注意了，桌子上掉一粒飯也要拾起放到嘴里。

要使連队革命化，首先要我們干部革命化，有了革命化的思想，才能帶出革命化的部队，干部一个不革命化，就会导致連队出大事情。俗話說，“上梁不正下梁歪”，比如拖拉作风，是我們連的一些干部的老大难問題，看电影时跑到中間，看戏时爭在前面，开会时蹲在后面，誰都不愿意吃亏。上级經常教育我們要培养无产阶级的家风，我們这个样子，能接毛泽东思想的班嗎？非下决心整頓不可。我給他們講道理，說明这是资产阶级思想和阶级斗争在我們部队的反映，革命老前輩在枪林弹雨中，为搶救战友，不惜牺牲自己宝贵的生命，而我們对这些小事却不能相让嗎？我想这主要是由于这些同志有驕傲自大的思想，缺少共产党员的胸怀，忘了伟大的理想。

只有伟大的理想，才能产生无穷的力

量，才不会自滿，才会永远朝前看。理想是什么呢？理想就是共产主义。要达到这个伟大的理想，需要五代至十代人的時間，要动員千千万万的人去参加，这是非常伟大而艰巨的任务。我們所作的工作，和伟大的理想相比，是非常渺小的，决不能有一点点成績和进步就自滿起来，就停滯不前。有一次团里集合，我們部队到达指定地点时，已超过五分鐘，团长批評了我們。开始有人強調客观原因。我想：林彪同志教导我們，時間就是力量，時間就是军队，打起仗来，这五分鐘就是胜敗的关键。所以，我們对自己的工作绝对不能滿足，我們在取得成績的同时，也要看到自己的缺点。于是在支委会上我首先檢討，让大家展开批評与自我批評。去年四好总評时，群众給我們干部提了很多意見，我觉得这些意見提得很有水平，二班长吳流明說：“指导員你想想，你总是自己一个人干，不发动大家，培养大家，假如你离开了这个連队，我們怎么办？”可不是么，光我們自己干好工作还不行，还要培养后代，现在班长們就耽心接不上班。我們的任务是实现共产主义，如果有一些成績就自滿起来，这就是沒有伟大的理想、沒有思想革命化的决心的表现。有了理想和决心，我們的工作就能搞好，就能防止自滿，永远前进！

发扬愚公移山精神，苦练杀敌本领

南澳县云澳公社荖园大队女民兵 蔡婵丹

一九六二年夏天我初中毕业了，父亲想让我继续升学，我也已考上高中。这时，正值党中央和毛主席号召全国民兵练好本领，准备杀敌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参加生产劳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我忆起父亲讲过的祖辈世代受压迫剥削的家史，想到敌人还在梦想卷土重来，这不正是自己练好本领，杀敌卫国的好时机吗？党培养自己念到初中毕业，具备了一定的文化，把它带到农村，不是可以更好地发挥作用吗？对！就这样，我打消了升学的念头，回到家乡参加农业劳动，并担任了大队的民校教师。

不久我报名参加了民兵，被分配到炮排学习当炮长。起初，我感到很高兴，觉得学习打炮的技术，当名炮手是件多么难得的事啊！学炮的第一天，听教员讲课，什么间隔密位求距离呀，观察爆炸点呀，修正偏差呀，……越听越糊涂。接着作了测量目标距离实习，在一段六百米的距离中，我错测为四百多米，误差二百米左右。我的思想开始动摇了，不好意思地站在一旁，轻轻地說：“还是叫别人学习吧，我学不了！”经过教员的说服鼓励，表面上虽不敢怎么说，但内心着实感到为难：打炮这玩艺原来这么复杂，我当民校教师，每天上午、晚上都得上课，下午又要备课和劳动，那里能挤出时间学习，什么时候才学

得会呢？当天晚上在床上辗转反侧，老合不上眼。为了解决学炮的困难，我学习了《愚公移山》，边读边想：愚公能有这么大的雄心壮志，敢于搬掉两座大山，难道学炮这点困难我就克服不了吗？只要遵照毛主席的“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教导去做，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何况没有文化的耀丹姐都能炼成一名优秀炮手。我一定要把炮长的技术学到手，一定要当一名优秀炮手。学习的信心提高了，勇气也就鼓起来了。此后，便妥善安排好工作时间，积极参加集体训练。我还利用一切空隙时间，勤学苦练基本功。在家时利用扁担练简便射击；在田里就练锄头柄练射角；臂力不够就在睡前饭后练举石头；为了提高观测能力，就经常到野外用手指、柴枝、小树、电线杆等作测量距离实习。不管是烈日当头的炎夏，还是寒风刺骨的严冬，都不间断地刻苦练、反复练。有一次，我到菜园浇菜回来，边走边练测量距离。不防一脚碰上石头，人跌倒，桶摔坏，爬起来，又再练。经过一番苦练，终于战胜了困难，不到半年，就能在各种不同的天气下面进行正确的观察。

我还和班里的同志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共同提高阶级觉悟，认识“全民皆兵”的重大意义，和“练为战”的道理，以政治带业务，思想带技术。我们全班，不怕脏，

不怕累，苦練杀敌硬本領，結果全班四人都成为优秀炮手。

一九六四年七月，我們参加了民兵集训。在第一次考核射击中，成績与男炮班同样是五发三中，只是男炮班射击所用的时间是七分四秒，我們却用了八分。当时我們认为下次射击只要加快速度就行了，沒有認真找出慢的原因，提出改进办法，結果第二次实弹射击出乎意料地打了个五发一中。我們焦急得几乎哭出来，感到对不起党的培养，要是这样下去，怎能消灭敌人呢？应该想办法提高技术，把功夫練到家。但在这失败了的情况下，如何提高大家的信心和技术呢？我組織大伙一起学习了毛主席的《愚公移山》、《为人民服务》等文章及有关“人民战争”的論述。大家越学越有味。我們从毛主席的著作中得到了战胜困难的勇气，也分析了打不好的原因在于挖座板坑的速度慢，調整瞄准器、修正偏差的技术不过硬，我們認識到，天下沒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只要进一步树立“練为战”的思想，带着阶级仇恨練，带着敌情

观念練，严肃認真地对待每一个环节，就能打得快、打得狠、打得准。“干！”我們立刻行动起来，晚上先打好隔天的洗脸水，早上提早起床，大伙剛在打水洗脸，我們就把炮迅速推进操场，紧张練起来，中午不休息，晚飯后不逛街，晚上开会后有点时间也不放过：不是在室外練挖座板坑，就是在室内装瞄准器、学插标杆。經過一段时间的刻苦努力，在第三次战斗射击中终于以四分四十九秒五发五中的优异成绩，超过了男炮班（包括簡便射击女炮班总評优秀、男炮班良好）。后来，在另一次簡便射击中，又以四分七秒的时间发射八发炮弹，其中六发命中目标。最后在比武大会上和汇报表演中又以三发三中、五发五中的优异成绩获得了“神炮班”和“神炮手”（全班）的光荣称号。这次比武使我进一步体会到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我在日記中写下了这样的体会：“我們能取得这样的成績都是毛主席教导的，沒有毛主席教导我們克服困难、刻苦練好基本功，是决不可能取得这样的成績的。”

一切为了革命

佛山市棉二厂 李淑速

我到工厂参加劳动，已經有十三年多了。以前，我只知道积极劳动、搞好生产是我的本份，究竟为什么而劳动，却是不明确的。一九五九年我参加了厂里的青年突击队，那时曾学过毛主席的《矛盾論》，但是由于学习目的不明确，不懂得为什么

而学，学习方法不对头，沒有做到活学活用，学得不入心。加上那时感到文化水平低，学习信心也不足，所以学习过几遍就放下了，沒有坚持下来。一九六四年学习了解放军和其他同志的先进經驗以后，才明确学习是为了革命，要做一个革命的人，

就一定要学习毛主席著作，一定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从此，我就开始坚持学习毛主席著作。一九六四年，我主要学习了《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三篇文章。一九六五年，我着重学习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将革命进行到底》等文章。

学习《为人民服务》，就解决为人民服务的问题。一九五八年以前，我一直是做打纱的辅助工，这一年，我有机会上机台学织布，虽然没有固定的机台，是顶生病工人的工作，心里也十分乐意。后来我又调回去打纱。自己虽然意识到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服从组织分配，但思想上却对织机恋恋不舍，认为织机工资比打纱多一倍，工作又比较好做，因而产生了“打纱衰”的思想。几年来，这个思想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这一次，我就带着这个思想问题来学习《为人民服务》。我反复地琢磨毛主席说的“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这句话，努力领会毛主席的思想。一边学一边想怎样才算为人民服务，这时我的脑海中涌现出张思德同志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光辉形象。张思德同志，他不计较个人得失，党和人民需要他做什么，就做什么，根本没有考虑过工作有好坏之分，在各个工作岗位都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而我呢？不过是由打纱到织布，又由织布转到打纱，调动了一下工作，就考虑这考虑那，兜来兜去都在工资待遇问题上打转，这那里是在为人民服务？我越想越觉得自己过去的思想不对，越想心胸也越开明。张思德同志把做什么工作都看作是为人民服务，我今天为建设

社会主义而劳动，做什么不也都是为人民服务吗？织布和打纱都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为了革命，那有衰和不衰之分呢？当我看到毛主席说“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的时候，更加认识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可贵，个人主义的可耻。我下定决心，革命需要我做打纱工，我就做一辈子打纱工。我解决了这个思想问题之后，便帮助组内的同志们学习《为人民服务》这篇文章，大家也都解决了“织机好，打纱衰”的思想，思想上提高了，生产上也进步了，我们继续保持了先进小组的光荣称号。

一九六四年八、九月间，由于遭到台风的袭击，我们的厂房漏雨，有的机器损坏了。有一位工人提出要等机器修好才上班。我要她换一个位置，但她嫌位置不好，不愿去，我批评了她两句，她不服气，两个人就顶起嘴来了。我心里很不愉快，觉得做组长是受气，不如不当算了。后来又平心静气一想，觉得自己也有不对的地方，为了一件小事就和组员吵起来，这样下去，以后还有谁敢提意见呢？心里感到有些不安。有了思想问题，我便向毛主席的著作请教。我学习了《纪念白求恩》这篇文章，白求恩同志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共产主义精神给我很大的启发和教育。心里想到组员提一点意见自己就感到是受气，甚至连组长也不想当了，这那里有大公无私的精神？又想到，如果自己学习白求恩同志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把自己的机位让给她，把困难留给自己，也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了。想通了，我便到她家里去访问，向她做了自我批评，还在小组的班后会上检查了自己的缺点，这样，彼

此之間的意見就消除了，增強了團結。

一九六四年第一季，我們在生產上碰到了困難。由於紗的質量不好，嚴重地影響到打紗的產量和質量的提高。這時，領導上建議我們學習《愚公移山》。九十來歲的愚公尚且把兩座大山看得不在話下，決心要把它們搬走，我們碰到紗不好的問題，也一定要把它解決掉。學習了《愚公移山》後，我們小組的同志便一起研究解決困難的辦法。想來想去，想出了在紗上噴火水的辦法。實行這個辦法，產量是可以突上去了，但質量卻不好，因為噴過火水的紗打在紗錠上容易脫落，給織機生產帶來很大困難。我想，自己雖然完成了任務，但卻把困難帶給了別人，這怎么能算是為人民服務，我一定要想辦法來徹底解決這個問題。我和同志們研究，發現造成質量差的多是緯口長，上頸滾緯等毛病，只要操作得法，這些毛病是可以避免的。我們便用白求恩同志的“精益求精”的精神來勉勵自己，互相幫助，共同提高操作水平。我們還創造了適合具體情況的崗位責任制，來保證產量、質量的提高。結果，在大家的努力下，超額完成了產量、質量的任務。

今年四月間，當領導上決定要提拔我做脫產的車間黨支部書記的時候，我思想上很不安靜。要當幹部，這件事我是連發夢也不會想到的。腦子里各種想法翻來復去，總之是信心不足，決心不大，所以對這個問題我一直不表明態度。領導上見到我思想不通，便建議我學習毛主席著作。我學習了《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進一步明確了工人當家作主的重大意義，知道愿不愿當幹部問題，不是什麼小問題，而是對革命工作的態度問題，是要不要繼續革

命的問題，這樣，眼睛就明亮起來了。領導上為了幫助我提高認識，又派我到廣州去參觀《廖初江、丰福生、黃祖示學習毛主席著作展覽會》，我看到這些同志帶著深厚的階級感情學習毛主席著作，更加激發了我的階級感情，覺得他們是為了革命而學，而自己雖學了毛主席著作，但當革命需要自己的時候，思想上卻沒有為革命的打算，這真是不應該的。我再一次給自己提出這樣的問題：是革命到底，還是半途而廢；是為人民服務，還是為個人打算？我帶著這個問題重新學習《為人民服務》等文章，認識到千千萬萬的革命先烈，為了全國人民的解放，為了實現共產主義的伟大理想，不惜流血犧牲，獻出了自己的生命，難道今天我們在和平環境里，為了革命需要，組織上叫我擔負重一點的工作都不願意嗎？現在只是多做一點，辛苦一點，有什麼問題呢？我寫了這樣的學習心得：“作為革命人，不要為自己打算，要為革命着想，為集體着想，為人民着想。既然組織上需要我當幹部，我就要服從分配，叫到那裡就到那裡，把革命担子接過來，盡我的一切能力搞好工作。”我又想起幾個月前，我學習《將革命進行到底》的時候，曾經認識到：“我是一個共產黨員，如果不鬧革命，不把革命進行到底，就是違背革命的老前輩的教導，就是違背人民的意志，就是損害黨的事業。如果要革命，就要多學毛主席著作，聽黨的話，按毛主席的指示辦事，把自己的一切獻給黨，宁愿犧牲自己的生命，也不能損害黨的事業。自己一定要起模範帶頭作用，一定要做黨的好女兒，一定要做革命的人。”現在，我又用這些話來勉勵自己，我想通了

以后,再也不为要当干部而苦恼了,我主动向领导同志作了检查,愉快地接受了新的

任务,满怀信心地走上了新的战斗岗位。

(张振华 整理)

克服困难,不断前进

紫金县烏石人民公社荷光大队 郑添群

一九五五年我小学毕业后,回到家乡参加农业生产。一九五六年,我参加了共青团。一九六二年并大队的时候成立团总支支部,我当选为团总支书记。那时,我一方面感到这是党对我的培养,同志们对我的信任,所以有搞好工作的热情;另一方面,又感到自己水平低,不知能不能搞好工作,信心不强。一开始,我就碰到了许多实际困难。当时,团的组织生活不够健全,团对青年的教育做得不够,一些青年的觉悟不够高。怎样解决这些问题呢?我想不出什么好办法。起初不敢大胆地把团的工作抓起来,还不敢主持团的总支会议,一定要请党总支书记参加,讲话也讲不上两句,就再也没有什么好讲了。主要是想到自己周围三百多个青年中有六十多个是能说会道的高中生、初中生,而自己只是个小学生,又是女人。加上一些调皮的知識青年譏笑我。如在一次会议上,我正在讲话,有几个青年交头接耳地在低声議論:“这算什么报告,上句不接下句,我才听不进去”。“小学生领导高中生,真是千古奇闻!”。我听到这些话,感到十分难受。我的心冷了下来,自卑心理和消极情绪在发展着。說心里話,当时我真想打“退堂鼓”,但又不敢說出来。一九六三年初,我

在报上看到雷锋的事迹,了解到雷锋的成长和他热爱毛主席的书有很大关系,这一点对我有很大的启发。我就买了一本《为人民服务》来讀。我一連讀了两三遍,許多名詞不懂,也領会不到文章的精神实质。一天晚上,我帶着《为人民服务》去請教好朋友陆惠梅同志(她是高中毕业生),經過她讲解以后,才体会到做人一定要象张思德同志那样,为人民而生,为人民而死,做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我又把《为人民服务》讀了几遍,牢牢記住毛主席的話:“我們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績,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們的勇气”。我用主席的話来对照检查自己,認識到过去只看到团支部問題多,看不到团员落后是可以教育的;看到个别調皮的青年看不起自己,就对所有的知識青年怀疑起来,因而就想不干了。如果人人都象我那样,荷光大队的青年工作不是永远都落后嗎?毛主席的指示,使我看到了改变支部面貌的有利条件,我搞好工作的勇气就更加提高了。一九六三年三月,我在县团干訓練班进一步系統学习了雷锋的先进事迹,比較深刻地認識到雷锋所以成为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是他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結果。我体会到一个人要干革命,就必须学

习毛主席著作，我一定要象雷锋同志那样，时时刻刻读毛主席的书，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指导自己的行动。这两年来，我反复学习了《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青年运动的方向》等二十多篇毛主席的著作。学习以后，我下决心要象白求恩同志那样，做一个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要象张思德同志那样，做一个为人民而生，为人民而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要象雷锋同志那样，做一个毛主席的好女儿；还要象愚公一样，敢于藐视困难，敢于和困难作斗争。我紧紧依靠党支部的领导，发挥了团支委的集体作用，加强了政治思想工作，整顿了团支部，使落后支部跃为先进。

一九六三年秋天，我生了一个小孩，做起母亲来了，整天不是屎就是尿，出門三步孩子叫。“有孩子还能干革命工作嗎？”說真的，我当时确实想得很多，有时偷偷地对着孩子哭，有时又想把团支书辞掉。但又想起党、团组织对自己的培养，想起毛主席的教导，想起雷锋同志的事迹，辞职的念头又打消了。但是实际困难没有解决，思想上总是矛盾着。后来，我重新学习了《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等几篇文章，认识到我虽然是有孩子的媽媽了，但不能因为小孩牵累而放弃工作。小孩我要爱，但我更爱革命事业，我要跳出家庭小圈子，投入到为人民服务的大海中去。产后四十天，便背着小孩去开会，逐家逐户找青年谈心，有时把小孩留在家里，小孩哇哇地哭，引起我母亲很大的不满，邻居也劝我把团支书辞掉，这使我心里七上八落，十分苦恼。工作无论如何要

坚持，可是，眼前的困难如何对付呢？我想来想去，想到母亲拉后腿，主要是思想落后，只有帮助她提高觉悟，才能解决问题。一天吃晚饭的时候，我讲了妇女在解放前的遭遇和解放后的地位，启发母亲回忆对比。接着又把白求恩的故事讲给父亲、母亲和弟妹听。父亲觉悟较高，有点文化，听完后就说：“我们应该向白求恩学习，你好好工作吧！”可是，母亲却不出声。我见父亲支持自己，吃过晚饭后便把《为人民服务》这篇文章拿给他看，并有意激他说：“爸！媽媽罵我‘貪高帽子戴’，我不当团支书算了”。被我这样一说，他有点生气地对我说：“你去吧，不要管她！”，后来，母亲经过父亲的教育，思想觉悟也有一些提高，只要我说去开会，她就答应我去，不再罵我了。从此，我工作起来又一身轻，可以放心干团的工作了。

做工作经常遇到很多困难，但是一碰到困难，我就想起了毛主席的话：“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有一次，我发现一个团员为了找爱人，终日东奔西撞，工作消极，阶级观点模糊，找对象不问阶级出身，我便找他谈话，启发他，教育他。谁知竟惹来了一些落后社员的冷言冷语，说什么“妇人家不知羞，成日同男人打交道”，我听了虽然不舒服，但我想到我是团支书，为了工作，为了帮助同志，我一定要顶住这种歪风邪气。我不管那些无聊的冷言冷语，继续找他谈心，并把毛主席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介绍给他看。这个团员觉悟过来了，工作也积极起来了。还有一位女青年，刚刚十八岁就想结婚，我便有意地和她一起学习《为人民服务》，学完后启发她谈心得。她

說：“過去我怕困難，今後我要積極勞動，多為人民做點事”，還說：“我本來就想結婚了，現在想起來早婚對自己對革命都沒有什麼好處，我決定不那麼早結婚了。”我還鼓勵她創造條件爭取入團。從此，她工作、勞動、學習都很積極，一九六四年九月光榮地參加了共青團。幾年來，我和三十多個團員、一百五十多個青年談過心，交了朋友，我們相處得很好，他們有心理話都肯和我說。

我和支委、團員民兵一起，在黨支部幫助下，組織了十九個毛主席著作學習小組，發動了二百七十個青年參加學習。團員、青年、民兵學習了毛主席的著作後，精神面貌有了很大的改變。有的青年，過去不安心在农村的，現在安心了；有的階級觀點模糊的，學習後，劃清了敵我界線。現在全大隊三百多個青年，絕大多數都是生龍活虎，朝氣蓬勃的，我們組織了青年突擊隊，改變低產的山坑田，種高產的試驗田，去年青年試驗田只有三十六畝，今年增加到二百四十畝。一句話，學習了毛主席的著作後，團員、青年的政治熱情是大大高漲起來了。有的老年人也不禁稱贊說：“青年人學了毛主席的書，確實是變好了。”由於我們堅持學習毛主席著作，用毛主席的思想來武裝自己，所以團的工作做出了一些成績，連續三年被評為四好團支部。

一九六四年春，大隊制訂生產計劃時，把推廣良種列為重要的增產措施。但是由於過去推廣一些外地良種沒有成功，所以有不少社員的保守思想很嚴重，不願意推廣良種。我那個陽光生產隊是全大隊三十六個生產隊（現併為二十一個）中比較窮

的。地少，但是土地潛力沒有挖掘出來；人多，但是人的思想還沒有解放出來。怎樣才能改變這個窮攤子呢？我想過很多，我曾和隊長、老農商量過，但始終想不到什麼好辦法。讀了毛主席的《介紹一個合作社》後，我想，應舉社多災多澇，過去也很貧苦，辦社以後，為什麼會富裕起來呢？是因為他們發揮了集體的智慧，同自然災害進行艱苦的鬥爭的結果。毛主席在這篇文章里說：“窮則思變，要干，要革命。一張白紙沒有負擔，好寫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畫最新最美的畫圖。”當時團縣委號召青年團員搞科學實驗，毛主席的話大大地鼓舞了我，堅定了我搞良種試驗的意志。

那時，公社黨委書記到東莞開會帶回來好幾斤“珍珠矮”良種，我要了半斤回來，公社書記鼓勵我好好試驗，創造成功經驗，以便在全社推廣。回來後，便和隊里兩位團員一起把種子播下去，決定搞單株留種試驗。當時的生產隊長有保守思想，他不但不支持我們，而且和落后社員一起反對我們，說：“半斤谷種，煮飯食都不夠，也想搞試驗！”，“什麼種都好試驗，偏偏要拿矮種來試驗，割米也是假的。”一些保守思想嚴重的社員也冷嘲熱諷，說什麼：“食只黃豆想上天哩，搞試驗，不要想得那麼容易。”我毫不猶豫地頂住這些保守思想，一方面宣傳科學試驗的意義，宣傳“珍珠矮”的好處，一方面批判保守思想。可是，那兩位團員泄氣了，說：“不搞了，免得受氣，冷言冷語聽不入耳。”在這種情況下，我用毛主席《關於重慶談判》中的一段話鼓勵他們：“什麼叫工作，工作就是鬥爭。那些地方有困難、有問題，需要我們去解決。我們是為著解決困難去工作、去鬥爭的。越

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这才是好同志。”后来我们又重新学习了《愚公移山》和《为人民服务》两篇文章，树立起“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信念，把科学实验坚持下来。

经过我们精心管理，秧苗长得很壮。队里的田都基本插完了，才轮到插我们的“珍珠矮”，由于插单株，比较麻烦，我要求队长给我们抽几个劳动力帮助插下去，他不肯，说：“这是你们的事。”后来，我同记分员商量：“叫小学生帮帮忙，要记些工分给他们。”记分员答应了。就这样，小学生们拔秧，我们插秧，一直到天黑才插完。中耕施肥了，我向队长要肥料，队长说：“你们自力更生吧！”经过一番周折，才搞来三斤化肥施下去。要求社员帮助耘田，又说：“你们这块试验田，鸡狗才耘得了，我们没有这个本事。”由于我们细心管理禾苗生长得很好，我们带队长去看。他还不服气说：“还未结谷呢，谁知谷粒多不多？”估

产的时候，不少人也看不起我们的“珍珠矮”，估得很低。总之，从插秧到收割，都是我们三个人做的。整个试验的过程都贯穿着激烈的思想斗争。党支部为了推广“珍珠矮”良种，在我们收割的时候，组织队长们来参观，县委第一书记也来现场看过，大家都表示满意。收割结果，我们一分试验田收割湿谷一百〇五斤。试验成功后，干部和社员看到“珍珠矮”确实是好，晚造各生产队纷纷换种倒播，在党支部领导下，使今春大队百分之八十的田都插上“珍珠矮”。

我在工作中体会到，只要时刻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就能克服一切困难，取得胜利。我学习毛主席的著作还学得很少，以后我一定要更加努力地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路是人闢出来的，只有敢拼敢闢，才能取得胜利。

一九六五年五月六日

学习毛主席著作，促进生产新高潮

江门市星光厂 梁 陈

今年以来，我们厂出现了生产新高潮，这个生产新高潮的出现，最根本的原因，是由于我们全体职工大学毛主席著作，运用毛泽东思想来不断解决生产上的矛盾。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前进力量的源泉。在这方面，我们有几点体会。

坚持一分为二，大破庸人哲学

我厂是一间以生产出口伞骨为主的小

厂。它是在一九五六年由八间日用小五金制造厂合并改造起来的，生产技术条件相当落后，机械化程度很低，手工操作占绝大多数。一九六三年初，我们生产的钢伞骨，由于软硬不一，防锈力差，退货很严重，要靠生产日用小五金来维持。当时，有人担心工厂能否继续存在，也有人觉得出口生意难做，真是“黄蟠上沙滩，不死一身潺”。总之，思想很混乱。在这样严

重的困难面前，我們沒有退却。在中共江門市委的領導下，採取堅決措施，依靠群眾，自力更生，決心戰勝困難。經過半年努力，開始扭轉了局面。一九六四年，我們大學毛主席著作和大學解放軍、大學大慶、大學上海，不斷用毛澤東思想武裝幹部和工人，深入而持久地开展比學趕幫運動，職工思想有了提高，生產技術狀況有了改善，生產水平有了提高。一九六四年，實現了一百三十三項技術革新項目，調整了三條生產工藝流水綫；自動傘把的產量比一九六三年增加了十多倍；勞動生產率增加了百分之一百；可比產品成本下降了百分之十三點六；過去質量不好遭受退貨的自動傘把已躍進到優等品；花色品種也增加了。總之是從被動轉變為主動了。

我們帶着勝利和喜悅跨進了一九六五年。這時，在一部分幹部和工人中，產生了一些不正確的思想情緒。有的人認為經過一九六四年的技術改造，許多手工操作已變為機械化生產了，今年的技術革命、技術革新已經轉上“新”的階段了，這種所謂“新”的階段，說的是，項目不可能搞得這麼多了，速度不可能搞得這麼快了，因為一些“老、大、難”的關鍵問題是不容易突破的，技術革新只能慢慢來。有的人認為經過一年奮戰，和先進廠相比，可比的經濟技術指標互有高低，差距不大了。這些論點，是一種缺乏革命理想、缺乏革命的雄心壯志的庸人哲學，如果不克服它，就會變成繼續前進的絆腳石。針對這種思想傾向，我們組織幹部和工人學習了毛主席著作的一分為二的辯證法和“虛心使人進步，驕傲使人落後”的教導。初步

懂得了要用一分為二的觀點去看待去年的工作，既要看到成績，又要看到缺點和不足的地方，不能躺在成績上面睡覺。在這樣的思想基礎上，為了更加具體地了解我廠和先進廠之間的差距，組織了領導幹部、工人、技術人員三結合的隊伍到外地去參觀學習。我們發現，除了在經濟技術指標上有很多不如人的地方外，在技術改革問題上，也存在着三大差距，這就是：我們想做的，兄弟廠已經做出來了，如窩釘機；我們沒有想到的，兄弟廠已經着手做了，如自動落夾碼機；大家一齊動手做的，我們還在搞，兄弟廠卻已經正常投產了，如雙頭拮孔機。這樣，大家對去年工作的評價就比較正確了，不僅看到成績的一面，而且實實在在地看到了當前廠的生產還有很多缺點，還有很多薄弱環節，還有很大的尚未被挖掘出來的潛力，還有很多問題正等待我們去解決。熱昏了一陣的頭腦清醒過來了。現在回過頭來看，我們是進行過一場辯證法和形而上學這兩種對立的思想之間的鬥爭。這也就是革命鬥將的思想和庸人哲學之間的鬥爭。庸人哲學用孤立的、靜止的和片面的觀點去看問題。只看到成績，看不到缺點，看不到薄弱環節。同時把一九六四年初兄弟廠的經濟技術指標也看成是固定的、不變的、僵死的，而把自己奮戰一年的戰果和人家去年年初的指標相比，看不到別人也在前進，看不到那些指標有許多早已被刷新了。採用這種“比較法”，還有什麼革命鬥將的氣味呢？後來，我們收集、整理了我們廠同上海、廣州兄弟廠的可比的經濟技術指標的資料，對比之下，上海的九項指標，我們全部不如人家，廣州的二十一項

指标中，我們有十八項落在人家后面。这就更清楚地說明了，差距不是“不大了”，而是大着呢！我們不但学会用一分为二的方法去看待成績，而且也用一分为二的方法去看待差距。存在着差距，比人家落后，当然不是什么好事情，但是存在差距也就是表明存在着潜力，只要我們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我們就可以把潜力挖掘出来，从而消灭差距，把生产搞得更好。我們一方面从成績得到鼓舞我們前进的信心，另一方面，也从差距中看到自己前进的目标和方向，差距同样能激励我們前进。这样，比先进、学先进、赶先进的热浪又掀起来了。

是靠自己力量搞高潮，还是 等待人家“給”高潮

这个思想問題解决了，工作上也有一些进步，可是我們碰到了这样一种情况：任务少，“吃不飽”，生产能力有剩余。大家都在組織生产新高潮，我們任务少，吃不飽，能不能組織生产新高潮呢？起初我們认为，“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只要安排足够的任务，我們是完全可以搞生产高潮的。有的同志不同意这种看法。他們說：“如果你们生产搞得很好，人家是会主动走上門来要貨的。”这些話启发了我們。我們想寻找“吃不飽”的原因是什么。我們帶着这个問題学习《矛盾論》。在学习的时候，大家爭論得很热烈，有的說主要是对外貿易部門安排任务不够造成的，主要是由于外因；有的人說，主要是由于內因，自己生产搞不好。毛主席告訴我們說：“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內部，在于事物內部的矛盾

性。任何事物內部都有这种矛盾性，因此引起了事物的运动和发展。事物內部的这种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一事物和他事物的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則是事物发展的第二位的原因。”我們联系到自己的实际，除了生产能力和生产任务之間的矛盾之外，还找出了許多矛盾，如质量不够好，成本高，品种少，等等，再經過分析比較，我們终于发现，由于我們的产品质量不如人，成本高过人，花色品种少过人，一句話，价不廉，物不美，所以，訂貨少，銷不多，对外貿易部門安排的任务也就少了。所以主要原因不在于“銷”，而在于“产”，是我們自己本身的問題，不是对外貿易部門的問題，是內因，不是外因。如果能够提高质量，降低成本，增加花色品种，那末我們的任务肯定会多起来的。那种认为如果給我們多安排任务，我們就能够搞高潮的看法是不对的。这实际上不是要自己搞高潮，而是要人家“給”高潮。

問題找到了，我們便采取措施，抓住质量、花色品种、成本三个方面，作为主攻方向，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围攻这三个关键問題。我們圍繞质量的薄弱环节，开展技术革新。一到四月份共实现技术革新项目三十九項。为了增加花色品种，我們組織了三个战斗小組，分工包干攻打，結果从三月底到四月底就試制成功五种新产品，这些新产品受到很大的欢迎，得到对外貿易部門的重視，省內外一些制伞厂也再三要求供应。为了降低成本，我們进行了較周密的調查研究，摸清降低原材料消耗定額、工时定額的潜力，鮮明地提出“攻打4000高地”的口号，即要把每打自动伞把的成本降低到40元。經過一个月的奋战，

现在“4000高地”已经打下来了，四月份，每打自动伞把的成本已降到三十八元五角。

由于我们在质量、花色品种和成本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果然促使订货增加，生产任务，从三月份的“吃不饱”到五月份就变成“吃不消”了。我们认为，对于“吃不饱”和“吃不消”，都要用革命的积极态度来对待。“吃不饱”的时候，要想办法“吃饱”，“吃不消”的时候，要想办法“吃消”，“吃不饱”和“吃不消”的情况是会经常发生的，它们是不断相互交替的，平衡只是相对的，而不平衡则是绝对的。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不断组织新的平衡，达到新的统一。

自力更生是法宝

经过几年的实践，我们深刻地体会到，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是免费的“万有公司”。象我们这个“小而穷”的厂，要主要靠国家投资来进行技术改造是不可能的，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实现由旧变新。在原有的技术基础上进行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有的不要花钱，就是花了钱，由于生产的发展，也可以很快的收回来。几年来，我们搞了二百七十多项技术革新项目，使生产技术状况起了很大的变化，把制造小五金件的残旧设备改造成生产高档出口伞骨的较先进的设备，改革了落后的工艺流程、工艺操作，不断地收到了立竿见影之效。自一九六三年到今年四月止，我们厂为国家积累了二十八万三千四百元，相当于同期国家投资三万八千元的七倍半。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具有挖之不尽的潜力，具有万能的本领。解决“吃不饱”的问题，要靠它；解决“吃不消”的问题，也要靠它。

试制新产品，要靠它，提高新产品的质量，也要靠它。对于我们来说，要掀起生产高潮，进行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是一条根本的途径。过去我们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技术革新，今后也应该坚定不移地这样做，在这方面，我们既有经验又有教训，这就是按照自力更生的指示办事，我们就取得成功，一离开毛主席思想，我们就“上下交困”。最近为了生产一种新产品，我们起初要求上级投资三万元来制造专用设备，后来想了一下，觉得上级不一定给这么多，自己也还可以想一些办法，所以第二次申请的时候，我们只报了二万五千元，最后上级批准二万元。这时就有人说，给也给多点，差也不差几千元。我们觉得，对于钱，一定要一分为二来看待，不可迷信钱，不可迷信钱多好办事。我们一方面组织学习《矛盾论》，一方面用自己的活生生的教训来教育大家。一九六四年，上级曾拨给我厂六千二百元作为购买薄铁剪床之用。我们有了钱，就一心一意想购买一台新的电动剪床，经过四个多月的联系，写了不少信，发了多次电报，剪床还是毫无着落，到不了货。后来我们带着这个问题学习毛主席著作，用一分为二的观点来检查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在过去上级给钱很少的情况下，我们能自力更生，搞出了不少专用设备，现在上级给我们的钱多了，我们为什么就不发动群众自己来制造呢？有了钱，这是有利条件，但是如果不善于对待它，就会转化为不利条件，钱多了，就容易使人眼睛向上，眼睛向外，忘掉掉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和群众路线，而这正是我们发展生产的最可靠的力量。在钱少的条件下，要把人和钱的关系摆

正，在錢多的条件下，同样也要把人和錢的关系摆正。这就是，在人和錢的关系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人的因素，人的因素第一，錢的因素只是占第二位。提高了認識以后，决定自己动手制造，再經過計算，觉得六千二百元是用不了，决定削減二千元到別的项目去，在制造过程中，发扬勤俭办企业的精神，利用大厂的厚鋼板边料来代替生鉄机座，結果只用了二千八百多元就制造出来了，而机床性能并不会比新买的差多少。这台大剪床今年三月份正式投入生产，使伞柄开料的效率提高了百分之五十，由过去日产三千条猛增至四千五百条以上。总结起来一句话，无论在錢多或錢少的时候，都要自力更生，都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来进行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自力更生的“自”，不只是领导干部的“自”，而且主要是群众的“自”。群众成年累月地和机器打交道，非常熟悉机器，完全有能力进行革新，也有进行革新的强烈的要求。作为领导者的责任，就是要站在群众前面，帶領他們，支持他們。

毛泽东思想是我們前进力量的源泉

我們深刻地体会到，要搞好生产，掀起生产高潮，最根本的是用毛主席的思想来武装干部和群众，去“帶領”群众，做到毛泽东思想挂帅。而真正做到这一点，就要大学毛主席著作，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潮。一年多来学习毛主席著作，使群众的精神面貌起了很大的变化。有的工人說：“在学习毛主席著作以前，自己的工作有点散漫，学习了毛主席著作以后，才感到厂是自己的，自己是厂的。所以工作

起来就不怕困难，尽量要多做一点工作。”有不少工人还学会运用《矛盾論》和《实践論》的一些原理来解决生产上的問題。伞柄小组在学习《矛盾論》的时候，用一分为二的辯証法来检查自己的工作，认为小组一年多来产品的产量质量是逐月提高的，但是仍然不适应当前的要求。在查矛盾、找差距的时候，找出了磨光这个工序是主要矛盾。这个工序有四个工人，其中两人超定额百分之二十，另外两个达不到定额，影响整个伞柄生产的速度。因此，针对这个矛盾，进行比学赶帮。在比学赶帮过程中又发现产量低的工人思想認識上有問題，主要认为自己已經尽力做了，人家手快，自己手慢，这是一定有差距的。大家又帮助她克服自卑感，并在技术上給予具体的帮助。經過一番努力，产量便从达不到定额增加到超过定额百分之二十。有的工人，还会运用《实践論》的观点来解决問題。伞把安装小组的工人，过去对于五金零件不是用千分眼、千分手来檢驗，只靠眼看手摸来判断它是否合标准，零件稍一不順手就把它当废品报銷，这样“生魚”就混在“死魚”里面，“生魚”也变“死魚”了。学习了《实践論》之后，懂得了要認真进行調查研究的道理，严格地用仪器来檢驗。这样，就“救出”了許多不該死的“生魚”，浪费就大大减少了。

总起来說，我們厂学习毛主席著作，是取得了一定的成績的，但是，这仅仅是开始，学得还不够深，不够好，以后还要繼續努力。我們决心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来推动生产的新高潮。

一九六五年五月廿八日

大种紫云英的哲学

新会县人民委员会 陈锦源

一九五七年，新会县开始试种冬种专用绿肥，种了苕子二百五十亩，紫云英三十亩，苕子绝大部分成功了，而紫云英却全部失败了。一九五八年和一九五九年，继续试种了一些，也是苕子成功，紫云英失败。一九六三年，冬种专用绿肥发展到一万一千五百多亩，其中紫云英种了五十七亩，但半途犁掉的就有三十亩，其余二十七亩产量也很低，亩产三千斤以上的只有三亩，其余二十四亩只有一千斤左右。一九六四年，紫云英的种植，得到大面积的发展。从一九六三年的五十七亩增加到八万四千七百多亩，增加了一千四百八十多倍，平均亩产三千五百斤，最高的亩产九千九百斤。这是高速度的发展，巨大的胜利。这个胜利的取得，不是一帆风顺的。种植紫云英的过程，充满着矛盾和斗争。从根本上来讲，这是辩证唯物论和形而上学、唯心主义之间的斗争。我们学习和运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大破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才取得这样大的胜利。现在想根据初步的总结，谈谈几点体会。

决定大种紫云英，是从我县实际情况出发的，既有需要，又有可能。而且这是我们经过调查研究，总结了自己的经验和认真地学习了外地先进经验而作出的正确的判断。有了正确的判断，也就有坚定的

决心。

经过多年的大搞水利和推广良种，新会县的农业生产有了很大的增长。为了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必须解决土壤肥力的问题。为此，新会县在一九六四年冬打了三个歼灭战：圈猪积肥、大种绿肥和降低地下水位。为什么要打大种绿肥的歼灭战呢？先让我们对情况作一些分析。要解决肥料问题，多施化学肥料是办法之一。但是，一则国家目前还不能大量供应，充分满足增产的需要；二则在目前条件下，过多地、单一地施用硫酸铵，会引起土壤的板结，有的地方土壤板结已严重到拖拉机也犁不动的地步，从而使土地十分瘦瘠；三则成本高，拿一个例子来说，如礼乐公社东仁大队，一九五七年每亩施硫酸铵二十斤平均亩产七百五十斤，以后几年连续大量施用硫酸铵，到一九六三年平均每亩施用量达六十斤以上，平均亩产八百斤，增产不过五十斤，而多用硫酸铵四十斤，增加成本七元。所以，对化学肥料应该一分为二，在目前的生产技术条件下，化学肥料好是好，但却是不能多用。多施人畜粪便是解决肥料的另一办法，但是施用量也是有限度的。增加土杂肥，入泥、入沙，也是一种有效的办法。到外地去采集绿肥，也是可行的。但都是要花费相当大量的劳动力。而大种绿肥，则可以做到以田养田，以地养地，用地和养地相结合，

既解决当年所需的基肥问题，收到“立竿见影”之效，又能恢复和增加土壤的有机质，达到“潜移默化”之功。我县土壤的有机质含量是比较低的，一般只有百分之一点左右，而要稳定亩产一千斤，有机质含量要高得多，多施绿肥正是一种对症下药的措施。同时，利用种绿肥来解决基肥问题，比之到外地采绿肥或入泥、入沙，不但效果要大，而且还可以节省大量劳动力，这些解放出来的劳动力，可以投放在搞小型水利、平整土地和搞多种经营等方面；比之施用化肥可以节省成本。一句话，大种绿肥是自力更生开辟肥源的主要途径，是多快好省地提高土壤肥力的带有战略性措施的一着。因此，我们决定在一九六四年冬大力扩种绿肥。

但是，在进行规划时碰到了这样的问题：群众愿意种苕子，不愿意种紫云英。他们认为它娇生难管，对水、肥的要求高，没有栽培经验；有些技术干部还抱住“紫云英不能种在岭南”的迷信不放，认为由于温度和日照关系，紫云英在新会难高产。可是当时向外地购买苕子种子很困难，肯定无法满足需要，而紫云英的种子则较容易买到。不少外省绿肥老区的同志都向我们介绍，紫云英早熟高产，留种易，绿肥生产的发展是由白花（罗白青）到蓝花（苕子）、由蓝花到红花（紫云英）的，能种红花不要种蓝花，能种蓝花不要种白花。这样，矛盾的焦点便集中到是否大种紫云英来了：不大种紫云英，便不能解决绿肥问题。面对这种情况，县委认为必须正确总结自己的经验和认真学习外地的经验。于是召开了绿肥总结会议，辩论新会能否种紫云英。毛主席说：“判断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

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在一九六三年冬种的三亩紫云英亩产三千斤的事实面前，大家统一了思想，认为新会是可以种紫云英的，而且可以获得亩产三千斤以上。因为这是经过实践检验过的，尽管它是在较小的范围内受到检验。对待自己的经验应该一分为二，这就是要看到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成功的虽然只有三亩，在数量上是少数，但是，这少数成功的经验是十分宝贵的。对于失败的教训，也要仔细分析，好好吸取。我们看到，过去有些种失败了，主要是掌握不到紫云英的特性，信心不强，放松管理，甚至半途犁掉，而不是因为新会的自然条件不能种。这是人的主观能动性问题，而不是客观条件问题。可以说，成功也在于人，失败也在于人。不能全部否定自己的经验。为了学习外地的先进经验，我们组织了一个绿肥考察组到湖北、广西考察，研究当地绿肥发展的历史，绿肥生产和粮食生产的关系，当地的自然条件和我县的有什么不同，绿肥高产的自然条件等。我们还组织了各公社党委农业书记和县农业局的技术干部到广西容县学习栽培紫云英的经验。在学习方法上，不单是听讲课，而且看展览，做实习，提疑问。这样一方面既解决了思想问题，又大体上解决了技术操作问题。这样，我们便把紫云英的特性、好处看准了，栽培经验学到了，容县种植绿肥经过多次失败直到成功的经验，使我们得到很大的启发和鼓舞。还认识到容县的气候条件和我县的差不多，土壤还比我县差，他们能够成功，我们有了容县的经验，也一定能够

成功。大种紫云英的信心大大增强了。通过对实践经验的总结，我们得到了这样的结论：新会能够大种紫云英。这是认识上的一个飞跃，是由物质到精神的飞跃。既需要，又有可能，我们便当机立断，决定大种紫云英。在实践的基础上，把需要和可能统一起来。

二

在种植紫云英的整个过程中，我们学习和运用了毛主席的关于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的思想。对于我们来说，种植紫云英是一件新的事物，在新事物面前，既不能退缩，也不能冒失。在战略上，我们藐视种植紫云英，把它看得不在话下，我们提出，一定要把紫云英种成功。但是，在战术上又要重视它，就是说，认真对待有关种植紫云英的每一个具体问题，不断地解决具体的矛盾。为此，我们集中了优势兵力来打歼灭战。我们层层成立机构，层层有人负责。各级绿肥机构，经常召开会议，发现问题，及时采取措施解决。我们还层层开办种植紫云英的技术训练班，把技术交给广大干部和群众。这是因为我们考虑到虽然有一些干部有种植紫云英的直接经验，也有一些干部到外地学习过间接经验，但是对于大多数干部和群众来说，他们还是陌生的，必须加强技术指导，统计全县共训练了一万三千多人次。我们还聘请了四十四名外省绿肥老农作技术顾问，分配在各公社的绿肥样板田作技术辅导。这样，每个公社都有两、三个有经验的老农指导技术，每个生产队又有两、三个经过训练的技术人员。由于有了足够的技术力量，就有力地保证

了种植紫云英的技术措施的实行。

在我们直接经验不足的情况下，在种植紫云英的整个过程中，我们估计到一定会碰到不少问题，有的甚至是事前估计不到的。种植紫云英，一方面和“天”斗争，和“地”斗争，另一方面又和虫斗争。在紫云英生长的整个过程中，人的因素在影响它，“天”、“地”、虫，也在影响它。如果我们不能有效地和“天”、“地”、虫作斗争，那末，紫云英就不能种成功，矛盾就会向失败那一面转化。为了具体地领导生产，及时提出解决具体矛盾的办法，找到适合本地条件的栽培措施，各级都搞样板。县委在不同类型地区搞了十五个样板点，公社、大队、生产队的领导干部都和技术员（老农）、群众结合起来搞样板田，在行动上先走一步，按照高标准、高质量的要求来进行生产，把容县的高产经验先在样板田实施，取得直接经验，在直接经验的基础上消化间接经验，这样，间接经验转化为我们自己的直接经验了。在自己亲自实践的基础上，我们就能加深容县经验的认识。例如，由播种到发芽阶段的水分管理，容县的经验是：“既要发芽水，又要水浸芽”。我们在实践前对这条措施是体会得很不深刻的，认为我县地下水位高，土壤粘结，保水力强，主张排干水才播种。结果由于晚造晒田晒得干，加上冬季雨水少，造成发芽水不足，出芽结瘤都受到抑制。后来才坚决贯彻执行播种后二至三天保持田间有二至三分浅水层的技术措施。有了自己的实践，也才能对容县的经验一分为二。容县的经验，在新会的条件下，基本上是适用的，但一部分可以加以发展，一部分需要修改或不用。例如，在一

个公社的大队样板点的补接根瘤菌的实践中，創造了田間灌淺水层后，用幼砂拌根瘤菌剂撒施补接法，这样既化工少，又效果好，很快就在全县推广。我們做到，既学习，又創造，把学习和創造結合起来。绝对地肯定，绝对地否定都是形而上学，是违反辩证法的。这样，我們每走一步，都能在小范围内先把容县的經驗放在实践中来檢驗，然后再根据实践的结果，提出适应本地条件的措施进行推广。这样就能不断地解决主观符合于客观的問題，有效地解决矛盾，扎扎实实地指导生产。这样我們就能对矛盾实行“各个解决”。

我們还体会到，不但在每个阶段、对每个环节，都要对各个矛盾实行“各个解决”，而且对每一个局部也要实行“各个突破”。在实际工作中，我們認識到检查生产不能光看百分率。对百分率也要一分为二。为了对全局有一个基本的估計，要有百分率，但不能“迷信”百分率，而要具体分析先进地区、单位和落后地区、单位的矛盾，光看百分率，就会把先进和落后的矛盾掩盖起来。例如，环城公社共种紫云英六千亩，在生产中期公社汇报約有百分之八十是好的、成功的。按照我們平常的看法，一个公社的生产，有百分之八十是一类苗，只有百分之二十是三类苗，可以說是不错的，不会觉得有什么大問題，而且还可能会表扬它。这次我們在該社作了比較深入的調查，发现这百分之二十的三类苗全部集中在城东片，三类苗占該片种植面积的百分之八十以上。这种情况其他公社也有所存在。这说明先进的片和落后的片之間的差距是很大的。如果只看該社种植紫云英成功的百分率，而不对具体

情况作具体的分析，那不是掩盖了先进和落后的矛盾嗎？正是由于进行了一分为二的分析，发现了問題的严重性，县委及时召开了消灭三类苗會議，立即掀起了消灭三类苗运动，使全县三万六千亩三类苗中有二万五千亩上升为二类苗，亩产也有二千五百斤至三千斤。所以，在失败占多数的条件下，不能忽視成功的少数，而要重視这成功的少数；在成功占多数的条件下，也不能忽視失败的少数，而要重視这失败的少数，采取措施，促使它向成功方面轉化。就全局來說，只有某些局部种得不好，是落后的，但就这些局部來說，却是“全局性”的不好。不消灭这些落后的“小全局”，就不能做到大面积平衡高产。

三

在总结种植紫云英的过程中，我們深刻地理解到人的因素第一、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重大意义。在客观条件許可的范围内，事情办得成功或失败，办得好或坏，完全取决于人的因素，决定于人的主观能动性是否得到了发挥和发挥到什么程度。毛主席說：“指导战争的人們不能超越客观条件許可的限度期求战争的胜利，然而可以而且必須在客观条件的限度之内，能动地爭取战争的胜利。战争指揮員活动的舞台，必須建筑在客观条件的許可之上，然而他們凭借这个舞台，却可以演出很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戏剧来。”我們很多干部正是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导演出很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戏剧来”，使大面积种植紫云英获得成功。也有少数人，虽然有了同样的舞台，却只能导演出无声无色、不威武不雄壮的戏剧

来。这正说明了人的精神世界的差距。我们从“多种不一定失败，少种不一定成功”这一条经验中也领会到这个真理。少种的不一定成功，由于少种，主观上不重视，战略上既不敢藐视，战术上又不重视，结果失败了。多种也不一定失败，由于有革命的闯将精神，发挥了人的主观能动性，结果反而成功了。

我们认识到，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一定首先要解放思想，这就是要大讲唯物辩证法，大破庸人哲学。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就是庸人的哲学。庸人哲学既脱离实际，又片面的、孤立的、静止的看问题，把一切事物都看成绝对的、不变的，不知道事物是在不断发展的，矛盾是可以转化的。他们不知道，多和失败并不是在任何条件下都联系在一起的，少和成功也并不是在任何条件下都联系在一起的。就是只种一亩，如果不重视，不具体研究解决碰到的矛盾问题，也是要失败的。

事物是不断发展的，农业生产是可以

高产更高产的，所以人必须不断突破自己的局限性，不断探索农业高产的新的道路和方法，种植紫云英，是我们在这方面迈开的一步。虽然取得了成功，但却未把有关紫云英的生长规律完全认识清楚。至于施用紫云英作基肥后，稻谷耕作技术应有那些变化，我们也还未摸清楚。对待紫云英，和对待任何事物一样，也应该一分为二。看到它的好处，也要看到带来的新问题，如由于多种紫云英，稻田不能提早浸春，三化螟自然死亡率较低，加上紫云英本身的虫害，水稻会遭到较多的虫害的袭击。同时紫云英分解较慢，分解时土壤发热，不利于适时早插。如何解决这些问题，还需要我们不断实践不断总结。总之，在我们面前，还有许多必然王国没有攻克，我们一定不能有悲观的论点、停止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而要力求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不断变必然王国为自由王国。

一九六五年五月二十七日

学习《矛盾论》，改造落后队

潮安县沙溪公社沙二大队生产队队长 陈俊林

一九六〇年，我到县委党校学习了七天，开始读了《矛盾论》。当时，书中的一些名词，什么“矛盾”、“宇宙观”、“形而上学”等等，我都看不懂，书中的许多意思也不能理解。在党校同志的辅导下，粗粗浅浅地懂了一点。回去之后，我就买了一本《矛盾论》，一有空就翻开来学，开会也常

常带着它，碰到问题就翻《矛盾论》找答案，遇到不懂的就请教小学的校长，就这样慢慢学起来了，也试着用起来了。我们队原是一个落后队，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在社员共同努力下，已上升到先进队的行列。我自己在改造落后队的过程中，由于活学活用《矛盾论》，也做了一些工作，

取得了一定的成績。

一九六二年底，党支部为了加强对落后队的领导，派我到第二十七生产队去当队长。这个队有二十六户，九十五人，主要劳力只有二十人，真正懂得种田的只有三人，半懂不懂的七人，其余十人是非农民出身的，生产知识和技术都差。而且，耕地又少，只有七十七亩六分地，每人平均只有七分地。人多地少，劳动力弱，生产落后，又没有家当。当时全队只有一头不能劳役的小牛，一部破水车，小农具大部缺乏，还欠了国家贷款九百多元，是全县大队中比较落后的生产队。

落后的面貌能不能改变、如何改变呢？我带着这个问题去学习《矛盾论》，读了“两种宇宙观”和“矛盾的普遍性”两节，我反复学习，受到了很大的启发，认识到宇宙观有两种：一种是形而上学的，一种是辩证法的。懂得了毛主席说的：“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两军相争，一胜一败，所以胜败，皆决于内因。”我想，按照辩证法的观点，要改变落后面貌，就要找出我们队内的积极因素。我经常听到社员这样说：“干都愿干，但干了，生活还是不好”。社员说“干都愿干”，这就表明了人们是不甘于落后的，只要把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就一定能够改变落后面貌。

一九六三年早造的时候，水稻生长严重缺肥，队里又没有资金，社员们都很焦急。这一造的生产如果搞不好，落后面貌就不可能有所改变。资金要靠谁来解决呢？我是经过一场思想斗争的。社员有困难，集体有困难，国家也有困难。我们有困难，别人也有困难。是向国家伸手呢，

还是自己想办法解决？根据《矛盾论》中关于内因、外因的论述，我想，主要应该靠自力更生来解决资金上的困难。认识解决了，就通过政治思想教育，串连发动社员投资。我向社员说：“大家是吃点苦、忍受点暂时困难好？还是让困难长期拖下去？”大家都说：“要困难一时，不要困难长期。”这一来，投资就顺利发动起来了，不仅投资了三百多元，而且，社员在口粮水平较低的情况下，还节约投资稻谷五百二十六斤。这样，加上了国家和各部门的支持，就解决了早造的肥料问题，余下来的钱还买了一头耕牛，添购了一些农具。这一年早造，在大旱情况下获得了丰收，亩产比一九六二年同期增产八十斤，社员们都很高兴。

群众情绪调动起来之后，对集体生产也比较关心了。一九六三年秋季，大家发现我们队的人多地少的矛盾更加突出了。一九六三年秋季比一九六二年底，全队增加了八口人，土地非但没有增多，相反，大队建雨亭、修水利还占用了一些土地。人口增加，土地减少，怎么办呢？我再学习《矛盾论》，学习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受到很大的启发，认识到一切事物都包含着矛盾，矛盾一停止，生命也就停止；认识到矛盾不断出现，必须不断解决。对于人多地少这个矛盾，要正视它，解决它，才能不断增加生产，改善社员生活。如何解决呢？必须一手抓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一手抓开荒扩种。当时，我看到坑仔底一片沙滩地，可以开荒扩种，就在社员会上提出来了。可是，有的社员说：“如果是好地，轮不到我们去开，早就给别人种了。”有的说：“人家

已种过了，作物长不起。”是不是不能种呢？我也拿不定主意。我想到毛主席說的一段話：“研究問題，忌帶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就翻开《矛盾論》把书中所引的“三打祝家庄”的故事讲給社員听，說明看問題不能片面，要調查研究。我們就到現場进行勘査，了解到坑仔底沙灘地作物长不好的原因是缺乏泥土，只要把附近的一段旧堤和一个坟壙的泥土搬过去，是可以种起作物来的。当时，既要参加修水庫，又要开荒扩种，社員出現怕苦怕累的思想。我就組織社員学习《愚公移山》，鼓起了大家的革命干劲，把一段旧土堤和一个坟壙移平，挑了一万多担土到沙灘上去，共扩大了耕地面积五亩三分地，种下了甘蔗、花生和水稻。一九六四年，收了紅糖一千二百斤，稻谷四百六十斤，花生脯一百五十斤，社員都很滿意。

一九六四年夏收后，公社党委号召大力发展集体养猪事业。开始，我怕“亏本”，会影响生产資金，认为人要吃田，猪也要吃田，飼料难解决，会增加負担，便借群众不同意的名义，不积极行动。后来，上面抓得緊了，感到不搞不行，但自己思想还鬧不通。我帶着这个問題学习《矛盾論》中“矛盾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一节。毛主席談到矛盾着的各方面，不能孤立地存在。沒有死，就沒有生，沒有生，就沒有死；沒有禍，无所謂福，沒有福，无所謂禍；沒有順利，无所謂困难，沒有困难，无所謂順利；等等。用这个哲学道理，我联系到养猪問題，进行分析。猪与田也是互相联结的，猪多肥就多，肥多了生产就搞得好的，生产好就有更多飼料养猪，真是有对立，又有統一。自己的思想問題解决

了，劲头也鼓起来了，就組織队委和社員学习《紀念白求恩》，使队委和社員树立革命的理想。同时，召开了貧下中农座談会，摆出了前段公有私养存在的矛盾。通过壮大集体經濟和算得失賬的教育，絕大多數貧下中农都贊同大力发展集体养猪，并把公有私养作为照顾困难戶的办法。社員思想弄通了，集体养猪就发展起来了，去年养了二十三头，今春增至四十一头。

今年春，党委提出了实现增产增收的战斗号召。要实现党委提出的計划要求，存在不少矛盾，不少社員感到地少人多的平原地区沒有出路，化肥又少，春耕生产迫近，工作很多，怎样去开展增产增收运动呢？毛主席的著作又給我指出了道路，在“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一节中指出：“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話，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則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因此，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話，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問題就迎刃而解了。”讀了之后，我反复这样想，要实现增产增收計划有些什么矛盾，那个是主要的；找来找去，认为問題在于“勤”和“俭”两个字。如何实现“勤俭”呢？从当时春耕生产來說，主要矛盾在于“肥”字。回想前几年的情况，自积肥少，依賴化肥，产量虽高了一点，但成本高。明确了主攻方向之后，我們就死抓两条：一是大力发展养猪，圍猪积肥。猪的飼养量增加了，公养猪由原来二十八头发展到四十一头，加上公有私养和社員私养猪，共有九十一头，平均每戶三头半，每亩水田平均有一头六。每月收入猪

粪四千多斤，猪尿一百多担。一是抓积制土杂肥。大力发动社员积肥，全队积制了一千一百多担土杂肥，实现水稻百分之百包秧头肥。大抓积肥的结果，使早造的生产成本大大降低。去年早造，购买化肥及粪肥四百五十四元，今年早造，只购买了一百六十九元，减少了二百八十五元，降

低了百分之六十。而水稻生长却由于包秧头肥，生势很好，初步估产，亩产比去年同期增加六七十斤，是没有问题的。

我学习《矛盾论》，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这不过是开始。我一定要继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和工作水平。

运用辩证法，消灭三类禾

新 农

新会县今年早造稻谷种植面积为六十四万亩，在中耕期间，我们对禾苗进行了一次排队，发现三类禾苗达二十万亩。这个数字是相当大的。如果不迅速采取措施消灭三类禾苗，势必影响早造产量。为此，我们运用唯物辩证法，开展了一个以消灭三类禾为中心的超产运动，结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要攻落后禾，要先攻落后思想。在开展消灭三类禾运动的初期，在干部和社员中，存在着不少思想问题。一些禾苗生长较好的地区，普遍存有自满情绪，没有用一分为二的辩证法来看问题。只看到多数禾苗生长较好的一面，看不到少数禾苗生长不好这一面。如有一个大队的干部认为本队已大搞“三田”（种子田、试验田、丰产田），禾苗生势不错，就说：“今年这碗饭够满了。”而看不到还有四十亩田缺水缺肥，有的围田没有开排灌渠，变成“盲眼围”。如果不克服这种形而上学的“一点

论”，那末，人们就不能有所前进。一些禾苗生长不好、落后禾较多的地区，则存在悲观失望的思想，对抢救三类禾失去信心。这也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思想，它孤立地、僵死地来看待三类禾。还有一些干部则认为，今年阴雨多，“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时不就，消灭三类禾是没有办法的。这是一种无所作为的观点。有些干部还强调肥料都已用光了，没有肥料不能消灭三类禾。这是一种“唯条件论”，看不到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作用。我们认为，要攻落后禾，首先要攻落后思想。而其关键则是要用毛主席的一分为二的辩证法思想来把干部武装起来。于是，我们开展了一次大检查、大评比，鲜明地揭露了先进和落后的矛盾，使先进地区，看到好中有坏，还存在不少落后禾的事实，使他们再干一场，更上一层楼；同时也使落后地区，既看到三类禾多将影响产量，又认识到，三类禾经过人的主观努力，是可以消

灭的，经过斗争，矛盾是可以转化的，三类禾不是永远都是三类禾。事物是不断运动、发展的，只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三类禾是可以变为二类禾或一类禾的。我们特别强调增产在人不在天的思想，天气条件不好，是坏事，但是，不好的天气，促使人们加倍努力，针锋相对地和它作斗争，坏事也就可以转化为好事。没有肥料，可以积肥、制肥。这样，干部的思想认识就提高了。干部的思想认识提高后，各公社先后以大队或生产队为单位，召开党团员会议、贫下中农会议、社员大会，大力进行思想发动，还充分运用黑板报、广播等各种宣传工具宣传消灭三类禾的重要性和有关的技术措施，使运动真正成为群众的自觉行动。

在没有定局的时候，我们反对“定局论”。而反对“定局论”，是为了在更高的水平上“定局”。由于农业生产的特点，消灭三类禾，必须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内进行。这样才有可能把在更高的水平上“定局”变成现实。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这就需要集中力量打歼灭战，解决当前农业生产的主要矛盾。只有这样，才能做到：“一能全歼，二能速决”，争取不违农时地解决落后禾问题。我们在思想发动的基础上，实行人力物力“五集中”。这就是领导力量集中，劳动力集中，技术力量集中，肥料集中，农药集中。领导力量集中起来，用到刀刃上去，这就是要到落后队、落后组、落后田去，发动群众解决问

题。为了把肥料集中起来，我们实行肥料“四级清仓”，这就是公社、大队、生产队、社员肥料清仓，清理肥仓、肥厂存肥，清理厕所、猪舍、牛栏肥，清理社员土杂肥，清理垃圾肥。有一个公社实行肥料“四级清仓”后，仅两天时间，就清理出一百八十多万斤肥料，加上县分配的肥料，合计有化肥四万五千斤，猪屎灰和家肥一百六十多万斤，氨水三万八千五百多斤，磷肥十三万斤，平均每亩落后田有化肥八斤半、猪屎灰和家肥三百零四斤、氨水五斤半、磷肥二十斤。在这一段期间，不少公社动员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劳动力，投入消灭三类禾运动。

改造三类禾，还必须进行具体分析，用不同方法，解决不同矛盾。造成三类禾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如果不分别对待，采取不同的措施，因地制宜，还是不能达到消灭三类禾的目的。所以，必须具体分析具体矛盾，分别对待。这就是说，一方面要看到三类禾的共性，另一方面，又要看到不同的三类禾的特殊性。因此，各地在进行临田检查时，就逐块细致地分析产生三类禾的原因，对症下药。由于我们集中优势力量，又采用机动灵活的战术，用一把锁匙开一把锁，所以我们就能又快又好地消灭三类禾苗，现在，三类禾苗所占的比重，是大大下降了。这是一个胜利。这是唯物辩证法对形而上学斗争的胜利。

一九六五年五月十五日

新会劳动大学情况調查

林 紹 祥

新会劳动大学，位于新会县城北郊，在海拔四百八十米的圭峰山下。它是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形势下创办的一所半农半讀的新型的革命的学校。

圭峰山的面积約有五万亩。在历史上，它原是新会的名胜区，后来在日寇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摧残下，变成了一个山头光秃、水土流失、人迹罕至、滿目荒凉的地方。还在一九五三年，中共新会县委就考虑到全县还有九十万亩荒山未开发，开始重視开发荒山的工作，决定首先改变圭峰山的面貌作为示范，便在圭峰山建立了一个小型的农场，发动机关干部利用假日上山开垦，种下一些短期經濟作物和造林种苗。一九五五年又开始修筑一个山塘。一九五八年，中共新会县委为了加速开发全县荒山，提出了“把荒山变为花果山”的豪迈口号，进一步抓紧了对圭峰山的开发。結合当时机关干部下放劳动，县委决定，在圭峰山创办劳动大学，把农场併入劳动大学，实行场校合一，使圭峰山成为既是全县开发荒山的榜样，又是鍛炼培养干部的基地。新会劳动大学创办后，由县委第一书记兼任校长，还派出一个县委常委担任专职的副校长、党委书记。

开发圭峰山，改造自然的号召，动员了县級机关、企业的干部，掀起了上山参加生产劳动的热潮。到一九六〇年，先后就有三期共五百七十多名下放干部进了劳动大学。他們經過一、二年的劳动鍛炼和学习，已先后陸續回到原工作单位。为了适应建設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需要，圭峰山劳动大学从一九六一年起，逐年招收初中毕业生入学(貧下中农和工人、干部子弟占絕大多数)。第一期招生一百二十四人，学习時間两年，

于一九六三年秋季毕业，大多数分配到財貿部門的基层单位和农(林)场工作。一九六二年以后招收的学生，学习時間定为三年。此外，还举办了一期林业技术进修班八十六人，学习一年，都分配到农、林场工作；一期在职林业技术短期訓練班七十三人，学习時間三个月。现在，全校共有师生职工五百八十多人，其中学生三个班、二百五十多人，干部和教师二十一人。

办校初期，中共新会县委根据本县的实际情况，确定劳动大学的两大任务是：开发圭峰山，鍛炼提高干部。举办劳动大学的目的，是为了改造人，同时也是为了改造自然，在开发荒山的过程中，加强对學員的思想政治教育，并且进行一定的文化技术教育，把改造自然和培养鍛炼革命干部紧密地結合起来。一九六一年以后，开始招收初中毕业程度的学生，实行半农半讀，县委根据党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結合”的方針，规定劳动大学的任务为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培养农村基层工作的革命接班人，并且提出了农村需要什么人就培养什么人的要求。因此，他們在办校过程中，把改造人放在第一位，突出政治，突出劳动，注重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改造人們的思想，提高觉悟，又学到一定的适合本县农村需要的文化技术知識。

突出政治，学习毛主席著作 他們認為，要革大自然的命，先要促使人們思想革命化；要改造荒山，首先得改造人們的思想；才能

最大限度地調動人們的劳动积极性，以更好地去改造荒山。因此，新会劳动大学自始至终把学习毛主席著作当作主要的課程，把教好学好毛主席著作摆在最重要的位置，把毛泽东思想作为指針，貫穿到每一門課程中去。政治課的中心內容，就是教好学好毛主席著作；語文課有一半的課文也是選讀毛主席著作；农林生产技术課按照毛主席的理論联系实际的指示，編排教學內容，进行教学活动，并教育学生掌握农业“八字宪法”的精神实质。为了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学生的头脑，使之成为改造圭峰山和改造人的强大思想武器，新会劳动大学在不同时期，根据不同的对象，安排不同的学习内容，引导学生带着問題認真学习毛主席著作。早在建校初期，針对一些下放干部輕視生产劳动和工农群众的思想，和有些人在面对荒山野岭、石多土薄的情况下有畏难情緒，学校先后組織他們学习了《为人民服务》、《紀念白求恩》、《愚公移山》、《实践論》、《矛盾論》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等文章，使學員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对照进行检查，自觉分析批判各种錯誤思想，逐步抛弃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决心在艰苦的劳动中鍛炼改造自己，进一步树立革命的人生观。一九六一年招收青年学生以后，每期学生一进校門，学校針对他們的思想实际，第一堂課就学习《为人民服务》，以帮助学生端正学习目的，帮助他們懂得什么是革命工作，树立为革命而学习和劳动的思想。以后針对学生各个时期的不同思想，有意識地組織学生学习《反对自由主义》，以改变一些学生自由散漫和紀律松弛的现象，树立革命的学风。随后又学习毛主席的四篇哲学著作，特别是《实践論》中关于什么是知識的論述，克服一部分学生中輕視生产实践和另一部分学生輕視理論知識的片面性，教育学生努力劳动，認真学习，掌握比較完全的知識。同时，以毛泽东思想为綱，在日常的学习、劳动和生活中抓住学生生活的思想，通过带着問題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有計劃地进行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教育、两种人生观的教

育、劳动教育、艰苦奋斗自力更生教育和时事政策教育。通过学习毛主席著作，参加政治运动，参加生产劳动，帮助学生逐步树立阶级观点、劳动观点、革命观点和集体主义观点。

劳动是学校的必修課 新会劳动大学特別注意抓紧生产劳动，強調生产劳动是学校的必修課，是进行教育、教学的一种重要方式，要求通过改造圭峰山的生产劳动，通过劳动教育，帮助学生树立劳动观点，培养劳动人民的感情，培养正确的劳动态度，养成劳动习惯，学到生产劳动的知識和技术，来达到改造人和增长文化技术知識的目的。因此，学校特別注意抓紧学生过好劳动关。学生从入学那一天开始，就要按照半农半讀的要求，从事力所能及的劳动。他們实行劳动建校，生产养校，靠自己的双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沒有房子，就自己烧砖瓦，烧石灰，盖房子。缺乏生产用具，就自己动手制造。沒有肥料，就自己动手烧草皮泥，到新会城收垃圾、屎尿等作肥料。沒有种苗，就自己采种繁殖。他們开垦梯田，造林植树，筑山塘，修水庫，修公路，治山治水，与天奋斗，与地奋斗，做到了治山炼人。他們知識的增长和向劳动化的方向迈进同时进行，使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逐漸結合起来。新会劳动大学的干部和教师，首先带头劳动，为学生作出示范，实行身教与言教相結合，不但“教”好学生，更重要的是“带”好学生，給学生以良好的影响。

二

新会劳动大学在突出政治，突出生产劳动的同时，也注意安排好文化学习，使学生学到一定的文化科学知識。

新会劳动大学的办学人員在实践中体会到，为了完成党交給学校的任务，在教學內容、教學方法、教學組織、教學時間安排等各个方面，不仅要敢于完全打破资产阶级教育的旧框框，而且要敢于革新和創造。他們在办学过程中，逐步形

成一套新的办法。

新会劳动大学的招生，主要是招收初中毕业生和农业中学毕业生，采用由公社保送与学校考试相结合的办法，录取入校学习。学习时间定为三年。学生毕业后分配回原社、队工作，做到“从社队来，到社队去”。

课程設置和教学內容 学校按照培养农村新型劳动者和基层干部的要求，贯彻理論联系实际、学以致用和“少而精”的原则，来設置課程和确定教学內容。学校主要設三門課程：一是政治課，以学习毛主席著作为中心，結合学习党史、社会发展史和辯証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初步知識，同时也配合各个时期的需要，学习党的路綫、方針、政策。二是語文課，注意政治內容，选編范文五十二篇（毛主席著作占二十六篇），着重提高閱讀和写作能力，要求学生能写通知、报告和工作总结。在最后一学期，将語文課的教学時間，安排学习珠算、會計、統計、測量等的农村实用知識，以适应农村工作的需要。三是农、林业生产技术課，实行讲授基础課知識与讲授农林业生产急需的专业課知識相結合，教学內容与生产內容結合，学与用結合。以本县和圭峰山农场生产的作物为重点，圍繞着学校的农事活动来安排，做什么就学什么，缺什么就补什么，什么急用就先学什么。例如，松、竹、葵、杉和荔枝、青梅、龙眼、沙梨，是开发圭峰山和本县需要推广种植的重要生产項目，也是学校的主要生产劳动內容，他們就按照生产季节的要求，有計劃地讲授有关这些作物的育苗、栽培、管理和病虫害防治等的知識。而上述課程的內容，在一定期間內，还根据階級斗争和生产实践的发展的需要，不断加以补充，使課程內容日益丰富和切合实际。如近年来，这里扩大了沙梨的种植面积，新引种了茅竹，便在課程中相应增加了这方面的內容。此外，音乐不占用正課時間，利用业余时间大唱革命歌曲；体育課也結合民兵訓練，着重开展国防体育活动。

教学形式和教学方法 教学形式，主要

是上大課和小组討論，加上生产场地的实习。上課采取“一条龙”的办法，就是半天四个钟头上一課，政治、語文課都是連上两个半天。每上一堂課，都采取集体备课，一人主讲的办法。在教师起主导作用的前提下，一堂課中，既有教师的讲解，又有学生的討論、分析、概括、答問等。教师讲完后，就組織学生进行小组討論，發揮自由思想。最后由教师解答問題。他們特別注意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把上課、討論、自修、看参考书等活动結合起来。学生反映，这样学习既不枯燥乏味，又能当堂消化，学得系統，記得牢固，而且节省师资力量。

在教学方法上，灵活多样，生动活泼。有时先学理論知識再去实践，有时到实验园地或生产现场边讲授边实践，有时先实践回过头来再讲理論。注重課堂教学同现场教学和田間操作相結合。在課室內学到的书本知識，拿到田間、生产场地去实践；通过生产劳动，带着問題去学理論知識。在教学过程中，注意总结本校师生自己的生产实践經驗。学校从外地引种了各种林木、果树，师生們对于每一个品种的种植和管理，都当作是一堂生动的生产技术課。他們在教学和生产劳动过程中，不断实践、研究，逐步总结出一套适合本地情况的栽培管理方法，并且把这些作为活教材。

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也坚持理論联系实际的原则，注重抓活的思想教育。在日常的教学、生产劳动和生活中，针对学生的思想实际，贯彻学用一致的精神，带着問題，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用毛泽东思想来解决学员的思想問題。还常常邀請貧农学生的家长到学校讲家史、村史，請老干部讲革命斗争史，請老工人讲新旧社会的对比，請农场老场員讲场史，同时有計劃地組織学生参观階級教育展览会，到附近农村訪問貧农，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使学生受到活的階級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

考核学生的成績也注重理論与实际相結合，不仅考书本理論知識，而且考劳动态度、实际操

作和运用知識解决实际問題的能力。考試形式靈活多样。比如考政治課，既看學生試卷的問答，又看學生的行動表現。有時出一批題目，由學生選答；有時通過實習進行考試；有時要求學生寫出某一害虫的生活史及撲滅方法；有時提出生產中的問題，讓學生回答。考試時，可以翻閱筆記，可以互相討論，也可以互相評改，最後由教師綜合成正確的答案。

教學方法和考試方法的靈活多样，生動活潑，做到了教學民主，教學相長，發揮了學生對學習的自覺性和主動性，學到真知識，活知識，能夠實際運用，學以致用。

教學時間安排 新會勞動大學堅持實行半農半讀。下放幹部以六成至七成時間參加生產勞動，三成至四成時間參加學習。青年學生基本上做到半天勞動，半天學習，但教學服從生產，農忙少學，農閑多學，晴天少學，雨天多學；根據天氣的變化或農事活動的安排，有全天勞動，也有全天上課，做到靈活安排。每周有三個晚上安排自修，兩個晚上上政治理論或階級教育的大課，一個晚上安排黨、團員的組織生活。學校不放寒暑假。三門主要課程的時間安排比例是“四、三、三”。即四成時間學政治課，三成時間學語文課，三成時間學農、林業生產技術課。

學校的組織管理 為了使教學和生產勞動能夠結合得更好，學校把學習組織與勞動組織統一起來，實行民主管理。每期招收的學生編為一個班，班分隊，隊分組，每組十人至十二人。既是學習組織，又是勞動組織和民兵組織。學習時按班上課，按小組組織討論；生產勞動時，由班提出任務，隊安排，小組執行。把生產場地作為生產實習場所，把組作為學習和生產勞動等的基本單位。勞動採用“四固定”（固定地段、固定任務、固定農具、固定勞力）到班到隊到組的辦法。建立了這樣的責任制，使學生能獨立自主安排農事活動，也可以學會一套生產經營管理的方法。生產任務不分到個人，個人也不按件計工，主要靠提高政治覺悟，以利于培養忘我勞動，不

計報酬的思想。學生勞動是自己管理自己，每天都提前出勤，自覺搞好生產勞動的質量；生活也是自己管理自己，自覺遵守集體紀律。做到了生產民主，生活民主。

新會勞動大學在建校初期，師資很缺乏。這時，學校的領導幹部下班蹲點，親自擔任教學，在實踐中學習。還採取能者為師的辦法，邀請老農、土專家和在場勞動的研究人員擔任教師，講授農、林業生產技術課。現在，新會勞動大學已經有了一支新型的師資隊伍（六個固定教師，其中三個是專職的）。他們實行半農半教，堅持參加體力勞動，有革命干劲，密切聯繫群眾。他們都跟學生實行“四同”，就是與學生同吃、同住、同學習、同勞動，以身教結合言教，辛勤地進行教學工作。他們和學生在生產勞動中和生活中打成一片，教學相長，親密無間，形成了新型的師生關係。

三

勞動大學根據縣委的要求，同時根據圭峰山的土質和氣候條件，採取“以林果為主，農林間種，長短結合，以短養長，多種經營，綜合利用”的生產方針。辦法是全面規劃，因地制宜，逐步建設。遠山、高山種馬尾松為主，松林和雜林混種；低山、近山種竹子、水果，間種雜糧和短期經濟作物；比較平坦的坡地用來育樹苗，種植經濟價值較高的作物。這樣實行長期作物和短期作物間種，互相配合，充分利用山區資源，綜合發展農、林、牧、副、漁，使土地、物資、勞力和時間綜合利用，在較短的時間內得到較大的經濟收益，減少了國家投資，加速林木成長，加速了各項基本建設。

在開發圭峰山的過程中，為了實現生產園林化，學校對於各項生產和建設，都力求既講求实效，又盡量做到布局和諧，整齊美觀，配合得當，利用合理，綠化與美化結合。例如，所有花果樹木，都選用良種，有行列有規則地間種，經

常修剪，使树形美观。山上道路纵横交错，果木种植横直成行。交通大道种植经济价值较高的风景树和绿葵、红花，做到既是交通线，又是生产线和风景线。把荒山变成了美丽的图案。

新会劳动大学领导生产，除了首先注意抓好生产劳动中的思想教育，充分发挥职工和学生的生产主动性和积极性以外，还逐步健全了经营管理制度，做到在生产劳动时人人有事做，事事有人管，自觉地搞好生产，搞好质量，提高技术水平，挖掘生产潜力。学校对于生产的领导，既抓全面，又抓重点，既抓一般，又抓根本。干部做到以身作则，参加生产，领导生产，因而使生产局面十分稳定并且获得不断发展。

四

新会劳动大学办校七年多来，在中共新会县委的直接领导下，经过全校师生职工的积极努力，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绩。开发了圭峰山，创造了大批物质财富，为全县开发荒山作出了示范，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培养了革命人材。这所治山炼人的新型劳动大学，在当地人民生活产生日益深远的影响。

圭峰山的面貌已经根本改观，“荒山变果园”的理想正在实现。现在全校师生职工经营着一万多亩土地，种有用材林、经济林七千多亩，果树一千八百多亩，还种有菠薐、香蕉、水稻、杂粮、蔬菜、经济作物等等。学校引种了国内外的优良品种的林木名果三百多种，进行驯化，象油梨、苹果、鸡蛋果、枣油棕、椰子、猪油果等品种已经在圭峰山“安家”，有些已经开花结果。用竹枝插条育苗，也在该校试验成功。他们发展了养奶牛、蜜蜂、生猪、三鸟（鸡、鹅、鸭）、制茶等副业生产。圭峰山先后修筑了十二个山塘水库，蓄水量达三百多万立方，综合利用来灌溉、养鱼和发电，其中的龙潭水电站，发电量有六百瓩。学校还根据发展生产和建校的需要，兴办了一批农副产品加工、机械修理和造砖等工厂、作坊。

全校人员自己动手修筑了圭峰山的公路八公里和许多大道，建成了教学大楼、课堂、宿舍、食堂、厂房、仓库等共四十一座，面积达一万四千多平方米。现在，圭峰山十多个山头都已绿化成林，山上山下一片葱绿；果树繁茂苍翠，结果累累；道路畅通车马，水库辉映群山；楼房亭阁，绿葵红桃，点缀着湖光山色；锄声歌声书声，在湖面、山谷回荡。过去荒蕪的圭峰山，现在已进入绿化、美化、生产化的境界，成为锻炼培养革命接班人的园地，成为人们参观游览的胜地。

七年多来，新会劳动大学已经创造了大批物质财富。先后供应县内外的果木和树苗约达三百万株，为国家、市场提供了四千多头猪，一百多万斤水果，一万七千多斤三鸟，五万四千多斤鱼，十多万磅鲜奶，四万四千多斤蜂蜜，五千三百多克蜂王浆，六百八十多万斤杂粮，以及其他的一大批林产品、农副产品。县里只在建校初期投资三十五万元，而学校各项生产收入累计共达三百二十万元，从一九六〇年下半年起就达到了经济自给。学生的伙食及杂用费、学习费、医疗费等全部由学校供给，平均每个学生全年由学校供给的上述费用有二百零四元，大大减轻了学生家长的经济负担。近几年来，学校每年的现金收入有四十至五十万元，除了扩大生产，进行一些基本建设以外，还略有盈余。这就为进一步改造圭峰山和办好学校，打下了良好的物质基础。

圭峰山从全面开发荒山方面作出了典型示范，这对新会全县人民特别是山区人民鼓舞教育很大。全县有许多基层干部、农民到圭峰山参观学习后，都增强了绿化造林的信心和决心，调动了他们对开发山区、建设山区的积极性。

新会劳动大学在开发圭峰山的过程中，既改造了自然，又改造了人，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培养了成批的革命人材。进入劳动大学学习的下放干部、青年学生，经过一两年的劳动锻炼和学习，绝大多数人都进一步改造了非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提高了社会主义觉悟，增强了劳动观点，养成了劳动习惯，开始培养起劳动人民的思想感

情，艰苦朴素，以农为乐，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不摆知识分子的架子。不少人原来只能挑四五十斤，经入校劳动锻炼一段时间，就能挑一百斤以上了；原来怕劳动，挑轻活做的，也变为热爱劳动，专挑重拣难的工去做了。许多人的身体也健康得多了，比较明显的是原来患有神经衰弱、胃病等慢性病的干部，症状都有了很大的好转或消失，成了身心健康的干部。通过学习和生产劳动的实践，都学会了一套农林生产技术。特别是学习了毛主席著作，提高了思想觉悟，培养了优良的思想品质，逐步成长为既能体力劳动又有文化技术的新人。已分配到工作岗位的毕业生，大部分表现很好，群众称赞他们是：“听党的话，热爱劳动，联系群众，能文能武的好干部。”他们工作不怕苦，不怕累，不怕脏，不讲价钱，勇挑重

担，以艰苦为荣，乐于助人。因而普遍受到工作单位和广大群众的欢迎和赞扬。据统计，在劳动大学劳动锻炼的下放干部，回到工作岗位以后，有百分之四十的人先后被评为“五好干部”，还有一百七十多人被提拔为基层单位的领导干部。第一期青干班和林业班二百一十个毕业生，在工作岗位上表现优秀的有六十二人，占百分之二十九点五；表现良好的有八十八人，占百分之四十二；表现一般的四十八人，占百分之二十三；表现较差的十二人，占百分之五点五。学生还未毕业，不少单位就向学校“定货”要人了。

几年来，新会劳动大学从实践中摸索出了一套适合他们的情况和特点的办学经验和发展生产经验，现在，他们还在作进一步的总结，努力把这个新型的革命化的学校办好。

老瓦匠的一家

——建筑工人吳心家史

欧海 郑广南 黄汉綱 郑成軒

苦 难 的 童 年

吳心是广东恩平县君堂水源坑村人。他家从高祖父起，就是上无片瓦，下无寸土，靠租种地主的田过活，祖孙几代都是給地主做牛做馬。

吳心十岁那年，一家人的生活越来越苦，簡直无法挨下去，高利貸越借越多，借一籬谷，到下造收割时就得还三籬。本生利，利变本，越滚越大。它好比口渴吃盐，越吃越渴。父亲吳福长只好叫吳心去給地主放牛。

吳心給地主放牛，說是一年有一百五十斤谷的工資，但这些工資必須先用来偿付吳福长欠債的利息。地主还給吳心定下了四条放牛的規矩，那就是：牛吃不饱要扣工資，牛瘦了要扣工資，牛生病要扣工資，牛当年沒有生下牛仔也要扣工資。吳心在地主这样的苛刻条件下，过了三年的牛馬不如的生活。

吳心放牛第一年的大年三十傍晚，地主一家人早在吃着团年飯了，但吳心还餓着肚子在山上放牛，并冻得发抖，四肢麻木。吳心在地主家里，从来沒有吃过一餐飽飯，沒有尝过一次肉味。过年了，总該可以吃一頓飽飯、尝到一点肉味吧？当吳心拖着疲倦的身体，带着这点希望把牛赶回来的时候，誰知脚尚未跨入門檻，地主便怒冲冲地揮棍劈头乱打，并且破口臭罵說：“不喂飽牛就回来！哼！穷鬼只配喝西北风过年，不許来我家聞年飯香味。”說罢，把吳心一推，砰一声把門关上。吳心含着眼泪跑回自己的家里，倒在母亲的怀里哭訴着地主的狠毒心肠。

低得可怜的一年一百五十斤谷的工錢，扣来扣去，到年終一算，剩下不了几粒，特别是地主对吳心的凌辱和虐待，更刺痛了做父母的心。父亲不忍自己的儿子再这样受折磨下去了，便在吳心十三岁那年，托人把他送到恩平县塘庫的建筑商吳源处当学徒。当建筑学徒，名为跟师学艺，实际上是給資本家当临时杂工，既无固定師傅传授技艺，全凭自己眼快心灵地“偷师”，又沒有固定的营造厂可以工作。营造厂的資本家有工作时叫你干，沒工作时叫你滚。吳心从給建筑商吳源当学徒开始，在几年內給十个以上的营造厂和包工头当过学徒，打过杂工。

吳心当建筑学徒时，一天連两餐飯都吃不饱，但干的却是担砖、搓灰、煮飯等成年人所担任的重活。白天累得精疲力尽，晚上还要替老板洗衣服、倒尿壺。名义上是学徒，实际上白天是杂工，晚上是老板的奴仆。吳心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到月底老板高

兴时给他一元几角，算是“打赏”，不喜欢时就一分钱不给。至于挨打受骂，更是“家常便饭”了。这样的学徒生活又整整地挨了三年多。

这时候，吴心已经十六岁了，他就是这样从一个火坑跳进另一个火坑，在地主、资本家的折磨下度过了自己苦难的童年。

三十年的血泪

吴心好容易挨出了师，但又找不到一份固定的泥水工做。只好在恩平、开平城镇一带找包工头雇用，或者找些零碎活干。正当他四处奔跑寻找工作的时候，忽然家里飞来一场横祸。

吴心的父亲因为长年劳累和贫穷的生活拖垮了身体，患了严重的关节炎病。穷人那里有钱请医生，吴心的姊姊吴韵到处给父亲找些生草药。有一次，她在君堂墟碰上了一个绰号郑屠户的地主。这只衣冠禽兽竟在光天化日之下动手调戏她，遭到了吴韵的痛斥。郑屠户达不到卑鄙的目的，怀恨在心，便暗地里买通恩平县第四区公所的伪区长，硬说吴心的父亲吴福长犯有谋财害命的大罪，不问情由，严刑逼供。吴福长被打得死去活来，奄奄一息。那时，吴心正奔波于台山、开平两县各城镇寻找工作，闻讯即赶回家里。旧社会是“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没有钱，是放不出人来的。吴心到处奔走求救，东筹西借，足足花了白银一百元才把父亲赎出来。吴福长由于伤势太重，又无钱调理，熬不多久，终于不治身亡。

吴福长含冤死后，十七岁的吴心担起了家庭生活重担。随后，他自己又成了家，有了儿女，生活的担子越压越重，不得不被迫远离家乡，跑去香港另谋生路。可是，香港这个有钱人的天堂，穷人家的地狱的鬼地方，那有穷人立足之地！吴心到香港后，流浪街头，晚上在街头巷尾找个地方睡觉也不是易事，必须小心翼翼地提防当地警察的干涉和“扫荡”；每天大清早便跑到维多利亚广场，挤进候工人群，等候包工头雇用。可是寺少僧众，轮到被雇的机会极少，即使万幸被雇用了，任你磨破手掌，累弯脊骨，一天最多才赚得两三元港币，顾得吃就顾不了穿，根本没有法子寄钱回来赡养妻儿。

资本家一味只顾剥削，不管工人死活，每天工作时间长达十多小时，工地全无安全设备，建筑工人在极端简陋的棚架上施工，工伤事故经常发生。那个工人因工受伤，包工头便把那个工人开除，工人工伤毙命的拖去一埋便了事。香港的高楼大厦是用无数的建筑工人的血泪建成的！一九四〇年，吴心在香港一个建筑工地工作，因棚架不牢固被摔下来，腰部受了重伤，包工头瞪一下眼，把手一挥，不准他再来工作。吴心要求清发他做了十多天工作的工资，也遭到无理的拒绝，喝了一声“滚开”，便扬长而去。工人兄弟是心连心的，大家看到包工头横蛮无理，愤愤不平，不少人准备帮助吴心向包工头算账，有的拿出钱来为吴心治伤。吴心在工人兄弟的帮助下，才没有变成残废。

生活在旧社会的穷人，象漂在苦难的长河中过日子，没有尽头。一九四一年底，日寇攻占了香港，成千上万的同胞四处逃亡，吴心从香港九龙沿途步行讨饭回乡。回到了

故乡，在那兵荒馬乱的年月，农村残破彫敝，一年只能找到几天建筑、泥水业的活干，干一天工作的工資不够买一斤米，怎能維持家里六、七口人的生活呢？吳心不得不另找工作門路：农忙时給地主、富农打短工，沒有短工做便到石灰窑做采挖石灰石、烧石灰等工作。那里的工作条件极端恶劣，資本家連手套、布鞋等最起码的劳动防护工具都不发給工人，无论是三伏大暑或是数九大寒，都迫着工人赤着手掌，光着脚板干活。天热时在灰窑做工就如置身火炉，难受极了；天冷时則遭受另一种痛苦：工人因胼手胝足地劳动，冻裂了手掌、脚板，石灰粉渗入裂口，侵蚀肌肉，痛苦难耐。灰窑的工人这样受苦受难地工作，一天的工資仅能买几两米。吳心的妻子也是一把劳动好手，下地上山，样样能干，可是夫妇两人終年劳苦，在地主、資本家的压榨下，全家还是过着飢餓的日子。

穷人的苦訴不完，人祸之外还有天灾。“拐腿牛怕滑，穷人家怕灾。”一九四三年大旱，官僚、地主和資本家都在利用这个机会大肆屯积居奇，粮价直綫上升，吃一頓飯工夫米价就連漲几次。吳心的妻子每天帶着孩子上山采竹米，挖酸味草、崩大碗、黄狗头等野菜来充飢。野菜和草根吃多了，人就头晕、眼花、肚痛，病也就越来越多。由于挖野菜、草根的人多，慢慢連野菜和草根也吃不上了。年老的母亲被活活餓死，看看孩子也都活不成了。吳心夫妇两人只好把心一橫，忍痛把两个女儿卖給別人当婢女。大女儿雁秋卖給恩平县城的資本家吳卓升，二女儿雁嫻卖給恩平县大江乡的地主岑参。每个女儿只卖得六斤米。这名为卖女，实則是資本家、地主在搶人。雁秋姊妹俩知道她們要卖出去，双双倒在母亲的怀里哭哭啼啼地說：“媽媽，不要卖掉我們，儿宁愿討飯过活也不离开你呀！”母亲的心象刀割一样，泪珠簌簌地落在雁秋姊妹俩的面頰上，好久好久找不出安慰自己的女儿的話来。两个女儿卖掉了，但一家五口人的生活还是过不下去，在絕望中，第二年，又把第二、第三两个儿子——钟伟和林伟卖給恩平县平江乡的华侨家属当养子。

吳心卖掉四个孩子，仅剩下大儿子常伟在身边，还是免不了經常挨餓。为了減輕家中負担，避免拖累双亲，常伟含着泪向父亲出主意說：“爸爸！这样的日子挨不下去了，不如把我送进孤儿院吧！”吳心知道国民党政府所办的孤儿院是一个阴森森的魔窟，把孩子送到那里去，不是餓死、病死，便是被卖掉，逃不了厄运。一九四三年，恩平县的孤儿院（救济院）就曾經公开贩卖过孤儿。再說，吳心五个孩子已經卖掉四个，身边仅剩下这一点亲骨肉，怎么也舍不得让他离开，便安慰他說：“好孩子，我們就算餓死也死在一块罢！不要再瞎想了。”一九四五年，常伟十三岁，被迫再蹈祖父和父亲童年的老路——給地主放牛。常伟除了替地主放牛外，还經常被地主驅迫到田里干重活。

至于雁秋姊妹俩更是历尽了辛酸苦痛的折磨。雁秋被資本家吳卓升买回家后，給改了一个表示她是資本家的生財工具的名字——“財来”。这个資本家是开粉面食品店的，雁秋就被当作牲畜一样役使，整天无休止地磨米、制粉，但吃的却限定一天两餐，一餐三两米。后来吳卓升改行經營屯积居奇的生意，将粉面食品店招頂，雁秋也被当作貨物一样，一起轉頂給另一个資本家馮国祥。直到解放后才获得自由，过着新的生活。

卖给地主岑参作婢女的雁嫫的遭遇最惨。她被地主买回家后，改名旺来。雁嫫日間被赶到田间去无休止地劳动；吃饭时要站在一旁伺候地主的一家人；晚上还要给地主婆松骨、打扇、搔痒，一不如意，这个地主婆就一鞭打过来。这个地主家的少爷、小姐有什么不快意的地方也总是拿雁嫫来出气，要人伺候的时候就喊一声“老举渣”，（注）雁嫫就必须赶紧跑到跟前，去迟一步便是打骂交加，备受折磨。有一次，雁嫫打破一只碗，岑参发狠把她绑吊起来，地主与地主婆轮流毒打，被打得体无完肤，皮肉破裂，血流不止。

雁嫫在地主家里折磨了好几年，到一九四九年二月，实在无法再忍受下去，就跑回恩平县君堂福源坑村家中。雁嫫跑回家后，地主岑参贿赂国民党政府的恩平警察所，他带着警察到吴心的家里要人。

地主岑参要把雁嫫强拉回去的企图没有成功，又转而勒索钱财，要雁嫫的母亲郑锦棠“赔偿”雁嫫的“身价银”和几年的所谓“生活费”共四百元（银元票）。雁嫫给地主当了五年多的牛马，到头来反要向地主赔偿四百元的“损失”，这真是欺人太甚！她母亲便与他说理：“雁嫫的卖身钱不过是六斤粗米，她给你家做牛做马地当了五年多婢女，要算账倒是应该由你赔偿雁嫫的损失。”但是，在旧社会里，官靠财主，财主仗官势，穷人那有说理的地方。最后还是到处张罗，前后借了二百多元的高利贷，来“偿还”雁嫫的“赎身”费。

旧的閻王债还未清，又加上了一笔这样大的新閻王债，日子怎样活下去呢？吴心和他的妻子惶惶不可终日，他们这个家已经陷入了走投无路的绝境。

正当吴心一家人活不下去的时候，广东解放了。解放了的家乡吸引住吴心，于是他在一九五〇年离开香港，回到广州，参加了新中国建筑工人的行列。现在是广州建筑第五公司的七级瓦工。不久，离散的骨肉又获得了团圆。一九五三年，两个儿子重新回到自己亲生父母身边，进入小学读书，随后又进中学学习。第二个儿子吴钟伟读完师范学校后担任教育工作，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三个儿子吴林伟读完中学后进工厂当学徒，后来被提拔为干部，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被迫卖掉的大女儿雁秋，解放后也查清了下落，现在两个女儿都是恩平县的人民公社社员，生活过得很好。最小的女儿吴年秋，现在在广雅中学读书。吴心的老伴郑锦棠虽然年纪老，还是积极地参加建设新村家属委员会的工作。一九五四年，吴心本人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从一九五五年起，多次被评为先进生产者，成为一个出色的建筑工人。这就是这个在旧社会活不下去的一家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种变化是从那里来的呢？吴心同志说得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这个家；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这老头一家的幸福。我这个活了六十个年头的老头，只有在新社会里才真正尝到了幸福的滋味。但是，幸福是来之不易的，绝不能好了疮疤忘了痛。忘记了过去，就等于忘本。想起了过去，就会更加激发起我们无限热爱党和毛主席，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今天，努力建设更美好的明天。”

注：“老举渣”是恩平解放前剥削阶级压迫劳动妇女的恶话。

資產階級罪惡的有力見證

——絲織女工梁鳳生活史

佛山公記隆絲織廠工會委員會

廣州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所經濟史組

梁鳳是佛山公記隆絲織廠的女工，今年四十六歲，共產黨員，她在舊社會生活了三十年。她解放前的悲慘經歷，就是一頁勞動人民被欺凌被剝削的歷史，是資產階級的罪惡的有力見證。

舊社會吞噬了梁鳳的一家

梁鳳是從小就在苦水里泡大的。

梁鳳的家在廣東順德縣坪舖。一家五口人，上無片瓦，下無片地，住的一間房子也是租別人的。她的父母都是農村里的雇工，白天出去給富農打短工，晚上，父親便給商人做“木盆”（農村嫁女用的妝奩）。做短工在農忙時還好些，平常日子只是做做停停，就是活兒多的時候，她父母兩人一天掙來的工錢也維持不了一家人的生活。到了農閑，有些天撈不到活干，家里就無米下鍋。因此，這個五口人的家就經常在飢餓的熬煎中過日子。

當梁鳳還是一個六、七歲的小姑娘的時候，就已經比較懂事了。她看到父母這樣勤勞，這樣辛苦，常常空着肚子出去打工，她肚子餓極了，也不吵着要飯吃，不去傷父母的心，乖乖地在家里帶好弟妹，只盼望母親能早點回來做點什麼吃的。

她父母兩雙手怎么勤勞，連吃的也有一餐沒一餐，那里還顧得上安插穿的、蓋的。夏天還好過，家里有兩床爛席、爛帳，還能應付。冬天一來，可就無法打發日子了，呼呼的北風使他們凍得坐不得，睡不能。晚上，五個人擠在一張床上，蓋着一條被子，常常半夜三更就給凍醒。

這樣的日子熬得够苦的了！不料“屋漏又遭連夜雨”。就在梁鳳八歲那年，父親因為勞累過度，得了一場大病無錢醫治，不久就丟下了她們母女四人死去了。

梁鳳的父親一死，母親就更挑不起全家人的生活重擔，家里常常兩日不見炊煙。加上為了埋葬父親，借了人家一筆錢，連飯都沒得吃，那里還能還債呢！在這樣窘迫的情況下，母親只好硬着心腸把自己兩個親生女兒賣掉。梁鳳四歲的妹妹被賣到鸞洲，梁鳳那時八歲了，賣給沙灣一個資本家的老婆做“落家妹”。

不久，梁鳳的母親又餓病而死，剩下一個孤苦零仃的弟弟。這個弟弟後來迫于生活

又去当了“猪仔兵”，一去永无消息。梁凤小时候的这个家，就这样被万恶的旧社会吞噬了！而梁凤也就从这个苦难的家走向了更悲惨的生活历程。

名义上是家庭，实际上是牢狱

一九三八年，梁凤十八岁。这年二月间，她被嫁给沙湾一个开机房的资本家陈寿山做小老婆。这个家伙已经五十多岁，女儿比梁凤还要大。他娶梁凤打的是这样的“算盘”：一来娶个年青的女人，希望为他生育一个男孩子，二来可以增加一个不用付工资的女工。

梁凤的丈夫一向以阴险狠毒闻名。他早在顺德一间缫丝厂当工头的时候，工人就恨透了他。以后，他自己开起机房来，买了九台手摇丝织机，雇佣了九个工人。梁凤一跨进这个名义上是家庭，实际上是牢狱的“家”里，马上担负起了一家的杂务：挑水、煮饭、洗衣、扫地、倒痰盂……。此外，还要做车丝开纬等下栏工作。她被迫起早摸黑地干活，白天劳动一整天，晚上还要做到深夜十一、二点钟。

梁凤在这个“家”里除了是生产工人外，还是一家人，包括她的丈夫、大婆和大婆的两个女儿的婢女。大婆是家里的主妇，也是一个非常刻薄的老板娘，她患着严重的肺病，硬说自己病情日益严重，是因为丈夫娶了梁凤这个“败家婆”的缘故。因此，总是百般虐待她。本来，梁凤一天做到晚，已经累得要命，但是，大婆还常常要她在深夜爬起来服侍，一会儿说是要喝茶，一会儿又说肚子饿了要吃东西。把煮好的东西端到大婆跟前，不是说咸了，就是说淡了，总是诸多刁难。大婆两个女儿见着梁凤也当面辱骂她是“衰家婆”。在她嫁过来还不到三个月的时候，有一次，大婆的两个女儿，在陈寿山面前挑拨，反说她不肯服侍她母亲。陈寿山听了，不问青红皂白，拿起藤条狠命地抽打梁凤，打得她青一块，紫一块，满身创伤。这时，梁凤实在再也忍不下去了，便收拾了两件衣服逃回了娘家。可是，她万没有料想到她早已没有娘家了。

自己的娘家破人亡，那个活地狱似的“夫家”，梁凤又再不愿意回去，到那里去安身呢？她只得暂时在伯父家里住下来。这以后，她就天天在外面打短工，维持自己的生活。直到大婆病死了，陈寿山才派人把她接了回去。

梁凤回到“夫家”，虽然再没有大婆的虐待和折磨，但她仍然是家里的杂工和开纬工，根本就不是这个“家”的主妇。陈寿山连买米买菜的钱也不交给她。梁凤除了要做家庭杂工外，每天在机房做打纬工作也不下十小时。一个机房老板要雇请这样一个打纬工人至少每年也得付出一百多元大洋的工资，但梁凤却连一个铜板的另用钱也得不到。更毒辣的是不给梁凤半点人身自由。她的养母近在咫尺，就是不准她来往。梁凤的姨母来探亲，陈寿山不仅不认亲戚，竟还拍起桌子来赶她的姨母！这简直是婢仆不如了。在这样的“家”里，梁凤真是度日如年！

一九三九年九月顺德沦陷了。日本强盗到处杀人放火，奸淫掳掠。迫得老百姓死的死，逃的逃，到处是一片凄凉的景象。陈寿山的机房，也在这时停业了。不久，陈寿山

就和“大天二”合股开賭摊。一边开摊一边烂賭，不到三年，先后把織机、家俬、房屋都賭光卖光，于一九四四年七月最后一病死了。

陈寿山死时，梁凤身边还有个一岁多的女孩。在那兵荒馬乱，百业肖条的日子里，孤儿寡妇怎样生活下去呢？为了生活，梁凤只好在每天出去打工的时候，用一条布带把孩子縛在家門口，免得她到处乱爬出危险。但是，梁凤一天挣来的錢买不到二、三两米，有时找不到活做，就連一粒米也賺不到，只好采野菜、野草、木瓜心来充飢，最后只得在路上拾大蕉皮、死老鼠来吃了……。

这样的非人生活很快就把这个岁多的孩子折磨得皮包骨了，特别使梁凤痛心的是，每当她做工回来的时候，总是看到孩子的手上、脸上到处是屎，并且把自己屙出来沒有消化的木瓜心，又抓起来重新塞进嘴里去吃。

乡下再也熬不下去了，她不得不背着孩子到佛山寻工做，可是挨过一家絲厂又一家絲厂，問过一个老板又一个老板，都說不雇用有孩子的女工。在絕望中，梁凤只好回到沙滘。这时，連孩子也养不了，只得把她丢掉。就这样，梁凤一个人孤孤单单地熬到了日本投降。

从一个地獄进到另一个地獄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不久，她才和佛山黃球記絲織厂的一个机面工譚祐結了婚，第二次来到佛山，进了公記隆絲織厂。可是，在旧社会，劳动人民的苦难是沒有尽头的。梁凤找到了工做，只不过是走出了一个人地獄又进入了另一个地獄。从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九年的三、四年間，她先后在六个絲織厂做过工，受尽了資本家和工头的压迫和剝削。

解放前，佛山的絲織业都是手工操作，不仅工人的劳动强度大，而且給工人带来了不少特殊的职业病。梁凤在厂里干的是車絲开緯的工作。在开緯之前，一束束准备开緯的“握头”要先放在水里泡浸三、四天，开緯时，工人再用手从水里把它一束束捞起来放入手搖絲車。这样，开緯时一股臭气，令人作呕，而开緯工就这样成天在臭气和潮湿里劳动。加上手搖絲車又矮又小，工人只能坐在一条一尺来高、六七寸寬的小凳子上操作。这样坐久了，即使年青健壮的人，也会头晕、眼花、肚涨。夏天，第一至三造新蚕絲的蚕胶特別多，特別咸，从手搖車飞溅出来的蚕胶水，沾得滿身都是，夹着絲的右手沒有一天不烂得見肉，痛得要命，冬天，夹着絲的手指又被冻得麻木，僵硬，紅肿，在四个手指的夹縫里，龟裂得連骨头都露出来，天天流血。梁凤就是这样咬紧牙关一天又一天地挨下去的。

解放前，佛山絲織业的資本家残酷剝削工人、迫使工人成天拼命地劳动的一种恶毒的办法，就是实行低到不能再低的計件工資。資本家欺騙工人說，誰做得多，誰的工資就多。事实上，資本家在采取計件工資的同时，又挖空心思地对产品质量提出許多苛求，只要厂方认为不符合质量标准，就要扣除工資。这样，尽管工人除吃飯的时间外，每天从早到晚不停地替資本家劳动，但經左扣右扣，每月的工資依然少得可怜。梁凤那个时

候才二十多岁，又做过多年的开緯工，算得上是年青力强，技术熟练，但每天的工資还不够买回一斤米。加上这期间，国民党反动派滥发紙币，什么金元券、銀元券，轉眼間便变成了廢紙。資本家自己死死抓住黄金和实物，但对工人发工資却不以实物做标准。这样工人的实际工資又給打了一个大大的折扣。总之，資本家靠剝削发财，工人做生做死，还是維持不了两餐。

这期间，梁凤同其他的絲織女工一样，除了遭受資本家这种残酷的剝削外，还經常受着无故开除和失业的威胁。梁凤从这个厂跑到那个厂都逃不出資本家的残酷剝削和压迫，不管她多么勤劳，始終摆脱不了貧穷困苦。

全中国的解放，使梁凤这个在旧社会的苦水里整整泡了三十年的女工，也从苦难中解放出来。她在党的教育培养下，在阶级斗争的锻炼中提高了自己的阶级觉悟，终于在一九五六年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她忆苦思甜，决心要把自己的一切力量贡献給党的事业，保卫住工人阶级的江山，永远也不容許罪恶的資本家再来吮吸劳动人民的血汗，不容許罪恶的剝削制度复辟。

秦權使用及辨偽

商承祚

秦權出土的記載，最早見于北齊顏之推《顏氏家訓·書證》第十七：

“開皇二年五月，長安民掘得秦時稱權，旁有銅塗，鐫銘二所；其所曰，‘廿六年，皇帝盡屏〔并〕兼天下諸侯，黔首大安，立號爲皇帝。乃詔丞相狀、綰、灋度量，則不壹，歟疑者，皆明壹之。’凡四十字。其所曰，‘元年，制詔丞相斯、去疾，灋度量，盡始皇帝爲之者，皆□〔有〕刻辭焉，今襲號，而刻辭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如後世爲之者，不稱成功盛德。刻此詔，〔故刻〕左，使毋疑。’凡五十八字，一字磨滅^①，見有五十七字，了了分明。其書兼爲古隸，余被敕讀之，與內史令李德林對見。此權今在官庫。”

其所謂“旁有銅塗，鐫銘二所”，系指嵌入鉄權上的銅詔版而言，此種鉄權今傳世的只有四具，皆爲始皇詔權，而兩詔的則未曾見，可知是類權存數不多。

宋呂大臨《考古圖》卷九有“平陽斤”兩詔銅權，據附圖看，是偽造的（詳後）。宋薛尚功《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卷十七收入兩詔銅權二，後一器“平陽斤”即錄自《考古圖》者，其引《古器物銘》云：“世所謂秦權至多，銘文悉同。”按《古器物銘》今已不傳，不知誰作？疑出自宋人之手。自隋開皇至呂大臨書成時，九百一十年間，秦權是有不斷發現的，以其文皆同，不爲著錄家所重視，實屬可惜。

一

秦權，一向都被認爲是“杆秤”上所用的“秤錘”，從《顏氏家訓》起便如此，《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亦謂：“古權，亦有如今之稱錘相似者。”清阮元編錄的《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卷九）亦承其說，“案權，稱錘也。《漢志》（指《漢書·律曆志上》）云：‘權者，銖、兩、斤、鈞、石也。’”千餘年來無不以漢以後之秤錘同于秦權，其說陳陳相因，殆無二致，至今尙未見有提出任何新的見解。解放前，傳世秦權見于各書所載者，去其重複約有五十多具，疑、偽雜糅共約占百分之五、六十。姑就所見真權而論，在本身有陽文或陰文記

• 本文有的材料，承蒙遼寧省博物館、北京市文物工作隊、天津歷史博物館、陝西省博物館、上海博物館、南京博物院、廣東省博物館大力協助，梁方仲、胡金昌同志看過本文，提出不少寶貴意見，一併致謝。

① 錄銘有誤漏字，如“皇帝盡并兼天下諸侯”之并誤“屏”；二世詔“刻此詔，故刻左”，漏錄“故刻”二字，則全文實爲六十字，非五十八字。

重量数字的有八斤、十六斤、廿斤、廿四斤四种。今世二百多斤的大杆秤，最重的锤亦不过七至八斤^①，因知秦权不是秤锤！过去，我个人每以秦权就是衡——天平的“砝码”。抗日战争胜利后至解放前，长沙市战国楚墓有小衡出土，衡为木质，长42.5厘米，此外有小铜盘二，大小铜环权十枚，是一套完整的衡器。衡正中及左右两端有直穿孔，盘各有三孔，提线贯于衡之两端，中孔悬绳，则力均而平衡（当时还会有外架）。环权最大一枚刻“□益”二字，重251.53克，最小的一枚（第十枚）重0.69克^②，各环权层层垒叠似塔形。一九五八年，湖南常德战国中期十八座墓葬中，有三座较大的木槨墓，随葬品有四至五个为一组的环权，25号墓还保存着长23厘米的竹杆衡，上髹黑漆，铜盘二，环权四枚，最大的重32克，最小的重4.3克^③。看到了这些资料，更坚定了我对秦权是“砝码”而不是杆秤锤的信念。这种小衡，是用以称金银等物的小数，与现代的“等子”用途相类。

小衡承物以盘，最大的衡则易盘用钩。从楚衡看，知秦以前的权有环权与锤两种，小衡用环权，大、中衡则用锤。大、中衡及衡的支柱从未发现，其形状与安装法皆不得而知，当皆为木构，故腐烂不传。比秦权时代早的有“五年司马成公”八石铜权^④，“公卿半石”铁权^⑤，“禾石”铁权^⑥，皆阳文铸字。“侯川”铜权，只见拓本^⑦，底径为2.5厘米，可能用于中、小衡上。

以上所举四权，从文字风格看，为战国前后物，当非秦制。“禾石”权刻两诏，为后人伪加。司马成公权是齐国器，因一开头便有“五年，司马成公朔月岁事”等字。按“立事岁”为齐国田陈当权时某些器铭中的术语（此权岁上脱“立”字，又误将岁事二字刻倒），其例正与国差簠、子和子釜、陈纯釜、陈喜壶诸器同例。

汉代衡、权有王莽始建国的制器传世。一九三零年前后，甘肃省定县西七十里的称钩驷发现新莽时代的衡、柱、钩、各一，权四，是一套比较完备的衡具。权为环形，首行刻重量，继刻“始建国元年正月癸酉朔日制”十二字^⑧。据《汉书·律历志上》云：“五权之制，以义立之，以物钧之，其余大小之差，以轻重为宜。圆而环之。”注引孟康曰：“谓为锤之形如环也。”知汉制权为环形，今此套权尚缺一枚。王莽篡汉，锐意复古，又仿照秦始皇同一度量衡的作法，毁旧器而铸新器，复于每件新器上刻入新朝年号，但权形如环

① 据了解，现在五十斤的市秤，锤重约三斤，二百斤的秤，锤重约六斤，二百五十斤的秤，锤重约七至八斤。

② 《楚文物展览图录》第三十一页。一九五四年，北京历史博物馆版。

③ 湖南省博物馆：湖南常德德山楚墓发掘报告第四六八页。《考古》一九六三年第九期。

④ 于省吾：《商周金文录遗》第九十六页后页，实物藏北京历史博物馆。权鼻削去，知在某一时期废而不用。

⑤ 黄濬：《尊古斋所见吉金图初集》卷三第三十六页（以下简称《尊初》）。

⑥ 罗振玉：《贞松堂集古遗文补遗》卷中第三十七页（以下简称《贞补中》）。

⑦ 《商周金文录遗》第九十六页后页。于省吾释“三侯”权。

⑧ 发现后陈列于甘肃民众教育馆，一九三二年被盗失踪，一九三四年该案在天津破获。破案前，其衡及九斤权已被卖掉，其衡今藏北京历史博物馆。《尊初》卷三第四十六页的九斤权，即四权之一。此外，《贞松堂集古遗文补遗》卷下第十四页为三十斤权，黄濬《衡斋金石识小录》第五页为八两权，与此四权无关。

則保存漢時舊制，孟康為三國時魏人，衡、權為日常生活接觸之物，其所云，仍據漢制而言。縱觀收入各書的漢權，其不作環形而為錘狀的^①，我個人認為皆是不可靠。

戰國時的著述，涉及權、衡之說的不少，如《管子》、《孟子》、《荀子》、《墨子》，等等。漢代則沒有涉及杆秤的資料。《語林》：“孟業為幽州，其人甚肥，或以為千斤，武帝欲秤（稱）之，難。其大臣乃作大秤挂壁。……業入見，……於是遂秤（稱）業，果得千斤。”（《太平御覽》卷八百三十，資產部十，秤類引。）所云武帝，當指南朝齊武帝（公元四八三——四九三年），這一段話，對杆秤敘述得很清楚，因為衡是不能挂于壁間的。又可知當日大臣為稱孟業造了一杆特大的秤，非發明杆秤。南朝梁張僧繇二十八宿神象之一的執秤圖（鄭振鐸：《中國歷史參考圖譜》第八輯，第四十七頁）（圖一），很具體地將杆秤繪畫出來。杆的一頭穿繫連柄雙鉤，支點懸繩略偏于鉤的一邊，約占全杆五分之二強。從杆長及支點位置看，所稱重量是不會過大的。杆秤由衡發展，是民間在工作過程中從實踐摸出來杠桿的實際經驗，即支點可以不必居中，左右臂不須等長，在稱物時，沿着長臂移動的作用力錘，來平衡短臂的重量，作用力錘可大為減輕，而只用一個錘就夠了。此後，根據這事實，得出用重量乘短臂的乘積，等於作用力乘長臂的乘積這個杠桿定律，杆秤就更加進步了。這幅執秤圖，雖是後人臨摹而非原蹟，但給我以很大的啟發，知道杆秤的發明是在魏以後，南朝梁天監以前二百三十七年間（公元二六五——五零二年），得出相對的年代。

二

許慎《說文解字·叙》：“郡國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青銅器在東漢不斷出土已非奇事，但以之為珍玩，則實始自北宋，呂大臨《考古圖》就是收集各家所藏而成書的。于時好古風氣一開，士大夫競相購買，商人則以有利可圖，偽品應時而出，秦權亦不例外。權是不難偽造的，不比其它器物之難成。清光緒中葉，陳介祺等崇拜“相斯”遺文，各藏家亦從多方面收集始皇時器，於是秦權、量和詔版的偽造以及各種樣式層出不窮，購者不察，每每落入商人圈套而不自覺，時至今日，將傳世秦權資料集中，加以分析研究是有必要的。關於真偽的辨別，我初步意見將之歸納為五點：

（一）秦權的規定樣式是扁圓形而實心。在始皇早期，曾制作過一種很規則的瓜棱形

^① 羅振玉：《夢軒草堂吉金圖續編》（以下簡稱《夢續》）第四十五頁“官累重斤十兩”權，及《貞松堂集古遺文》（以下簡稱《貞遺》）卷十三第二十八頁后頁“官累重斤十兩”為平底權，其前頁“官累重斤二兩”則未知其狀。抗日戰爭前，我藏同樣文字的雞心式權，幾經研究，知用漢馬鈴灌入銅水而後刻字。劉體智《善齋吉金錄》卷十二第三十二頁與我藏之權當同一辦法，其不同是捶平底部，但刻字奇劣，一望而知為贗品。又《夢續》第四十六頁王莽五斤權，及《貞遺》卷十三第二十九頁后頁莽一斤十二兩權，與制度不合，因漢環權必“肉倍好”，即權之一邊必超過孔的一倍，此權乃如環，好倍肉三倍多，其偽一；“律字”、“癸”字不符莽文結構，其偽二，殆作偽者取無字之舊銅環為之。天津歷史博物館藏莽權如錘，“始建國元年”前未著斤兩，刻字拙劣，偽迹昭然。

权，始皇詔也刻得工整，我怀疑这是宫廷中的用物，此外不造任何巧式，因属于民间使用，如式样奇异，必有疑问。举例：

1. 平阳斤：《考古图》卷九第二十三页（据亦政堂刻本），始皇詔六行，二世詔九行，“平阳斤”一行，共十六行，一为河南李氏藏，一为河东王氏藏，两图器形相同。吕氏记云：“二权各高二寸，径寸九分。容合。重六两。铭一百有二字（应作一百字），又有三字曰‘平阳斤’。王氏（器）同。”因两器铭文同，故吕氏仅录其一铭。所谓“容合”，指腹部空位容量为一合，是其形如钟状^①，与规定的扁圆形或早期制作的瓜棱形均不合。

2. 两詔权：见端方《陶斋吉金录》卷四（以下简称《陶·四》）第四页秦铜权一。始皇詔九行，二世詔十行，共十九行，重125.75秦斤，64.454市斤，32227克。底有圆孔，其孔径约占底径百分之四强，深度不得而知（据我藏全形拓本言）。不仅这类孔径有疑问，其重量亦与秦斤不符合。

3. 美阳权：刻两詔，鼻左右有“美阳”二字，最先著录于吴大澂《邃斋集古录》第二十四册第十页。始皇詔七行，二世詔十行，共十七行，浅磨十七棱，字刻于凹面，腹空。器通高7.1厘米，底径5.6厘米，腹空深6.1厘米，重0.910秦斤，0.47市斤，235克。刻字甚劣，器形如钟，很可能是仿照《考古图》平阳斤式样而伪的。（图二）

4. 十斤两詔权：始皇詔八行，二世詔七行，共十五行，另十斤二字刻款一行。器通高6.6厘米，底径10厘米。底凿方孔，孔径6.3—6.5厘米，深1.4厘米。重8.534秦斤，4.374市斤，2187克。（图三）

5. 十六斤权：始皇詔十一行，另十六斤三字刻款一行。器通高6.5厘米，底径10.2厘米，底凿方孔，孔径5.2厘米。重9.073秦斤，4.65市斤，2325克。与上权底皆凿方孔，是有意巧作，再从造型和文字风格看，殆与上权出自一人之手。

6. 大驪两詔权：其样式、铭文行款与句邑权完全相同，所不同的是“大驪”二字为阴文。器通高5.9厘米，面径8.1厘米，中有横梁；底径9.1厘米，孔径5.4厘米，边厚1.8厘米，腹空深4.2厘米。重7.882秦斤，4.4市斤，2200克。我虽未见原物，据吴氏谓“制作铜质均相类”，似亦黄铜，一范铸成，一人伪作^②。《陶斋吉金录》卷二第二十七至二十八页箸录。（图四）

7. 句邑两詔权：八角形而中空。始皇詔占四面，每面刻字两行，行间刻直栏，凡八行；二世詔亦占四面，每面刻字三行，行刻二直栏，凡十二行，共二十行，另“句邑”二字在顶面横梁左右，阳文。器初藏沈秉成（仲复），光绪十七年（公元一八九一年），吴大澂以“古黄琮易之”。吴氏题其藏权匣曰：“秦权詔书多刻文，独是权与大驪权乃铸文，制作铜质均相类。”（见《小校》卷十一，十六至十七页。）一九六四年六月，我曾见此权于天津

^① 又有仿造此权者，只刻始皇詔，平阳斤三字横列，见刘体智《小校经阁金石文字》（以下简称《小校》）卷十一第六页前页第二拓本。

^② 《秦录》第二十页后页两詔权，亦分为八面，高宽度与句邑、大驪略同，单刀刻文殊劣。知是类权已三见。

历史博物館，器为黃銅，而非青銅制，阳文句邑二字，乃用刀鑄刻，銘文用双刀，非如吳氏所說为鑄文。器通高6.5厘米，面径8厘米，底径9厘米，孔径5.5厘米，边厚1.7厘米，腹空深4.4厘米，重8.878秦斤，4.55市斤，2275克。字体滞拙，其結構多有不符日常規，比如，始皇詔中的天字、首字、立字、壹字；二世詔的“制”字，故意将“𠂔”刻为两“山”相叠下从一“巾”（此字大驄权最显著）。此外，斯字的斤旁，始字、如字的女旁和毋字末笔皆不符合真权的笔势，这些都是显著之点。（图五）

以上七权，从器制、文字等等方面研究，皆可看出作伪之迹。

（二）奇制巧作固然可以提供我們怀疑的綫索，但作为充分依据还是不够的，仍須从当时通行文字方面考虑研究。始皇“书同文字”以后，以暴力来强制执行，当时官吏自然不敢书写那些“不同文”的字以自蹈禁令。降及秦末，綱紀廢弛，一切工作，无不虛应故事，潦草塞責。然而拿权上文字來說，工整者却未必尽真，而草率者不尽是假，所必須注意的还是此权作于始皇初期抑作于末期或二世的时候。“毆”字出現于二世詔，是值得我們注意、考虑、研究的。須知毆字是在始皇未灭六国以前的秦文，迨文字統一之后，此字廢而不用，而采用六国的“也”字代之。不单是权、量上二世詔如此，瑯邪刻石二世詔亦如此，事实昭然，无庸怀疑，况当始皇严刑峻法控制下的度量衡主管者和工人竟敢将“毆”字重新出現于众目睽睽的标准器上，是难以設想的。退一步讲，不論二世时的政治經濟如何混乱，但刻詔工人对政令上所規定的必用字还是熟练的（此与草率、漏刻文字有区别），不存在擅改“毆”字的理由，只有后世作伪的人，或由“文人”提示，才会玩弄花招故作古雅。所以如果光从文字美好来断定真伪，而忽視历史時間性，就不免寻找理由为“毆”字辯解。

毆字首見于平陽斤，再見于端方藏之兩詔石权，三見于“禾石”兩詔鉄权。鉄权兩詔是后世妄人刻入的，以鉄权无刻字之理（詳后）。則此三权，迨“一丘之貉”。

（三）鑄权之时，只要将权的重量与范計算得当，便可施工，一个范母，能够出产若干个权。銅水是从底部浇注的，因底口面积大，既易于操作，出产率高，并易于滿足社会需要。使用在权上的青銅，提炼并不精淨，其中还含有不少杂质，所以入土两千多年，特别是底部，常常腐蝕斑剝，出現些顆粒的东西，其鼻孔則因穿绳頻頻提挈，磨磷久而圓熟，这些自然而然的現象，在伪器上是沒有和見不到的。与此相反，伪器的底部較为光澤，鼻孔呆板，假锈尽管做得不錯，但如子細分析，便知其浮而不实，与从内部透发出来的锈两样。用上述标准来鉴别真伪，不失为重要方面之一。

秦权以斤为計算单位，如八斤——廿四斤，并不附加奇数的两。因此，在鑄某个权，事先对于該范的容量計算，一般是依照重量稍为增加一点，但不能减少，在做校正手續时，将超重量从底部凿去，这种挖凿遺迹，我們还可以明显的看到。挖凿面由浅而深，且不規則，甚至不止挖一次和不止凿一处，如表编号7、9、12的权，是不合鑄造及校正的常規的。有人或說：另有两个十六斤权，底皆作圈状（容庚《秦金文录》，以下简称《秦录》第十至十一页。《尊初》卷三第四十四页），真权何尝不如此？我认为这問題并不

难答复。此两器圈孔的边并不整洁，証明为鑄后所凿，我虽没見原物，就拓本可以看出。第一权因凿后仍超过十六斤重量，于是又剝去权边有相当高寬度的一块銅，始皇詔文刻至此处，刚好遇着缺口，就在缺口上刻一“者”字，其下“皆明壹之”一行，也适当让开缺口，所以此行比其它行款的距离空位較为寬些。以上各种情况，无不出于自然，与故弄玄虛者不同。为什么此权发生这現象？我以为这是始皇末期的产物，在制范之初，疏于計算，故超重量較大，即刻銘亦异常潦草，說明秦末法制已趋于崩潰，超重量就不得不一凿再凿而伤及权身，工作粗疏，主管人員不是放松了检查，就是将就发用，如在盛世，是不可能有这样的情况出現的。

(四) 無論是哪一個时代的鉄权，只有大型鑄字，如“禾石”、“公衡”等权。《秦金石刻辭》上四页后页二世詔小鉄权，是令人难以相信的。鉄权只嵌入銅詔版，而且是“石”权。二世詔是重新检校前代的权，加刻于始皇詔之后，故有“刻此詔，故刻左”，必須刻于始皇詔之左。因此，决不能权上无始皇詔而单独刻二世一詔，道理很明白，如其有之，即銅权亦可肯定其为伪制。

(五) 秦权是有鑄、刻若干斤数的，伪造器也有这样作的，但因作伪者不了解秦制的斤两，往往任意鑄入斤数，尽管文字刻得可以乱真，如检校重量，就易露出馬脚。过去图录家除《考古图》和《陶·四》等书，把每一个权皆注明其重量，对辨伪研究工作有很大的贡献，其它图录多忽視这一重要工作。《陶·四》有四个記斤的八斤权，經過检校和研究后，知道真伪各居其半。二十页第九权为8.192秦斤，二十八页第十三权为8.008秦斤，重量两相接近，文字也对头，是可靠的，但二十四页第十一权，为7.131秦斤，相差近一斤，二十六页第十二权，为8.003秦斤，此权看来似乎沒問題了，經過文字对照，問題出在与上器所刻的字不仅刀法雷同，結体及每行的字数排列、避让情况如出一轍。最显而易見的是“状縮”、“則不”、“壹之”各占一行，皆据底足，而字的傾斜程度也近似。第十一权“为”、“丞”二字直不成字，迫故意变换結構以欺人，反而弄巧成拙(图六、七)。又同书第四页第一权的两詔权，从始皇詔刻字看，很不容易判断为伪迹，但秦制一百二十斤为“石”，今其重量为125.75秦斤，多出五斤多，以校119.99斤之高奴权(图八)，真伪立辨。今将凡已秤过各权，列表于后，备讀者参考。

小 結

秦权不是秤錘，可以确定无疑。杆秤始于何时？据現時看到的只有南朝梁的执秤图資料，但不能說杆秤創始于梁，它应当比梁早，但又不会太早，理由是，从图所示的支点偏度不大，似乎可作为不太早的論据。杆秤的发明，不仅是力学进步的又一表現，且有使用便利，附件减少，产量率高，以及造价低廉的种种优点。

秦以前大衡用鼻权，小衡可能皆用环权，汉則一律用“肉倍好”的环权。王莽衡权的发现，給我們研究汉权以有利条件，从而知道过去认为出土的一些汉錘形权，或是环权

而非“肉倍好”的，皆为后人忆造。这是我从已发表的資料作出的論断。

北宋好古风气一开，士大夫竞相购藏青銅器以为玩好，商人以其有利可图，于是商周鼎彝，秦权汉器，真偽并出，平陽斤即其偽証之一。秦权“斤”上必附有重量数字，其兼有地名的則分載两处，决无地名与单独一个“斤”連在一起的理由，如“平陽斤”，是沒有任何根据的，以“斤”，只是衡的一种称谓，不包涵重量单位，但“石”权則可以与地名相連，如“高奴、石”。“石”为秦制一百二十斤，是已說明其重量了。呂大臨記此权重量为六兩(宋兩)，合0.876秦斤，五斤以上之权差二兩左右或更多些，問題并不大，如十兩权差一两多就說不过去了。“毆”字的出現和器形如钟，等等，都是无法使我相信的。平陽斤著录后，后世受其影响很深，如美陽权、秦一斤权(《权衡度量实验考》第七十一页，以下简称《实考》)，都是模仿其形的，大驪、句邑兩权，則改变其形状，底凿方、圓孔，是作偽者的“創新”。

刻詔工人有新老手，技术有高下，故不能以文字工拙、美丑、好坏定器之真偽与鉴别真偽的标准，制作早、中、晚三个时期都有密切联系，检校重量尤为重要。有的兩权重量相接近，其中真偽各一，不是用真权印模就是重量巧合，不从文字对照研究，就极易被其蒙蔽，这又要借助于文字方面的鉴定了。

光緒中叶，青銅器收藏家提倡秦文字，因而伪权、量及詔版不断出籠。在此之先，商人散播陕西省内有大量出土这些器物的謊言，相信这种話的人可能不会少，端方就是其中之一，从其題一百二十秦斤(伪)权全形拓本可以窺見一斑。他說：“近年陝西咸陽原上出秦权、量多至数十百种”(全形拓本上的題字——作者藏)，是落入他們圈套之中的。《秦录》集中所見的秦权拓本，包括銅、鉄、石①三类計四十五器(其中一权重出，实为四十四器)，据我个人初步审視，伪器有十三件。《小校》卷十一收入秦权拓片四十紙，伪品竟达二十六(内有独刻二世詔者三)，刘氏忽于选材固足惊人，但据此可以看到伪器不是少而是多，其未見而未入录的伪器数量必不止此。真偽比例，于此得其梗概。

据了解，陝西是伪权制造的大本营，其次則为山东、苏州，但为数不多。做锈色又各有各的特点。傅大祐同志研究各地锈色得出的經驗是：总的說来，伪秦权的制造，山东赶不上陝西，若从锈色來說，山东锈色浅而浮，喜欢渗入些鉄锈。陝西做锈有两种：一种厚而发深綠色，锈地不平如橘皮紋；另一种为大片锈，造得有相当的好，几乎可以乱真。此外又造一种熟坑不带锈的权，苏州技术高出陝西、山东一筹。

青銅器伪器之低劣者可置毋論，其略有水平的亦不难真偽立辨，但如遇作伪手段高明，几与真器无异，一时是难以看出其破綻的，这对我們鉴定工作來說是一种考验。秦权器小虽簡單，辨伪問題則不簡單，由造型不同起，以至时代早晚，文字結構与刀法各异，重量检校折合，锈色多样化等等問題，都要加以分析，专注意某一面和专攻某一点

① 始皇石权，初藏吳大澂，后归端方。石质容易碰損，不宜以之制权。周进《居貞草堂汉晋石影》的石权为高方形，始皇詔分刻石之兩面，更一望而知其伪。今在故宫博物院。

是不够的，必須全盘考虑。在发现某一疑点时，提不出充分证据和充分理由，問題接触不到核心，就无从解决，有时往往用上了不少的时间，找到了不少资料，但因对不上口径而失败，这是不足为奇的，只有暂时放下，等待日后来解决。等待，不等于永远失败，而是防止急躁的否定和简单化的肯定。

在整理各权重量的过程中，我发现了五斤与八斤权的加重（指秦斤，十两权除外），各按其原有的倍数而分为两个系统：其一，从五斤起算的五斤权，加一倍为十斤，此后，不是用五数倍加，转而以十斤为基数加倍，即十斤之两倍为二十斤，三倍为三十斤（为“鈞”权），十斤之十二倍为一百二十斤（为“石”权）；其二，从八斤起算的八斤权，加一倍为十六斤，三倍为廿四斤。由此可见，第一种权虽从五斤起数，但不是层层以五斤进位，而是上升至十即以十递加，与第二种八斤权始终用八相加者不同。八数权最重的为廿四斤，再大的数字则未见。鈞、石权之起数和计算，及其与八斤权加倍计算方法之差别，向无记述，此或可补秦制权衡说之不足。

由此可见，秦斤的起数不是由五斤就是由八斤起算，此外没有其它起算的斤（以“两”起的不算）。《梦图》卷中第二十八页（亦见《秦录》第十七页后页）的廿六年六斤詔权，阳文“六斤”是鑄后刻，斤字作“斤”，不符权文任何“斤”字的写法，詔文中也有不少怪字结体。作伪者每每迎合人们好奇心理，欲以奇制胜，如常见的只有八斤权，遂造出一个六斤权，使人一时不察，被其欺騙。

出土权经过重量检校，有的权多出秦两近四两（表18.五斤权），有的则相差至半斤（表21.八斤权），不论大小权，增减数字的情况很普遍，可能包括三种原因：第一种，当日此权使用率不高，出土时又有不少结锈，所以重量增加；第二种，权的使用率高，磨龔频频，入土又有剥蚀，故减量；第三种为著录家过称量不准确，则数字增减就会有所出入，如《陶四》：第一第二两权，与《实考》同为一器，虽皆认为是三十斤鈞权和一百二十斤石权，而吴氏是记大数，只能参考，不宜依为信据。此外，我们也必须考虑到，当时所谓标准器，不尽然都标准，重量是有出入的，造成同一重量的权，就有轻有重。

始皇詔文“則不壹”，用“壹”不用“一”，是大家知道的，而則字作“𠄎”不作“則”，有人不见得注意，我认为作“則”的权是始皇晚期的产物。从“𠄎”字改作“則”这一点来看，始皇晚期文字是发生过小变化的。因此，在鉴别时，如疏于考虑，仅据一“則”字而不区分时期的早晚，一概认为伪器，那就不免有时反而以真为伪，以伪为真。“則”字也见于伪器，他们是有依据的。从“书同文字”颁布标准正体字看，则，原本作“𠄎”不作“則”。

本文秦权重量部分从著录书籍称过的重量重新加以折合，不可能正确，只是约数，另部分是各省博物馆藏器的重量，如某一器亦见于著录，当以馆藏称得的重量为准。重量分列秦斤、市斤、克三种。

本文根据上述各种情况，和参酌器制、文字等等作出辨伪初探，可惜的是绝大多数未见实物，征集的资料还不完备，错误之处，在所难免，希望读者不吝指正批评。

一九六五年六月于中山大学

附：秦 权 重 量 表

編 号 及 器 名	重 量			著 录 及 现 藏	辨 伪 和 說 明
	秦 斤	市 斤	克		
1.两詔权 平阳斤	0.873	0.447	223.8	考古：九、22	伪。形如钟状。
2.又	0.876	0.448	224.5	实考：71	伪。形如钟状。吳氏謂权底有磨錢，故減平。
3.又 美阳	0.910	0.47	235	上博 编号39484	伪。形如钟状。
4.又 大驢	7.882	4.4	2200	陶續：27。南院	伪。作八角桶状。
5.又 旬邑	8.878	4.55	2275	津博	伪。作八角桶状。
6.又 (八斤)	8.9	4.56	2280	上博 编号8110	伪。八斤二字刻。
7.又 (十斤)	8.534	4.374	2187	上博 编号8112	伪。十斤二字刻。底有方孔，未著录。
8.又	9.084	4.656	2328	上博 编号8113	伪。
9.又 (十六斤)	9.073	4.65	2325	上博 编号8111	伪。十六斤三字刻。底有方孔，未著录。
10.又 (三十斤)	29.737	15.242	7623	陶四：二、6	两詔后又出部分始皇詔数行，殆初刻詔日久有漫漶字，二世时补刻前詔，故有重文，亦见《实考》七二頁。
11.又 高奴 (石)	119.99	61.5	30754	陕博	鑄字十六。
12.又	125.75	64.454	32227	陶四：一、4	伪。底有圓孔，亦见《实考》第七三頁。
13.始皇詔权 [十两]	0.967	0.496	248	上博 编号39325	
14.又 [十两]	0.995	0.51	255	陶四：十八、38	
15.又 [五斤]	4.788	2.454	1227	陶四：十六、34	其十七、36与此重出，故不录。
16.又 [五斤]	4.858	2.49	1245	上博 编号37814	相当剝蝕。
17.又 [五斤]	5.049	2.588	1294	陶四：十五、32	作瓜棱形。
18.又 [五斤]	5.385	2.76	1380	陶四：十四、30	
19.又 (八斤)	8.003	4.102	2051	陶四：十三、28	八斤二字刻。
20.又 (八斤)	8.192	4.199	2100	陶四：九、20	底刻八斤二字，原有阳文八字。
21.又 [八斤]	7.812	4.004	2002	陶四：十、22	

22.又	〔八斤〕	7.983	4.066	2033	广博	漏刻“为皇帝”三字一行。底有凿痕。
23.又	(八斤)	7.131	3.655	1818	陶四: 十一、24	伪。八斤二字鑄。
24.又	(八斤)	8.003	4.102	1051	陶四: 十二、26	伪。八斤二字鑄。
25.又	〔十斤〕	9.529	4.884	2442	北队	
26.又	〔十斤〕	10.602	5.434	2717	上博 编号36710	
27.又	(十六斤)	15.192	7.787	3893	陶四: 八、18	底刻十六二字漏拓, 并将权身凿痕用墨涂平, <秦录>第十頁各部显著。
28.又	(十六斤)	15.534	7.962	3681	陶四: 七、16	十六斤三字刻。
29.又	(十六斤)	15.783	8.09	4045	陶四: 六、14	十六斤三字鑄。
30.又	(廿斤)	20.378	10.444	5222	陶四: 四、10	廿斤二字刻。
31.又	〔廿斤〕	19.754	10.118	5059	陶四: 五、12	作瓜棱形。
32.又	(廿四斤)	24.029	12.316	6158	陶四: 三、8	廿四斤三字刻。
33.又	〔石〕	117.185	60.4	20200	陶四: 十九、39南院	鉄权嵌韶版, 足部缺损一处。
34.又		0.910	0.47	235	辽博编号356	伪。
35.又		0.975	0.5	250	津博	伪。权頂如圓錐, 左右錯平为鼻, 亦见<衡斋金石識小录>上册第三頁。
36.又		1.014	0.52	260	辽博编号355	伪。鼻残缺。刻文纤弱无力。
37.又		1.161	0.595	297	津博	伪。
38.又		4.273	2.19	1095	津博	伪。
39.又		5.932	3.061	1535	北队	伪。藏权匣題:“秦銅权陝西出土, 庚戌(宣統二年公元1910年)續得十九权。陶斋識。”未著录。

器名栏: 斤外有〔〕符号者, 据真权称得之秦斤补入, 伪权则不补。

重量栏: 秦斤及市斤皆以十六两計, 每一市斤为500克。

著录及现藏栏: 各名简称。考古: 九、22, 为<考古图>第九卷第二二頁。实考: 71, 为<权衡度量实验考>第七一頁。陶续: 27, 为<陶斋吉金續录>第二七頁。陶四: 二、6, 为<陶斋吉金录>卷四第二权第六頁, 以下类推。上博: 为上海博物館。南院: 为南京博物院。津博: 为天津历史博物館。陝博: 为陝西省博物館。广博: 为广东省博物館。北队: 为北京市文物工作队。辽博: 为辽宁省博物館。

派克美学思想批判

李 泽 厚

派克(Dewitt H. Parker 1885—1949),是美国现代资产阶级哲学家、美学家,长期任密其根大学教授,写有《自我与自然》(1917)、《美学原理》(1920初版,1946修订再版)、《艺术与分析》(1926)、《人的价值》(1931)、《经验与实体》(1941)、《价值哲学》(1951由K·弗那克那整理作者遗稿出版)等专著以及《真善美》、《艺术的本质》等论文。派克通过这些论著企图建造一个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他特别着重的是价值问题,从而伦理学特别是美学便成为他论证的主要课题。他的美学著作讲到了各种艺术中的一些具体的经验现象,在英美相当流行。

派克的基本哲学观点是十分露骨的主观唯心主义。他自称其哲学是“经由想象展开的彻底的经验主义。”在派克看来,存在乃是经验,而经验即是实体。他说:“除了感觉和意象而外,我们不能发现事物再有别的什么了。”^①“经验对于我们……是一种立足于自身的独立自存的实质。”^②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自马赫以来的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说烂了的货色,派克的观点,不过比现代一些实证论者说得更为干脆和更少掩饰而已。

派克还进一步明确地将经验还原为自我(the self)。他认为,不存在一种一般的经验,而只有各个以“自我”为中心的经验。“正如不是水,而是这塘水或这杯水存在一样,不是经验而是这个或那个经验中心存在着”^③,”中心与自我是同一的”^④。那么,这种作为经验核心的“自我”又是什么呢?派克强调自我的本质是活动(activities),而活动的根源是意欲或欲望(desire)。派克所讲的意欲,如他自己所明确指出,是相当于叔本华讲的“意志”,柏格森讲的“生命力”,弗洛伊德讲的“利比多”(libido)或欲望;此外,我们还认为,在把“自我”归结为反理性的情欲意愿这一点上,派克也相当接近于新黑格尔主义。派克凭空虚构,把自我分为所谓“焦点的自我”(focal self)和“胚素的自我”(matrix self),前

① 《自我与自然》第53页,哈佛大学出版社1917年版。
② 《经验与实体》第56页,密西根大学出版社1941年版。
③ 《经验与实体》第27页。
④ 《经验与实体》第47页。
⑤ 《经验与实体》第46页。

者是表面的一层，即各种具体经验事件中的“自我”，后者才是所谓“永不完全改变”、具有永恒性的“内核”，即“实质的自我”。这个“实质的自我”，便是“欲望。”他的整个理论的谜底是：“自我的中心内核就是欲望”，“一切现实是一个动力过程，它是由诸单子的欲望所协力产生出来的。存在次于行动，而行动乃是欲望的产物。”^① 就是为派克所拟作为自然世界的底层存在的所谓无始无终永恒不变的“阿米加系统”(Omega System)，归根到底也仍然为一种宗教的神意所控制。

在众多的日常经验中，派克特别看重有关价值的各种经验。他从经验出发，不但否认世界能离开价值而存在，而且还否认价值是事物的客观属性。在派克看来，音乐的价值不在音乐自身的某种性质，而只能在听音乐的主观享受的经验之中。没有产生欲望的满足和享受的愉快，便没有价值之可言。所以，派克将价值一再说成为快乐、享受、满足的活动，欲望的对象化^②，等等。派克所讲的欲望，相当含糊笼统。它包括了各种性质极不相同的东西，从感官的愉快、本能的欲求到各种精神的、伦理道德的需要等等。所有的这些，都是完全脱离了历史具体条件下抽象的东西，是一种超脱历史性阶级性的抽象的人的需要和欲望。而且，在这含糊笼统的“欲望”之中，最根本最主要的，仍然是各种动物性、生理性的原始冲动和需求，也就是派克称之为“自然人”的欲求。

很明显，派克的价值论和他的哲学体系一样，是现代资产阶级腐朽的反动的阶级性的反映，是赤裸裸地为帝国主义反动统治阶级服务的。

二

派克的美学思想，是他的哲学体系和价值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他的哲学观点和价值理论的具体应用，在其整个思想中占了一个突出的位置。派克把价值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现实的价值，如健康、爱情、伦理、舒适等等，它们来自实际作用于外在事物的现实活动；另一是想象的价值，如艺术、游戏、梦幻等等，它们来自主观的想象活动。“意欲满足有两种方式，一可称为现实的方式，另一则是梦幻的方式”^③，而审美价值便是属于后一方式的，是后一类价值的主要内容。所以，在派克看来，所谓审美对象，所谓美，作为一种价值经验，便只存在于人们的想象中，而并不是一种物质性的客观存在。从而认为应该将审美对象(aesthetic object)与所谓审美工具(aesthetic instrument)严格区别。尽管派克承认不能象克罗齐那样，认为工具与艺术完全无关，因为没有它，审美经验就无由传达给欣赏者，也无法保留给下一代，但派克又强调真正的审美对象不是这个所谓“物质的承担者”(即审美工具)，而是存在于人们主观想象中的所谓具有“深层意义”的感情形式。“审美的事实就是心理的事实。一件艺术作品不管初看起来多么带有物质性质，它只以被人知觉和享受才存在。大理石的雕像只有在进入并生活在欣赏者的

① 《经验与实体》第350页。

② 《价值哲学》第7页，密其大学出版社1957年版。

③ 《艺术的分析》第4页，1926年伦敦版。

体验中的时候，才是美的”，“我們关于美的定义：一种具有感情形态的想象的价值”^①。派克就这样完全否定了美的客观性，不但否认客观现实中有不依存于人們主观意識(想象)的美，而且也否认了艺术美作为生活的能动反映所具有的客观內容。在派克那里，客观的美(或审美对象)与主观的美感(或审美經驗)是同一个东西，美的問題被看作即是审美經驗亦即欲望的想象滿足的問題。这就是派克在美学中所遵循的哲学基本路綫：不是从现实生活中，不是从客观的社会实践中，而是从主观的欲望滿足中，从想象中，来探求和論証美学的基本原理。

美的本质既然只是有关主观审美經驗的价值問題，艺术作为这种經驗的最鮮明和最集中的体现者，便成为派克发挥其欲望論的主要对象。

派克是从其欲望滿足的价值論出发来論証艺术的本质的。他說：“艺术作品是意欲的一种想象的体现……艺术作品的内容是意欲的符号，其形式亦然”^②。派克早年自称在美学上受克罗齐、立普斯的影响^③，但从其整个哲学——美学体系来看，弗洛伊德痕迹是更为显著的。其根本观点和傾向与这一派在本质上完全相通，派克在著作中不断称引弗洛伊德，认为弗洛伊德“最有价值的成果”即在于“証明了”包括艺术在内的想象是受着意欲的控制和驅使的。他还认为，“被压抑的本能：人的天然的利己主义、当激动时訴諸暴力的傾向、浪漫的性的兴趣……，文明是永远不能成功地将‘自然的’人压伏在其軌范之下的”^④。

派克将这一基本观点貫徹在其关于艺术原理和各类艺术的具体論述中，认为欲望滿足就是种种艺术的內在价值的源泉，也就是需要仔細分析的艺术的“深层意义”之所在。艺术批評家“之于作品犹如心理分析学家之于梦”^⑤。派克认为，艺术作品有三层意义，最深的一层是由艺术家所不自觉的意欲和情感所构成的，它置根于其所已忘記了的童年生活或其他远离当前生活的地方，它們是含混模糊的，“这些便提供了为最深厚的艺术美所必需的神秘味道”^⑥。例如音乐艺术的意味，派克认为，便主要来自这里；而所有其他艺术也經由这条途径而趋向于、接近于音乐。这种“朦朧的、不可捉摸的”“音乐性的”形式美所給予人們的审美愉快，便正是欲望滿足的一种最隱蔽的方式。至于在其上的艺术的其他两层意义，如艺术家意識中的問題和冲突，作品本身的内容、情节、故事、題材等等，那便更是滿足欲望的明显的象征或符号了。派克說，“艺术价值的最明显的来源就是去想象可以引起快感的对象和事件，……編織一些我們喜欢看到的事物的白昼梦境”，“在想象中完成我們喜欢去作的行动，或者感受我們喜欢感受的情緒”^⑦，这就是說，艺

① 《艺术的分析》，第131頁。

② 《艺术的分析》，第48頁。

③ 《美学原理》初版序。

④ 《艺术的分析》第169頁。

⑤ 《艺术的分析》，第14頁。

⑥ 《艺术的分析》，第15頁。

⑦ 《美学原理》，第26頁。

术家和欣赏者經由这种所謂“同情的想象”，化身而为书中人、画中人去感受、去经历在现实生活中所不能感受不能经历的种种生活、事件、情感、欲望。不但各种专供欣赏的文学艺术是如此，就是一般实用艺术的功能美，在派克看来，也全在于此。他說：“审美价值是在想象中轉化了的实用价值。鞋子的美是看起来很美，而并不是穿在脚上的感觉，但却必須是看起来觉得穿着它必然是舒适的才行。房屋的美并不在于住在里面很舒适，但却必須看起来使人觉得住在里面是舒适的。美正在它的用途的回忆和預測中，回忆和預測是想象的两个方面”^①。总之，通过这种“同情的想象”，“在实际生活中是不可能自由发展的”，人在艺术中便进入了一个广大世界，好去体验各种情欲，以全面地彻底地实现“自我”，从而获得愉快。因此，各种艺术对象便都不过是“在现实生活中所不能滿足的欲望的一种想象滿足的代用品”^②而已。各种艺术形式、艺术风格、艺术方法，在派克这里，也便一概归結为滿足欲望的不同途径，例如，在派克眼里，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便不过是从两个方面来实现这种滿足的不同方式，现实主义以其对现实苦难的描写、否定欲望来从反面激起想望而获得滿足；浪漫主义則从正面尽情抒发以获得滿足……，等等，等等。

这就是派克关于艺术本质的美学“原理”。这种原理与馬克思主义的艺术观点是根本对立的。馬克思主义认为，艺术作为社会上层建筑和意識形态，是服务于一定的經濟基础，是服务于一定阶级的政治要求和需要的。它具有历史的具体的阶级性质。派克这种理論則恰好相反，把艺术看作是甚么个人欲望的想象滿足，服务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反动欲求，这其实一点也不新鮮，它在理論上不过是以臭名昭著的弗洛伊德性欲升华論的新装加于立普斯美学移情說的旧貨之上，即“欲望”加上“同情的想象”。派克把艺术内容歪曲解释为欲望的想象滿足，对反动资产阶级來說，这是适应其个人主义腐朽欲望的享受，肆无忌惮地創作和传播各种色情的、恐怖的、頹废的艺术来滿足自己和毒害人民；对广大被压迫被剝削者來說，这同时又是一付麻醉药和欺騙剂，叫人民滿足在想象中，沉醉在这种虚拟的实现中，而放弃使用革命手段来爭取自己的生存和需要。

派克这种欲望美学既然包含了这种反动内容，但他又要尽量加以遮掩，把它作为“万灵丹”来到处販卖，便十分需要披上一件含糊籠統的外衣来掩盖其具体的社会阶级性质；于是，所謂“永恒不变”的“普遍人性”便作为这样一件合式的衣裳让派克給穿上了。派克完全抽掉“欲望”的各种具体历史性质和社会阶级内容，把实质上是资产阶级的各种腐朽反动的个人欲望的表现和滿足，說成是抽象的永恒不变的所謂“普遍人性”。从而派克竭力宣传的所謂艺术的内在价值，便不过是这种掩盖了反动的具体阶级内容的抽象人性(欲望)的表现和滿足。派克把他提出的意欲区分为“普遍的形式”和“特殊的形式”。“例如有关性爱的人性是普遍的，因为它可以被許多个別的人所激起，但是終于由恋爱的过

① 《艺术的本質》，见韦茲編《美学問題》，第68頁。

② 《艺术的分析》第90頁。

程或結婚的形式而被固定下來。又如求食的本能也是普遍的，因為許多對象都可以充飢，但食欲却可以特殊到早飯除了咖啡和麥片而拒絕任何食物”^①。派克認為，後者就是因在特定的環境、制度、習俗、經驗的熏染和規範下所形成的特殊化了的意欲或意欲的特殊形式。但“人性”却總不能以某種穩固的特殊方式為滿足，而總是要求打破它、超越它，派克說，這種使道德家“傷心”的事卻正是“藝術家的好機會”，因為藝術所要表現的正是那種未被固定的意欲的普遍形式。藝術的所謂“深層意義”——即藏在表面具體意義下的更為“普遍性”的意義，其根源也正在此。所有的藝術都是“通過表現一種普遍的欲望來獲致一種普遍的意義”^②，來滿足所謂“人類的普遍的的好奇心”和“普遍需要”。“有些過去的藝術作品甚至完全沒有時間性，它們表現了心靈的永恒情境。作品中的一些不重要的項目可能使我們想起它們是過去的——如習俗、裝飾、建築樣式等，但是其本質的意義卻是永恒的”^③。總之，他認為，在現實中以至在夢中，欲望的滿足都是特殊的，是受特定環境、條件所制約的。而只有在藝術中才能獲得這種不受限制的永恒常在的普遍人性的真正滿足。這種所謂普遍人性，倒底是什麼呢？歸根到底，派克又說得很明白，它們仍不過是種種飲食男女等等最原始的動物性的本能欲望而已。

現代資產階級有其鼓吹本能衝動，腐朽瘋狂的一面，但是，由於其階級本身在歷史上已處於沒落垂死階段，這種客觀狀況不能不使其盲動的理論也深深地罩上一層悲觀絕望的黑紗。派克這套不可抑制的欲望衝動論是奇妙地與其哀傷的宗教情緒和“愛”的哲學混雜揉合在一塊的。派克从欲望的盲動衝動出發，却再三悲嘆着“惡”之永遠不可消除，“人生痛苦”的永遠不可避免。派克認為，“惡的根源深深地扎在本能的深層底土中”^④。“人性”本身就是一半惡魔，一半天使。“在這兩方面中，前者是更根本的……後者總是不穩定和難以靠得住的，總有回到更為原始的欲望去的天性”^⑤。同時，世界既是由一個個以“自我”為核心的經驗單子所組成，它們各各追求其“自我”的欲望滿足，這就必然彼此阻撓、衝突，於是生活實際上便永遠只能在这种衝突和災難中進行。那麼，怎麼辦呢？派克認為，最好的辦法還是通過藝術去緩和人們的欲望，以實現一種暫時性的和解或調和。所以，他勸道德家們不必擔心藝術表現各種丑惡的欲望而有害；恰恰相反，藝術通過人們的欲望在想象中得到“滿足”後，就不會再在現實中去尋求“發泄”了。並且，藝術家通過形式美的精心結構便減輕和沖淡了人們對表現內容的嫌惡，再加上人們具有要求了解自己“同類”(人)的所謂“同情的好奇心”的本能，於是藝術中表現丑惡就無寧還是“有益”的了。據說，因為在藝術中人們面對了“惡”的現實，便能夠在生活中更好地去適應它，使自己的生活達到所謂“悲劇性的和諧”的“藝術高度”，“由於我們絕望地認識到

① 《藝術的分析》第177頁。

② 《藝術的分析》，第177頁。

③ 《藝術的分析》，第182頁。

④ 《美學原理》，第274頁。

⑤ 《藝術的分析》，第107—108頁。

生活的短暫性，我們便会更加热爱生活及它向我們提供的欢乐。我們既然了解到死亡的不可避免，在我們的斗争和抗議无济于事的时候，我們的感伤就会平靜下来，安于天命。正是由于我們把艺术的观点加以推广，對我們的生活也采取艺术的态度，我們才获得悲剧的净化作用”^①。派克认为，最高的“善”，人生的最大价值，便正是这种悲剧性的和諧，即各种冲突的暂时和解与均衡，这当然实际上就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主观經驗的神秘境界。派克用这种理論作为基础論証了悲剧、喜剧的性能和特点。实际上不过是在美学中表現了这个反动階級的垂死哀伤的本质。

但是，不仅只此，这种所謂悲剧性的和諧理論，这种宣扬艺术的职能在于使人們对生活采取一种所謂“和解”和“安于天命”的“艺术”态度，却又是別有用心的。它实际上是企图以这种“和解”哲学在人民中制造幻想麻痹革命，来調和、取消階級矛盾和階級斗争。它是直接与現代資產階級的普遍人性論、人道主义、“爱”的哲学密切联系着的。无怪乎这位恶狠狠地大讲欲望滿足、大讲原始情欲和自我中心的哲学家終于要以此为归宿。資產階級个人主义的欲望論却要在人道主义的博爱論上来落脚，以人道、博爱来掩盖和維護前者。派克在其遺著《价值哲学》的最后一章中把道德理想最終归結为法国資產階級革命的三个口号——自由、平等、博爱，而“博爱是三者的中心。我們可以用更溫暖的德国字——‘爱’来替代博爱一詞”^②。猙獰凶狠的吸血者一变又为这么可爱的伪善的說道者了。

三

派克认为，艺术除了“欲望在想象中的滿足”是其最根本的实质以外，还有另外两个特征，这就是艺术是一种表現和它具有特定的感性形式。这样，艺术才能具有传达交流的社会作用。派克认为，这两大特点使艺术不同于其他的欲望的想象滿足，如做梦和游戏。

派克強調表現是一种本能或欲望，它本身就能获得愉快，所以，艺术之不同于实用、科学等的其他表現，就在于它完全是为表現而表現，即这种表現本身有滿足欲望的价值。爱情詩不同于一封求爱信，也不同意一篇不动感情的科学論文，正在于它的表現本身即是欲望的滿足。所以，派克认为，在艺术中情感、体验是首要的，而形象、观念則是从属的、派生的。因为前者才是艺术更根本的实质，它与欲望联系更紧，而后者則不过是种手段和形式罢了。

派克的表现主义的美学观点明显地来自克罗齐，但他也作了許多修正。一方面，他与克罗齐派的科林伍德相似，強調了表現是对自己意欲、情感、体验的意識(認識)。同时，派克又与另一表現派的鲍桑葵相似，他強調表現必需具有确定的形式(“使情成体”)

① 《美学原理》，第295頁。

② 《价值哲学》，第258頁。

和传达性的重要。这样才便于把活动不定的紊乱的体验、感受予以組織成为具有客体性的明晰稳定的形式、結構，以便于传达。但要注意的，派克所讲的形式——結構，却更多是指在人們主观审美經驗中的感性形式和意象結構。这是由他的基本观点所决定的，因为在他看来，所謂审美对象不同于物质承担者的审美工具，审美对象只存在于人們的审美經驗之中；因此，所謂形式、結構等等，其作为审美对象，具有审美性质，便也不能离开这个“原理”。但是派克又不能直接分析这种人們头脑中的看不見摸不着的形式結構，从而，便只能从分析具有物质存在的艺术形式开始。派克用了很多篇幅分析和論証艺术形式的种种要素和結構。他分出外在形式(艺术品与外在环境的关系)，如模拟，与內在形式(艺术品本身的关系)，如均衡、进化、有机統一或变化中的統一等原則。派克认为重要的是內在形式，因为这些形式也正是审美經驗的結構。所以，派克集中論証的，与其說是客观艺术作品中的这些原則，不如說仍是主观审美經驗中的这些原則。他实际上是将有机統一等这种传统的艺术形式原則作了一种审美經驗的現象学的心理描繪。例如，其中被特別強調的所謂“有机統一”，主要便是指艺术作品訴諸审美体验的那种心理經驗的統一性或整体性。可見，即使是对艺术作品的形式問題的分析，派克也完全是从主观(心理感受)到客观，将客观的艺术作品本身的形式归結为主观心理感受的形式。这样，也就彻底地貫徹了他的主观唯心主义美学基本观点。

派克认为，表現的可传达性和它具有整体性的感性形式，便使艺术区别于派克所认为的另外的两种欲望滿足的想象方式。派克詳細地討論了艺术与梦幻、游戏的异同，并以之規定艺术的上述美学特点。

派克认为，艺术、梦幻与游戏，从根本实质看，是相同的。不但就其内容都是欲望的想象滿足來說是如此；而且就其形式采取一种似真(as if)的态度來說，也是如此。但是，派克又认为，艺术毕竟与它們有重大区别，它兼有二者之长而无其缺点，“艺术就正处在梦与游戏之間”^①。因为，派克論証說，在充分滿足欲望特別是隱蔽的欲望这一方面，游戏远不及梦，而艺术則及之；在可传达性以及生动性、现实性这一方面，梦又不及游戏，但艺术則又及之。从而，一方面，派克认为，艺术与游戏不同，游戏的“自我表現”是受限制的，如只能滿足智力的棋賽或只滿足体力的田徑賽，并且帶有抽象性质；艺术所滿足的則是“完整的个性”，影响整个人格。所以艺术高于游戏(包括各种体育活动)。可以看得很清楚，派克这种对艺术与游戏的异同比較，不过是企图通过这些表面現象的任意联系來論証他的那个欲望滿足的基本观点。同时也把資產階級美学中一些流行的观点——如艺术是游戏等等杂湊汇合在一起，来装点他的这个体系。艺术与游戏之間的真正的关系，当然不是对历史唯物主义根本不通的派克之流所能梦想懂得的。派克所认为的艺术高于体育(游戏)，艺术家高于運動員，恰好暴露了資產階級輕視体力活动，把主要是脑力活动的艺术看作是“高級”商品的真实面貌而已。除了一方面与游戏

^① 《艺术的分析》，第161頁。

作比較以外，派克在另一方面又論証艺术与梦幻的不同，认为这个不同主要就在于艺术具有可交流传达的社会性质，“艺术不能存在在一个完全自我和沉默的世界中……不能仅仅为我而美，因为它的美，也就是說，它的价值正是依存于其能被共享之上的”^①。所以，艺术作为情感的表现或自我表现，不能象嬰兒哭、鳥兒叫，而必須使人了解和懂得。艺术之于社会就如記憶之于个人，它把价值經驗保存下来，传给同輩，留给后代，“正如科学使思想普遍化，美也使情感普遍化”^②。派克所讲的艺术的社会性、可传达性，与我們所了解的文艺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社会作用，是恰恰相反和根本对立的。他站在帝国主义反动阶级立场上，所要传播的只是抽象的人性論、人道主义等麻痹人民斗志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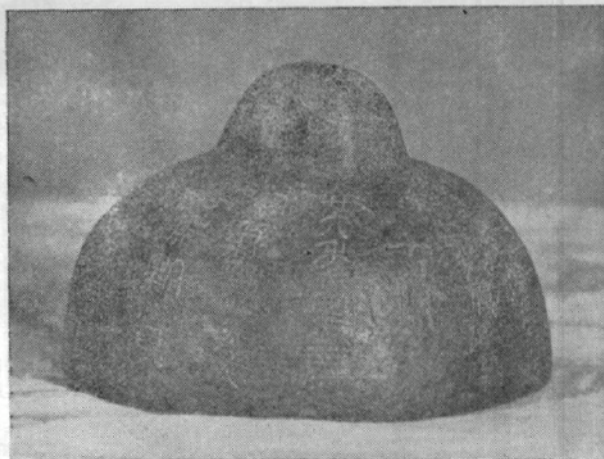
总括派克关于艺术的定义，就正如他所說，“首先，是因为它体现我的梦；其次，它具有如此的结构能使我梦”。“艺术是表现，是語言，其所表现的則是梦。”所以，归結起来，艺术的本质，在派克那里，便不过一是欲望，二是想象滿足，三是可传达的感性形式亦即表现，即語言。派克的整个美学观理論便正是这样“杂湊的一鍋”，它把近代资产阶级美学各反动派別都尽量包容在自己的体系里了。这里有弗洛依德主义，有立普斯，有杜威，有科林伍德、鮑桑葵。最后，这里还有斯宾塞、谷魯士、朗格等生物学的庸俗游戏說。派克尽管批評这些学說各自具有怎样的缺点和片面性，以显示出自己的优越和全面，但实际上，这除了暴露派克只会折衷杂湊之外，并没有多少自己独创的东西。这正如其整个哲学体系一样，反映资产阶级在理論上的全面沒落，不但在阶级性上是完全反动的，而且在学术性上，也完全是反科学的，带着十分显著的主观武断和任意虛构的特点（如“經驗单子”、“自我”等等），一些基本观念和概念也是含混不清未經分析的（如“欲望”、“想象”等等），它所构造出来的种种理論就絲毫不可能是客观现实的真实反映，而只是从其阶级的反动利益出发的形而上学的主观歪曲。但是，这种毫无科学性的哲学——美学理論，却以其各种伪装在实践中起着反动的有害的作用，它以其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人性論、人道主义来腐蚀、麻痹人民和反对革命，来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文艺理論相敌对。現代修正主义者也正在不断地拾取这些东西来反对馬克思主义。把派克的反动美学理論，和有的所謂学者的美学观点作一番对照，我們也可以知道他們販卖的究竟是什么貨色了。

① 《艺术的本質》，見韋茲編《美学問題》第76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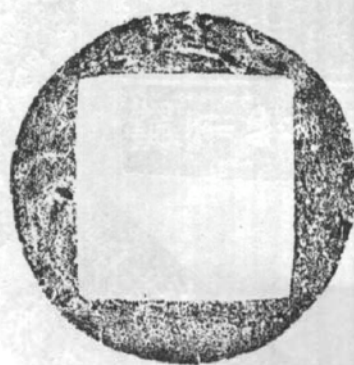
② 《美学原理》第35頁。



图一 执秤图



图三(1)



图三(2) 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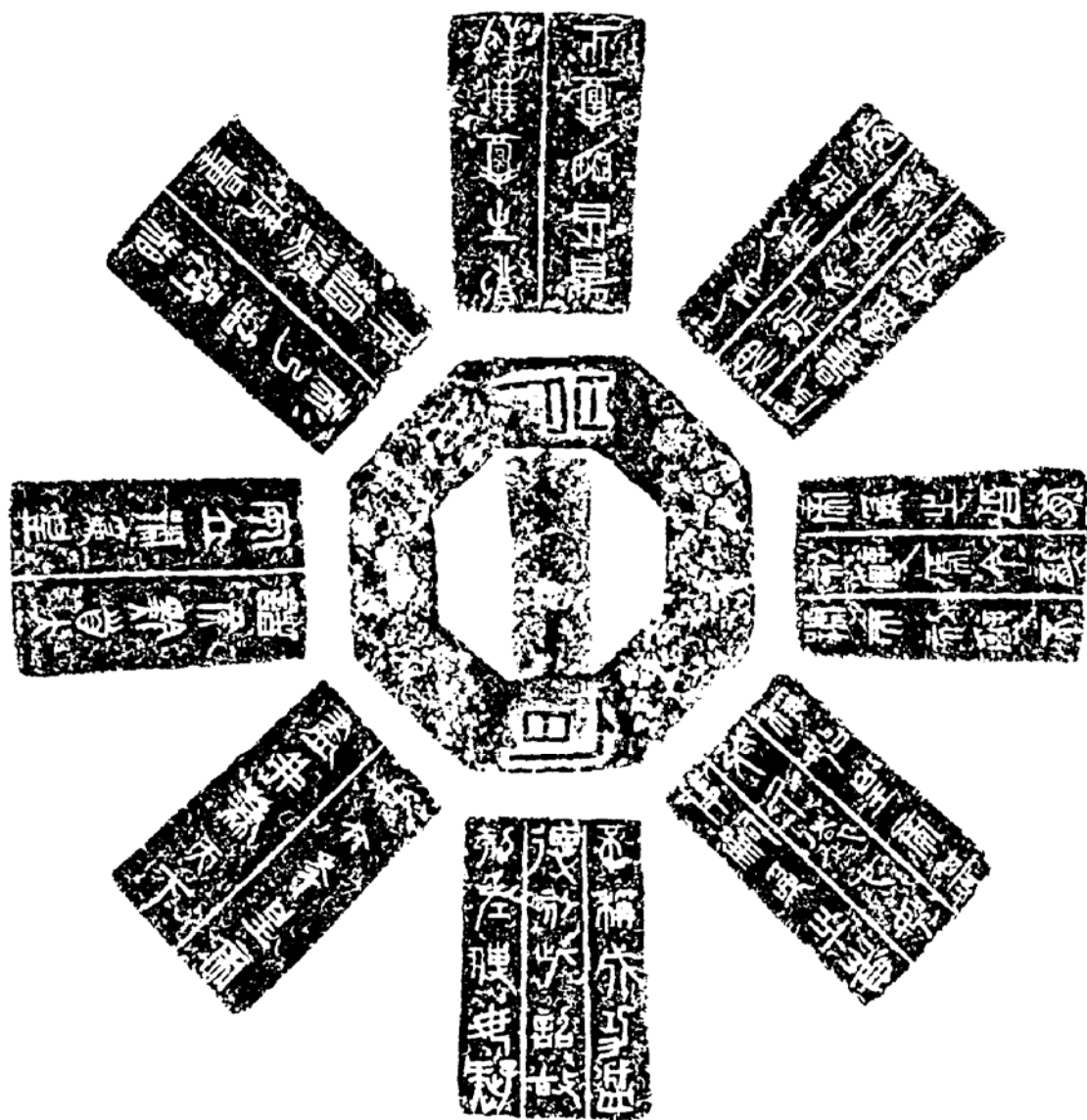
图二 美阳权



图四(1) 大驷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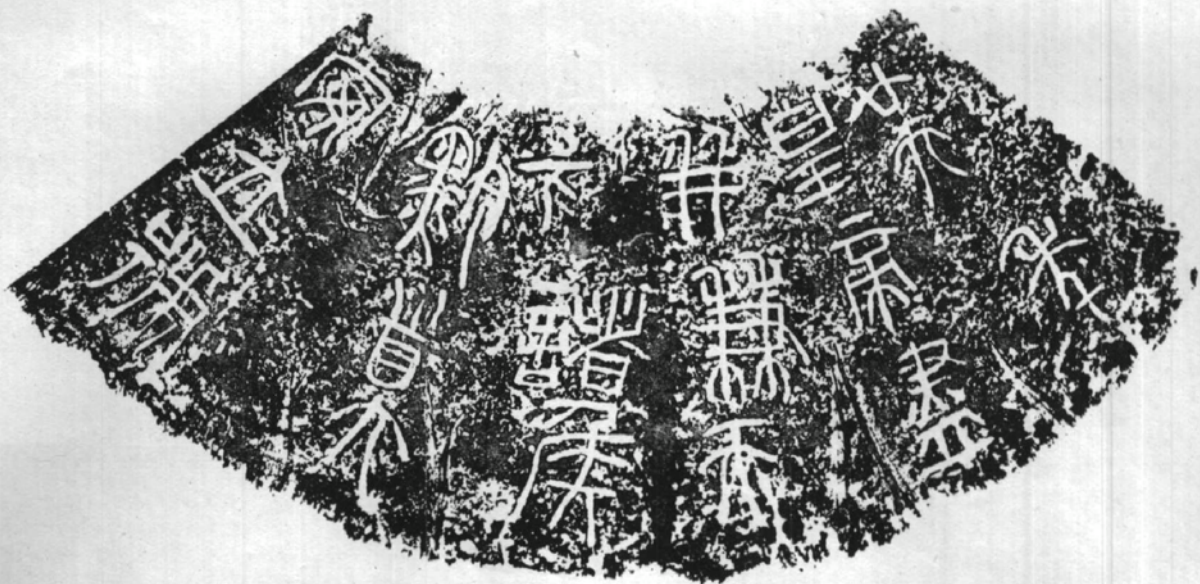
图四(2)



图五(1) 旬邑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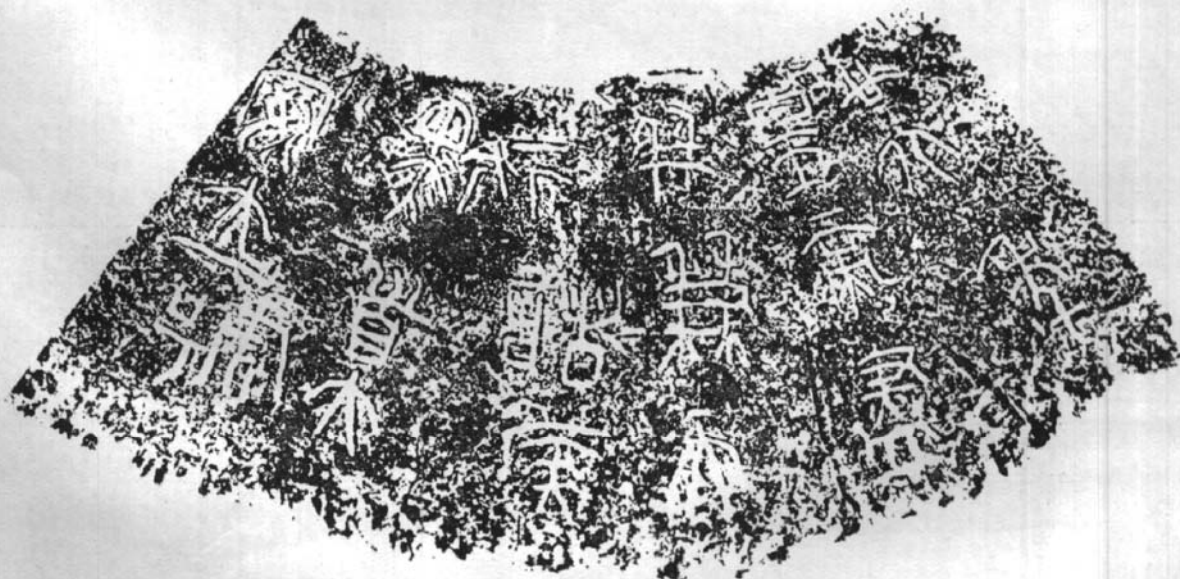
图五(2) 底



图六(1)



图六(2)



图七(1)



图七(2)



图八(1) 高奴叔



图八(2)



图八(3) 底

学术研究

一九六五年第三期（总第二十一期）七月二十五日出版

編輯者 学术研究編輯委员会
广州越秀北路222号
出版者 广东人民出版社
印刷者 广东新华印刷厂
发行处 广东省广州市邮局
訂购处 全国各地邮局

本刊代号：46—3 定价：每册0.50元
本刊每逢单月五日出版